

王
庸
著

中國地理學史

商務印書館

王
庸
著

中
國
地
理
學
史

商
務
印
書
館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版權所有★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華書店總經理

文明印刷所印刷

(95640.5)

1938年4月初版 1955年11月重印(上海第1次印)

印張74/16 插頁4=11 印數1—3,000

定價(7)¥0.92

中國地理學史附圖

(一) 華夷圖(西安碑林石刻)

(二) 禹跡圖(西安碑林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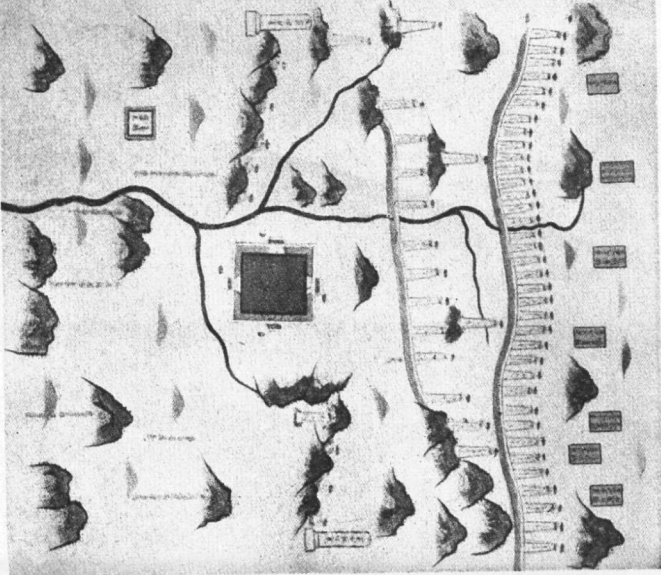
(三) 王志遠地理圖(蘇州府學石刻)

(四) 明繪本陝西鎮戰守圖略之一頁(北京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本)

頁一之略圖守戰鎮西陝本繪明(四)

(本庫大閣內清藏館書圖京北)

第二十二號內閣大庫本
陝西鎮守圖略殘頁之一頁



神木堡營外地名磁窯溝離邊三十里沙河分
離邊五十里木瓜杖寨離邊七十里石靈川離
邊七十里內冒水掌謝家亦有水泉虜賊在
彼割管其路徑通迤西大柏油地方由安川等
墩空掬糧入寇至高廟兒淨五十里摩天嶺七
十里清水坪九十里石山子黃河畔一百二十
里止俱平川虜可馳驟若賊入高廟兒本堡兵
馬從峯子梁阻截入摩天嶺石山子於清水坪
煙薰崖據險可以截殺其十里鋪石鑿子墩本
堡把總官設立塘馬有警馳報迤東未興等堡
兵馬由路迤峯進兵馳至摩天嶺迤西大柏油
等堡兵馬由神靈要酒務會進兵馳至清水坪
各趨便路截殺如賊權衆曠日不回本堡參將
設謀分遣所營登兵馬量敵出奇應機剿殺

- (一)邊防圖,
 - (二)地形圖,
 - (三)古圖經。
- 圖之形制:
表明三種地
此圖大致可

再版的話

本書從列入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版到現在快十八年了！在這將近十八年中間，沒有同類的書出版過，又大概因為這裏搜輯的材料，還可以供參考研究之資，所以大家有再版的要求。爲了利用原紙版的關係，不能大加修改，只能把已發現的錯誤和訛字作小修正，其他編制和說解疏誤的地方就不便改動。第四章近代地理學之進步，不但內容粗疏，又介紹些不正確的論證而沒有加以批判，對讀者是弊多而利少，需要增刪的地方亦太多，因此把這一章全部刪掉了。這麼一刪，就真的變成我初版弁言中所謂「中國地理圖籍史」而不像「中國地理學史」。但現在的名稱所以還是仍舊的緣故，不僅是爲了保存本書的歷史陳跡，又因爲書名如果改了，怕大家誤會爲另編的新書。

我感覺得非常慚愧的是：在這漫長的十八年中間，即使關於研究中國地理圖籍史方面，亦沒有作出若干新的貢獻；原書中留着不少重要的空白點，現在依舊是空着；就在初版弁言中提到我所要做而沒有做的工作，至今亦是「一事無成」！今後，我應該儘可能擠出一點時間來做這裏的

「補白」工作，但亦希望和對於此道有興趣的同志們共同努力。關於中國近代的地理學史，我希望地理學界有人能够另編一本系統的著作；這在專門研究地理的人，亦許是一件不很艱巨的工作。學術工作，無論大小，都不是一兩個人的事，亦必須依靠羣衆，集合許多人的力量纔能搞好。

本書基本上是史料的彙輯，是歷史的下層工作而不能算歷史著作。今後，我和同志們除了繼續這一下層工作外，還得在具備相當充足的證據下，作出若干貫通的解釋和結論，使之推進而提高爲真正的中國地理學史，那纔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最後，我誠懇地希望讀者在發現錯誤時，隨時指正，無論在材料編制或解說方面。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王庸

初版弁言

我國舊日地理學的著作，以地圖和地誌爲主。所謂地誌，在分量上雖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但論其內容，却多半是歷史性質。卽如所記山水、地域、物產、人口之類，亦不過地理事跡的記載，彷彿不定期的年鑑，不能認爲真正的地學。可是，本書之所以仍舊照一般的地理學觀念，把地誌亦容納在內者，亦有相當理由：因爲地誌和地圖的關係很密切，而明清以前，除地圖地誌以外，系統的地理學爲數不多；並且中國的地誌，至少在分量上占有中國舊籍的一大部分，是中國地理知識之淵藪，世界各國都沒有這樣興盛的；我們如果擱置了這大量的典籍，在中國地理學史中一字不提，似乎沒有別的學術史可容納的了。

這是題目的限制，沒有辦法！否則，我寧願把本書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儘量擴充，而把書名改稱爲「中國地理圖籍史」或是「中國地圖地誌史」。

有些事蹟，本可以在本書述及，但因爲時間的匆促，參考書籍缺少，以及本書分量和編制條理

的限制，多沒一一詳述。現在把重要的幾點列記如下：

(一) 中國古書裏不免偶然有些和地理學相近似而巧合的推論。但大都是東鱗西爪，甚爲散漫。要在浩如煙海的古書中披沙揀金，實在頗不容易。而且這些論說，恐怕多依附在天文、醫藥、玄學，以及各種經世致用的著述中間，它們同別的學問可以有一點聯絡關係，而在地理學本身，却不容易組成一個自成系統的條理。所以這些材料，倒可以在別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中間附帶述及，而不便容納在地理學史裏面，尤其是關於宗教和玄學上的迷信傳說以及巫術之類。此外還有不少材料，因爲分量和條目的限制而故意刪去的。

(二) 清代關於外國輸入的地學以及世界地理知識，固少精詳之作，亦且有一知半解、模糊影響的論說；但從歷史的觀點上說，亦可以在這裏述及。不過，事實上因爲材料的散漫而不齊全，不能在短時間搜集完成，只得暫付缺如，留待以後補足了。

(三) 元代以後的地志，一時不易籌得綜括的敘述方法。初意本想對元以後總地志列述概略，以見一斑；但實際上亦因爲材料的不齊全，和篇幅的限制，亦只能暫行告缺，將來是仍想補做的。

(四) 中國關於地理的舊籍，地誌而外，以水利和邊防的圖籍爲大宗。不過，這些書籍，大都論述防水、防邊的方策和政事，以工程、事蹟及奏議爲主體，真正有關於地學的不多。而且關於水利方面，本叢書另有中國水利史一書，無需在此重述。關於邊防圖籍最盛行的明代，有拙著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北京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一、二兩期）及海防圖籍錄（清華週刊三十七卷九、十期文史專號）可參，這裏略去不講了。（二錄亦已彙集刊在一九四七年商務出版的中國地理圖籍叢考）

總之，這一類工作，即使材料完備，又沒有別的職務，亦不能在短時期間完成。知道此中甘苦的，或者能加以原諒吧？海內學者，如果有人亦願意做這一類我所想做而還沒有做的工作，或是把我的編輯系統根本推翻，另闢途徑，那都是我極爲欣幸的。

除去一部分依據近人的研究結果之外，這裏亦有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尤其是關於地圖地誌的目錄和史料方面，頗用了不少呆板的整理和查考功夫。並且這工作不是短期內的事，是五、六年來在職業和別的文字工作之暇斷斷續續地做的。回想所費的時間、精力和所得的結果，不免有

勞而少功之感。這或許是由於我的天資愚拙，才能太差，不能寫輕鬆明快的著作。但是，學者們如果認爲這工作不是完全白費，而且方法上還沒有走人「魔道」的話，我依舊是自甘愚拙，不惜見外於聰明人之列的。況且這種「爲人之學」，如果還可以便利上智作新奇的推論和高明的「創作」，那還是天資較差的人所值得做的。我所引以爲憾的是愚拙得不够徹底，沒有充分的時間和圖書把這一種呆板的基本工作做得相當完全。

私意以爲真正研究中國學術，最好是腳踏實地從基本工作下手，做了以後可以不必再做——隨時補正的工作自然是不免。至於由豫定的原理，去找東鱗西爪的材料而作成各種寬大博辨的文章，那不僅無裨於純粹的學術，亦且和八股文相類，永遠沒有做完的日子。

我近來還有一個偏見：就是研究中國學術，與其作空泛的通論，不如如有條理的鈔書。但是，像這一類學術的通史，多少要講幾句通論的話，所以這裏雖竭力避免空論，按而不斷，却仍然有些概括的推論和假設；只不過在沒有細心求到確實而完備的證據以前，總不敢大膽地作十分確定的論斷而已。如果有人認爲這態度沒有決斷，或是不夠痛快，那亦只能聽其自然，現在我還沒有想改變

態度的必要。

本書裏帶通論性質的假設，有兩點是主要的：其一是九鼎、山海經圖、職貢圖、苗瑤風俗圖、以及地圖的一體分化說，其二是地圖和地誌間互為消長的演化說。雖則這一類說法，自己還不敢認為完全真確，但有一點是可以自信的，就是這些觀念，不是在開始工作以前豫定的原理，却是從實際材料考查以後的推論。

這裏有一大部分篇幅，是根據已經搜集的材料，有些是從早已在雜誌報章上發表過的文字刪改而成，但亦有不少增補修正的處所。將來如發現疏漏和錯誤，自當隨時設法補正；就在發稿付印以後不久，自己已經發現幾處疏忽的地方，一時來不及改正了。更希望海內學者，不吝指教，以匡個人所不及。如有特殊材料和新見解見示，尤為感幸！

關於漢、隋間之地誌一節，分量上雖占了很多的篇幅，但實際上還覺得語焉不詳，有些材料多略去不提。將來如有閑暇，想另做一個比較完備的整理和考訂。如果再能夠將工作擴大，把漢、隋藝文志和清代以迄近人所作漢、魏、六朝的補志和考證，作一個通盤的彙考，那在中國文化史上，不

能不說是一種重要的貢獻。可是，這事業却不是天天忙着謀生工作的人所能輕易速成的。最後，我對於本書引用到的近今著述的作者，都表示十分感謝！編者識



8137 號註冊證

書號 95640.5

定價 ¥0.92

目次

第一章	原始地理圖志及其流變	一
第一節	山海經與禹貢（附穆天子傳）	一
第二節	九鼎與山海經圖	一六
第三節	職貢圖與苗瑤風俗圖	二一
第四節	外國圖記	二五
第五節	地形圖與地形模型	三二
第二章	地圖史	三七
第一節	傳疑之地圖	三八
第二節	輿圖之掌管與造送	四二
第三節	秦漢輿圖	五〇

第四節	裴秀製圖·····	五六
第五節	十道圖·····	六一
第六節	賈耽隴右山南圖與海內華夷圖·····	六五
第七節	方誌圖與其他總圖·····	七〇
第八節	宋代總輿圖·····	七四
第九節	宋邊裔圖·····	八〇
第十節	朱思本輿地圖及其影響·····	八五
第十一節	利瑪竇世界地圖及其影響·····	九六
第十二節	清初測繪地圖及其影響·····	一一一
第三章	地志史·····	一二七
第一節	漢隋間地志之發達·····	一二七
第二節	唐宋總地志·····	一九五
第三節	宋代方志之發達·····	二一一

中國地理學史

第一章 原始地理圖志及其流變

第一節 山海經與禹貢（附穆天子傳）

中國自古言地理者，大抵溯源於禹貢，以其平實通達，合乎常情也。至於山海經一書，所述多離奇怪誕，不合實情，以是四庫全書列之於小說異聞之屬。降及今世，一面因古史研究之進精，一面由西來民俗學與考古學觀念之指示，山海經之地位始漸增高，而禹貢則反降為偽書矣。蓋原始人類之地理知識，大抵以其與生活有利害關係之事物為中心，而其所認為奇事異物者，不僅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又多非親見親聞，每憑十口相傳之故事，即認為真實。故山海經之離奇怪誕，正可以窺見

初民意識形態之真面目，而禹貢之平正切實者，乃爲後世地理知識進步之結果，非復原始之形態矣。是以山海經與禹貢之時代，今雖未易確定，但若辨別二書之先後，則山海經自較禹貢爲早也。顧頡剛先生論山海經中之山經所以早於禹貢之故有四，其說頗中肯綮。茲特撮述如下：（見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中五藏山經試探）

（一）「山經作者確認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皆居一大洲之上。」「古之人屢稱四海者以此，知實爲甚古之地理觀念。禹貢作者，則已知惟東方有海，故青、徐、揚各以海表州，其結尾全曰東漸於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學識之大進步，突破古代之幻想者也。」（按古代四海觀念，或非全出幻想，疑因原始時代黃河下流多洲渚蘊澤之故而形成，與下述「流沙」之觀念相一致。）

（二）「山經流沙之名，原不專屬於某方。」「此種觀念，即承四方有海而來。蓋海濱皆有沙洲，所謂流沙者，即沙洲之異名耳。禹貢作者，既已打破此舊觀念，遂以流沙之名專歸於沙漠，而屬之西方。故曰：『弱水既西……餘波入於流沙。』其結尾亦曰：『西被於流沙。』海與流沙，在山

經本爲四方公有之名，至禹貢而一歸諸東，一歸諸西，各爲專名，勿復相濶。此修正之名詞，遂至於今不變。試思禹貢作者之學識之進步爲何如乎。

(三) 西次三經言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同出崑崙，「黑水與赤水爲類。」而南次二經與西次二經言英水、烏危之水及皇水，均西南或西流注於赤水。「具見其確認此水爲西南方之大水，其地位與黑水相埒。禹貢作者乃取黑水而捨赤水。黑水凡三言，而赤水不一舉。是其心目中以黑水爲事實，而視赤水爲神話。雖未達一間，亦可見其判別真僞之心矣。」

(四) 「禹貢 荊州之南界爲衡陽，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爲岱、衡、華、衡山地位之重要如此。山經作者對東方雖極模糊，而猶知有泰山。又西山經以華山爲首，中次八經以荊山爲首，與禹貢之以華分雍、梁，荊、別、豫、荆者，其觀念甚相似。獨衡山則既不見於南山經，亦不見於中次十二經何也？予因以推知禹貢南之衡山，蓋楚拓南境之結果，當作山經時，河漢間人猶未嘗聞其名也。此四者，均可視爲禹貢後於山經之證。至若山經體裁，自某山至某山，方向道里，井然不紊。禹貢遵山一章之山脈觀念，或卽啓發於此。總而論之，禹貢若出於戰國之季，則山經之作，其在戰國之初，或

春秋之末乎。抑古人著書，恆不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山經定形之期，或未必遠早於禹貢。至其胚胎之期，則斷斷高出數百年也。」

此僅說明山經之早於禹貢。而山海經中尚有海經與大荒經，則據陸侃如先生之考證，尙較禹貢爲晚出。海經爲西漢人作，而大荒經爲西漢以後人所作。其理由爲：（一）大荒經及海內經篇末無劉秀字樣，而郭注云：「進在外。」漢志亦僅十三篇，足證出劉班後。（二）海內經襲淮南地形訓而加詳，至述崑崙西王母，又較山經爲增多枝葉，顯由山經與淮南演繹而出。海內西經又多漢代地名。（三）史記大宛傳贊稱「山海經」。然漢書張騫傳贊全襲其文，而作「山經」。論衡談天篇引史記原文亦作「山經」，足證最初惟有山經也。（文見新月雜誌第一卷五號。原文未得見，茲卽由五藏山經試探轉引。）惟無論其述作時代之先後如何，其爲原始地理知識之遺留與傳說則一。近世科學日進無已，而民間之迷信舊俗，仍可流行不絕，亦此理也。

關於昔日學者對山海經之觀念及其書之篇目，則閱四庫提要所述可以得其概略：

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三：「山海經十八卷，內府藏本，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蕩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又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一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

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贗託。然郭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併錄焉。（按關於山海經篇目，有日人小川琢治氏之山海經篇目考述之甚詳，商務出版江俠庵譯之先秦經籍考中，有中譯本可參。）書中敘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耳。」

後世以地理知識進步之目光觀山海經，誠有如提要所謂「百不一真」之概。然吾人試設想原人心理之態度以觀山海經，則彼離奇怪誕，模糊恍惚之事，在古人心目中，實皆深信而不疑。且其所述事物，雖非全出親見親聞，實皆有相當根據與來歷，非若小說家之空中樓閣，多憑想像者可比。今觀其文字平板質實，不僅與封神、西遊之成一故事系統者迥乎不同，卽與文詞豐麗之神異十洲諸記，亦不可同日而語焉。（按神異經、十洲記、隋志等入地理類，而四庫均歸諸小說類。）

西人希勒格(Schlegel)氏著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由馮承鈞先生迻譯漢文（商務尙志學會叢書之一）其中國名，多見於山海經，如小人、大人、君子、黑齒、玄股等國，後之學者，殆皆視若

神官，小說之不足憑信者，及經希勒格氏之考證，乃知此類傳說，雖未必完全切於事實，而皆有實事爲依據。惟因其經民間十口相傳，轉輾訛變，未免有違本真耳。故希勒格氏即以山海經爲「世界中最古之旅行指南」（據馮譯本扶桑國考證）近今江紹原氏著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亦認山海經爲旅行指南，殆卽本希勒格氏之說。惟山海經之作者，未必專爲旅行者設法，故所述事實，多有與旅行無關者，故私意不如稱之爲原始之地理圖志，較爲概括而切近也。（參大公報圖書副刊一百三十四期，或圖書季刊三卷一二期拙評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惟江氏以民俗學之方法研究山海經中之神異事物，以及各種禮俗迷信，則固不僅爲研究山海經之正當途徑，卽研究神異、十洲以及拾遺、博物諸書者，亦當由此道也。蓋此等述作，雖出學者之手，而其異物故事，大抵來自民間傳說，與山海經相類。惟其著者不過因事爲文，未必全以爲真，與山海經之作者未免稍異耳。

考山海經之內容，約有三種主要成分：其一，爲記山川、道里、民族等含有地理性質者。此其所述，雖未必真確無訛，而大多可於後世之地理求其連帶關係。近人吳承志氏著山海經地理今釋，卽以後世地理證山海經之地理者。惟古人地理知識幼稚，卽著述者親歷之地，亦未必完全真確。彼得諸

傳聞與轉錄者，更無論矣。故今人欲考究上古地理，當抱可解則解，不可則存疑之態度，不可存「古書所言皆真」之先入觀念，而以後世地理曲就古說。如是則往往愈求確解而愈不可解也。山海經一書，自來以神怪之書目之，故此種後起之糾葛，反較禹貢爲少。而今而後，山海經之地位增高，治學方法亦較前爲進步，研究山海經之地理者，宜可以免於治絲而紊之弊歟。

其二，卽所記各地物產，以及各種藥物之巫醫作用。其中自不乏真實之記載，以與後世事實相質證。卽其怪誕不經者，亦往往有淵源可考。至其所述藥物之功用，則中國本草醫藥之學之原始狀態也。此等事雖至瑣雜，而關係於吾國古代文化者甚大。苟有學者，以之與後世本草巫醫等載籍相比勘，理董而考明之，其有助於中國古文化之研究，豈曰小補之哉！

其三，卽爲各種祭祀巫醫等原始風俗，與前項藥物頗多關係者。是則研究吾國民俗學者之重要材料，且有一部分故事傳說，頗與古史有關者。靜庵先生之考王亥，雖以甲骨文字爲主，但又證之山海經、竹書而相合，（見觀堂集林卷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因謂「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

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此種態度，不僅爲研究山海經之正當途徑，亦考證古代史籍者應有之態度焉。

總之山海經一書，大體雖爲原始地誌性質，而內容複雜，方面至多。自郭璞以下，考證注釋者，頗不乏人，而發明蓋鮮。及畢沅作校正，郝懿行作箋疏，注重訓詁，對於山海經之研究，均多貢獻。但爲時代所限，其中當有不少事實，可以利用新知識以作新解者。並世學人，苟有博通吾國古代文字史地，以及禮俗古物之學者，參稽羣籍，比勘異同，刪舊注之蕪雜，創平實之新解，作一山海經集釋，則其有功學術，當不在書詩新疏之下也。（關於山海經之版本與箋注，除前述小川琢治之山海經篇目考外，尚有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本及關於山海經之著述一文可參閱，見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穆天子傳一書，其體裁爲旅行記性質，而其事實之荒唐，似又過於山海經。惟此書內容，頗有作偽之嫌。其時代或後於山海經與禹貢。童書業、程天子傳疑贊同姚際恆之定爲漢以後作之說，其

所舉可疑之點凡四，雖不詳備而甚簡明。茲節述如次以見一斑。

其一，山海經中之西王母，爲面目猙獰之怪神。司馬相如 大人賦所言，猶近於山海經。史記趙世家言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已趨人化。及穆傳而言其賓主唱酬事，漢武內傳竟言西王母天姿絕世，儼然美人矣。是則文人想像，故事演變之跡顯然也。

其二，「膜拜」之禮晚出，而穆傳屢見「膜拜」之禮。郭璞注云：「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卽此類也。」是膜拜爲胡人禮佛之禮。「案佛教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後，始傳至中亞一帶。其時約在中國六國將亡之時。卽西元前二五九年以後，而本書之撰成時代，則最遲不得過西元前二九九年。作者又安得知佛教之禮乎？」

其三，爲皇后一名之可疑。「尚書顧命云『皇后憑玉几。』此皇后謂天子也。后者，爵位；皇，形容詞也。皇后，猶言大天子也。穆傳所謂皇后，則儼然秦漢以後之皇后焉。考古天子之妻稱王后，無稱皇后者。天子之妻之稱皇后，與皇帝配者也。而人王之稱皇帝，始於始皇。則本書固不能成於秦代以前矣。」

其四，則紀事與史漢之體例同。「案古稱天子多曰『王』。』金文、尙書等可以爲證。詩經雖較多稱『天子』，然亦屢稱『王』。其稱天子，蓋多因協字與韻耳。左傳國語等戰國書，稱周王亦多曰『王』，罕稱『天子』者。漢世以後，始多以『天子』或『上』稱皇帝。如史記漢書記武帝事之體裁，每與穆天子傳合。取武帝紀、封禪書、郊祀志等與穆天子傳對勘，可以發見甚多之相同點焉。」

「綜上四點，吾人疑穆天子傳爲晉人雜集先秦散簡附益所成。其間固不無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爲晉人杜撰之文。如周穆王見西王母一節，以山海經等書校之，可決爲晉人所造無疑也。」

夏禹治水之事，其真實性究竟如何，今尙未易斷定。惟禹貢所述，非夏禹時代之狀況，則似爲近今新史學家所公認矣。竊謂夏禹及其治水之故事，當非全屬虛構。其有不合本真者，至多不過如亥等故事，因傳說而演爲神話性質耳。實則此問題之糾紛，無非因禹貢作者及其時代不明而起。否則古代典籍，以今託古，本無足怪。內經託諸黃帝，本草託諸神農，學者固鮮以爲真。晉裴秀所製圖，既稱爲禹貢地域圖，南宋時與華夷圖同時刻石之禹跡圖，皆非繪記禹時版圖，而亦託之於禹。乃未聞

有人以晉宋地圖爲禹跡，亦未聞有人辨裴氏等之託古作僞者，蓋無非因其作者與時代，本極明顯之故耳。是以禹貢之作者與時代，若一如禹跡圖之瞭然明白，則其真僞之辨，固可以不成問題也。

禹貢之著作時代，至今未能十分確定。據顧頤剛先生之推定，大抵當在戰國之世。因擬作禹貢作於戰國考一文。其預定大綱如次：（據古史辨第一冊，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

一、古代對於禹的神話，只有治水而無分州。

二、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觀念。

三、古代的『中國』地域甚不大。

四、戰國七雄，疆域開闢得大了，故有一統觀念。交通便了，種族雜糅得多了，故無種族觀念。因此九州之說，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統一之功。

五、騎衍大九州之說，即緊接九州而來。

六、分野之說，亦由九州之說引起。

七、九州州名，及各地名之初見在於何時何書？

八、九州州名之來歷（取義）。

九、九州疆域與七國疆域之比較。

十、九州州名未嘗統一；貢賦服屬之說，亦未嘗統一。故呂氏春秋爾雅周官（逸周書）與禹貢之說均不同。

十一、所以考定禹貢爲戰國時書而非秦漢時書之故。（1. 禹尙是獨立而非臣於舜。2. 每州尙無一定的一個山鎮。3. 不言南交。）

凡此諸端，多爲中國上古地理之基本問題，其內容至爲複雜。欲求解決，頗不易易。且爲史料所限，恐有一部分問題，一時無從解決者。惟假定禹貢爲戰國時之作品，則與事實不甚相違耳。近人鍾道銘氏又因秦孝公十四年始爲賦而禹貢言「厥賦」遂明定禹貢爲秦孝公以後作品焉。（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國古代地理學之發展。）

至於禹貢所言地理，其主要成分，約有五端：其一，卽爲九州。關於此點，因周官職方與爾雅諸書之參差，頗有異說。惟此九州之劃分，大抵爲學者依據當時之地理知識而劃分者，非若漢代州郡，爲

實際政區者可比。故其劃分之法，並不一律。蓋九州之劃分，略與近世所謂自然區域相彷彿。如兗州之間於濟河，徐州之在淮北，濟南而雍梁二州，約以秦嶺爲界，其大較與自然區域不相違忤，與政治區域之以政治經濟之考慮爲依據者，性質自有不同。

其二，爲託夏禹治水之故事，而言山川之方位與「脈絡」。其所涉地域雖至廣大，但仍詳於冀、豫、雍三州間中原之地。可見禹貢作者之地理知識，因愈遠而愈疏，至爲明顯。惟其言山川之方位源流，則較山海經平實多多。所言水道，今大抵可考。惟黑水、三江及漢水入海等不甚明確耳。至於導山之說，雖尙無山脈之系統觀念存於其中，但後世言中國山脈者，當以禹貢之說爲其遠源也。

其三，爲各地物產之分佈。此事雖亦較山海經爲平實，而缺少神話迷信之成分，惟所述各物產地，多甚籠統。後人固未易考定，卽禹貢作者恐亦不甚詳悉耳。

其四，爲關於各地之土壤性質及其貢獻。此則疑多出於作者之理想，所據事實，大抵亦甚模糊。吾人欲加以研究，尤不能以後世之事實與知識曲爲之解。然當時學人，已注意於土壤之辨別，分爲

黃壤、赤埴埴、白埴、埴壩、白壤、黑埴、青黎塗泥等類，不可謂非地理知識之一大進步也。

其五，則爲服之區分。是與九州之說更多紛紜。因亦有周官職方康誥、酒誥及國語等參差異同之說耳。但其非當時政治上實際之區分，則較九州爲尤顯。私意以爲此乃學者說明地方遠近之一種假定方法也。蓋古人言地理方位，既無後世計里畫方之法，更無近代所謂經緯度；欲於實際道里之外，更求一直線距離之標準，則惟有以王畿爲中心，而以規定距離分爲數地帶，是卽所謂「服」也。此假說若確，則吾人可不問爲五服、六服、七服或九服，亦不問其一服之距離爲百里、五百里，抑或千里（其始各服未必規定里數），皆不過隨學者之便利及其地理知識之廣狹而規定之。初無關於實際之制度。否則古代政制，無論爲封建與郡縣，其郡國疆土，莫不犬牙相錯。若必以縱橫平直之規定距離，將某某邑強劃於某服之內，而定其特殊之地位，其不合情理，較之井田之劃分，更難索解矣。（又若據此假說以推，則或可以其所言諸服地域之大小而略定其說之先後。其距離愈大者，其說愈晚出。）

總之，禹貢一篇，雖文字不多，而其作者之地理知識，蓋已脫離山海經之原始形態進而爲一種

學者之述作。惟學者之進步自進步，而山海經之原始體制，並不因此而中絕，是則觀於山海經圖與後世外國職貢圖等之關係而可知也。

第二節 九鼎與山海經圖

山海經中有圖，朱子已注意及之（見前引四庫提要轉引）而山海經圖之源於九鼎，則明代楊慎言之甚明。

楊慎山海經補注序：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人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曩，駭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

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之續有呈焉，因以爲恆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尙忠，而文更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姁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

此種推論，除夏后等人物之關係不足爲憑外，其言山海經圖之淵源於九鼎，則大致近實。其後畢沅之說，亦同楊氏。且謂五藏山經爲土地之圖。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其先時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卽郭璞、張駿見而作贊者也。劉秀之表山海經云：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

俗……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下引周官大司徒及管子所言地圖。）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不廢。」

又山海經古本篇目考：「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

此說尤爲切近。蓋據近世人類學者之考查，知地圖之作，實見於近今原始民族之中，而圖繪之形式，大抵以山川、部落等實際事物爲主體。澳洲土人附於「飛去來器」之地圖，卽表示一湖一河間之村落（參 Grigg 著蔡慕暉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藝術的起源第一三五頁）依士基摩人亦能作正確之地圖，並能以木刻製地勢高下之模型；而印第安人亦於樺皮上繪畫河湖道路（參 Lowie 著呂叔湘譯生活書店出版之文明與野蠻第三九五至三九七頁。）故九鼎山海經圖若均繪有山川、道里等事物，當與此種原始之地圖相類。且原始藝術，均由實際應用而起；故其所繪地圖，亦以山

水與動植礦物，以及有關利害之事實爲主體。左傳所謂「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卽顯然透露此中實用之意義。故九鼎之爲物，古人既認爲國家重寶，又含有神祕性，不能輕易示人，是則與後世地圖，多歸國家掌管，而又視爲有祕密性質者，其中或不無相關之消息歟？

至於此類圖繪之中，其此山與彼水，此族與彼族之距離遠近，並不能以正確之比例表之於圖，一如近代之地圖然；所能表示者，僅恃文字或符號耳。五藏山經中所記又某方若干里，某山至於某澤等文字，疑卽圖所不能表示而記於二山二地之間者。以是九鼎與山海經圖，雖有地圖之意，而所繪者仍係山川、民族等事物之圖，與近世地圖之抽象繪法，迥不相侔；惟與中國舊式地圖所繪比例不確之山川、道路，而以文字記其里數方位，以及戶口、軍實之類者，仍屬古今一轍；所不同者，人民風俗等實物之圖，大抵當較減少耳。由是觀之，則山海經之原始狀態，殆以圖爲主體，而文字不過其「附庸」，所以補圖繪之不及者；及後世圖失其傳，而文字始反客爲主。是又與中古時圖經之沿革趨同一途徑者也（參下章「十道圖」節及第三章「圖經」節）。

山海經圖惟畢沅所謂古圖與漢所傳大荒經圖爲最古。至於郭璞、張駿因而作贊者，不知是一是二。而陶潛詩亦有「流觀山海圖」之句，蓋當時流行者，疑多副本流傳，且尙能與古圖不甚相違。及後張僧繇又繪山海經圖十卷，直至宋代尤存。

玉海地理書「中興書曰：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尙有存者，重繪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七十四種。」

此外又有別本數種。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

玉海地理書禹山海經：「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本，不著姓名。」

蓋魏晉以降，此等圖繪當已失原始實用之意，而變爲藝術性質，故無名畫家，繪之者甚夥；而張僧繇以畫工佳勝特著。但恐漸失原圖之本來面目矣。宋舒雅又因張僧繇本另繪十卷。（見前引玉海。）

郝齋讀書後志：「山海經圖，皇朝舒雅等撰雅仕江南，韓熙載門人也。後入朝，數預修書之選。閩中刊行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按歐陽修有讀山海經圖詩。通志圖譜略亦有山海經圖，不知是否皆爲舒氏之圖。

此與古圖形制，自然相去益遠。及明末清初，吳任臣作山海經廣注，並有附圖五卷。吳氏自言本舒雅舊稿，而四庫提要則謂爲「以意爲之」，斥而不取。清汪紱著山海經存各卷，復均附有圖（光緒間石印本），而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亦附刊圖象。是皆望文生訓，因經作圖，與其初之先有圖而加以文字說明者，適屬先後倒置也。

第三節 職貢圖與苗瑤風俗圖

山海經圖中之五藏山經圖，雖未必真如畢氏所謂土地之圖，但謂其已有地圖之形制，則似近於事實。因其文其圖，當有山水道里也。至於大荒經圖所繪，則恐只有地圖之意，而無地圖之實。蓋吾人由其說以推圖，大抵惟繪有各種奇人異物，其關於山川道里方位者，則文字既少，明言恐作者亦

茫然也。故竊謂五藏山經所言，大抵至遲爲戰國以前華夏民族所及至之地域。雖所言尙有神話性質，而其地理知識較爲熟悉，故有山川道里可以繪圖而記數。若大荒經所言，則多爲荒遠異域，少直接之見聞，故其神話之意味益濃，更無山川道里之可言；其可繪而爲圖者，亦惟彼奇人異物而已。是卽與後世繪記異域人物風俗之職貢圖相類也。

原職貢圖之見於著錄者，據個人所知，以江僧寶及梁元帝所繪者爲最早。

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梁元帝職貢圖：「外國會渠諸番土俗始末，仍各圖其來貢之狀。」金樓子言之。梁元帝畫。又卷七註：「江僧寶職貢圖。」按新舊唐志俱有：「梁元帝職貢圖一卷。」崇文總目亦著錄。通志圖譜略作：「梁元帝二十八圖職貢圖。」

當時又有僧伽佛陀薩寐國人物圖、器物樣外國獸圖（見歷代名畫記卷七），及時期不明之百國人圖（亦見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雖皆不以「職貢圖」名，而其性質實亦相同。此類圖繪，卽爲外國入朝人物，及其風物之寫真。較之大荒經圖之多憑傳說，而有神話性質者稍異；惟其所繪爲異域之人物風俗則同。且此等遠方異國，其山川道里與方位，均不甚明瞭，不能若中原各地之可以

繪爲地圖；所可繪者，惟此人物風俗而已。此所以職貢圖雖如山海經圖之同合地圖意味，而絕無地圖之形式也。

唐代「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而副上於職方」（參下節所引唐六典及唐書）。此鴻臚所繪者，當卽職貢圖無疑，而其出於職方之外域地圖，亦卽來自職貢圖也。唐代有呂述之夏點斯朝貢圖傳（見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稱「李德裕撰。」）與閻立本之西域諸國風物圖（見通志藝文略）蓋皆爲職貢圖性質。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均有職貢圖，此如爲同一作品，則疑卽出於唐代。宋代亦有崔峽華夷列國入貢圖二十卷。（見玉海異域圖書及宋史藝文志。）至於清代之皇清職貢圖，則今日猶及見之；其內容雖不同於古，其體制則固大略相似也。

此外更有清代所繪，而尙多流傳今日者，卽爲吾國西南各省之苗瑤風俗圖是也。此項圖籍，多爲彩色繪本。據劉崇熙（咸）先生苗圖考略（山東大學叢刊第二號）謂此項圖冊，似爲清職貢圖發刊（乾隆十六年）以後之作品。惟此係指現代所見繪本而言。若論其體制，則來源甚早。蓋除山

海經圖與職貢圖本與此相類外，諸葛亮之南夷圖譜尤與苗瑤風俗圖相似。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

唐柳宗元所詠南省轉牒具注國圖，其性質亦復相同。

唐柳先生集（四部叢刊本）卷四十二，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注」一作「江」）：「聖代提封盡海隅，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同，黃茆深峒敢流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繪周書王會篇。」

宋時之邕川溪洞交洞圖疑亦爲此種風俗圖。

玉海卷十四天祐職方圖：「書曰：交廣圖一卷，熙寧中上。以二廣邊機利害二十五條，及邕州溪洞交洞圖三卷，并交趾跡狀上之。圖今缺，不知作者。」

至若溪錦淑富四州圖及向通漢之五溪地理圖，則當係地圖性質，非苗圖之類矣。

玉海卷十六太平興國海外諸城圖：「八年八月丁酉，辰州言溪、錦、淑、富等四州蠻求內附，輸租稅。詔今州長史察其謠俗情僞，并按視山川地形，具圖來上。」（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略同。）

又「天禧二年六月壬寅富州刺史向通漢以五溪地理圖來上。乞留京師，不允。以爲防禦使。」

第四節 外國圖記

竊謂中國地圖，脫離山海經圖之原始狀態，而專繪山川、道路等地圖之體制，至遲當在戰國之時。秦、漢以降，中央政府統制之地，大抵多有地圖；惟因地理知識之詳略，而圖亦隨有精粗耳。至於遠方異國，所知益少；除少數山水城邑，或有約略之道路方位可記外，其他可以表現於圖繪者，不外鳥獸草木、人物風俗之奇跡。故昔日如山海經圖之表現後世華夏疆土者，至是乃推而施之於當日之蕃胡，是亦自然之勢也。漢元帝時誅郅支單于，而「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注釋者之解「圖書」，異說不一：

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

書示後宮貴人。」註：「服虔曰，討邳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

是則注解者多拘泥於誅邳支之事實，而未注意其所謂「示後宮貴人」之故也。蓋無論其圖書爲「土地山川之形書」或爲「討邳支之圖書」均非「後宮貴人」所樂觀，舉以示之，似非情理之常。竊意其所示之圖書，殆卽匈奴奇事異物之風俗圖記乎？是則彷彿山海經之圖說，正可博「後宮貴人」之一粲者也。後漢臧旻口陳西域諸國，雖能「手畫地形」而其所注意者，仍不離「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之不與中國同者」。

後漢書臧洪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設臧旻作爲西域全圖者，其形式恐較山海經圖之原式相差無幾。故裴秀禹貢地域圖序，論漢氏與

地，及括地雜圖有「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之言。可見其時輿圖，尚不脫山海經之遺風。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括地圖：「裴秀：『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今案水經、河水注所引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史記、大宛傳、索隱所引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之類，皆近荒外迂誕之言。季彥所見，蓋卽此書。」（按史記索隱所引係括地象，非括地圖。）

後漢時以山海經與河渠書、禹貢圖、賜王景，可見其時尚認山海經爲地理書，是與當時輿圖之類於山海經者，正可互相映輝也。

晉時有外國圖，水經注、文選注、通典及太平御覽，俱引其文字。殆亦與山海經圖之形式相似，而可稱爲地圖成分者甚少。其道里方位之屬，大抵恃文字記注耳。

丁鈞、文廷式、秦榮光及吳士鑑之補晉書藝文志，均轉引水經注「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一語，以證此外國圖爲晉時所撰。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外國圖「通典邊防門注：『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長五六丈；』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閭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藝文類聚木部：『君子國多木，僅之華，人民食之。去琅邪三萬里；』並引外國圖。史記秦本紀正義：『甯州去琅邪萬里；』稱吳人外國圖」（按此疑爲康秦吳時外國傳之誤。）

是其所述道里之粗略，與事跡之恍惚，亦彷彿山海經也。及梁時裴子野撰方國使圖，當亦依據舊圖書之傳說，其內容疑與山海經之圖說相彷彿。

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人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漢定遠侯擊虜入滑，從之。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其後裴矩撰西域圖記，據其序略所言，則顯然有一部分爲職貢圖之形制。

隋書裴矩傳：「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略曰：『臣旣因撫納監知

關市，尋討書傳，訪探胡人。或有所疑，卽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制造地圖，窮其要害。」

唐代兵部職方司所掌地圖，關於外族之知識，均防諸蕃客入朝者，而令鴻臚注意其風土容狀衣服之類。蓋沿襲表矩之舊法也。

唐六典兵部：「職方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燧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四夷之歸化者……其外夷，每蕃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

新唐書百官志：「兵部職方郎中，掌地圖、城隍、鎮戍、烽燧、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後許敬宗節撰之西域圖志，亦有風俗物產圖存於其中。

唐會要安西都護府注：「西域旣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注：「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許敬宗

領之，顯慶三年上。」

玉海卷十五西域圖：「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新唐書地理志同）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紀。」

凡此等經鴻臚卿之外國圖，大抵注意於人物容狀衣服風俗，蓋可推知。至於王玄策之中天竺國圖，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中天竺國圖有行記十卷，圖三卷，明慶三年王玄策撰。」

閣立本之西域圖，

歷代名畫記卷九注：「元和十年，大父相國鎮太原，詔取之西域圖，王知慎亦搨之。」通志藝文略著錄「閣立本西域諸國風物圖。」

以及田牟之入蕃行記圖經，

玉海卷十六唐西極圖：「田牟爲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入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疑均有一部爲職貢圖之體制。而閩立本之西域圖，如與西域諸國風物圖爲一，則恐全部與職貢圖性質也。

總之，人類文化，雖常因新發明而進步變遷。惟一種新發明產生以後，又常因實際境況之阻礙，未能將舊制一律推翻，全改新樣。故銅器時代之代替石器，除農兵利器，多改舊質外，而杵臼礮礮，猶留存於今之電磁時代。地圖之製作，蓋亦類此。近世地圖，已進爲有經緯度、比例尺等之科學繪法，而保存一部分原始圖誌形式之職貢圖，與苗瑤圖說，迄今猶及見之。至其中間之過度形制，則中古時圖繪遠方異域之外國圖是也。蓋山海經爲一種原始之地理圖志，除圖繪山川人物、鳥獸草木等奇跡外，至多只能以文字記注其道里方向，故其內容，僅具地圖之雛形，而未足爲真正之地圖。後世地理知識漸進，又因軍事政治上之需要，始有圖繪山川、疆界、道路等事實之地圖。顧徼荒異域之事，大抵憑藉傳說；卽或歷其境界者，亦多一知半解，不詳底蘊；而道里方位，尤多模糊影響，不足以繪爲地圖。所可繪者，無非與山海經相類之奇物異俗而已。此所以中原華夏之圖，已有地圖之體制，而外國圖記，尙保存山海經圖與職貢圖之形式也。明代利瑪竇繪貢之坤輿圖，卽以各地異物繪之於圖。卽

今日之通俗地圖及物產等分佈圖，亦有以實物繪諸地圖之上，以便閱者之一目了然者，是亦山海經圖與職貢圖之遺意歟？

第五節 地形圖與地形模型

近世以等高線與分層設色等法繪地圖，又以立體之地形模型表顯地勢，一若此爲現代新式之地形表現法。實則以歷史考之，則地形圖與地形模型之作，實爲原始之地圖繪製法；蓋原始人民思想比較具體，而地形圖與模型，實爲表示地理狀況之最具體者也。惟其製圖與模型之技術，及其正確程度，則古今之別顯然不同耳。至原始民族中之有地圖與地形模型，以及吾國山海經中山川道里之圖，前固皆言及之（第二節）。惟其表示山水之法，大抵卽實繪簡單之山林、川澤、與人物、禽獸於地圖者，是卽原始之地形圖也。至其高下遠近之精確比例，則因其生活與知識之簡單，爲原始民族所不能細辨而亦不必細辨者。至於比例與等高線等抽象繪法之發明，更無論矣。

中國自春秋以降，征戰頻繁。及戰國之世，邦國愈大，而戰爭之範圍愈廣，各國必有地圖以爲行

軍之南針，可以推知。且其圖之內容，亦必注意於山陵、川澤以及關隘、道路之通塞。故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管子地圖篇亦言審知「輻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是皆可知戰爭地圖上地形之重要。而孫子言兵，亦論地形，可見地形爲當時軍事上必需之知識也。史記大宛傳言：「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可證秦以前圖之繪有山河地形。惟此種地形圖，大抵已將山海經圖中之人物、禽獸等漸歸淘汰，而僅繪山川、城邑、道路、關隘等事之切於軍政實用者耳。但中國地形圖之繪法，推演至此，以後似無大進。今日吾人所見之清代繪本地圖，其山林、川澤、道路、城邑，往往僅較實物爲簡小，甚且如大規模之山水畫；此則自戰國、秦、漢以來一般地圖之繪法，疑多無甚差異。惟兩晉以降，或因水山畫之發展，而繪畫藝術不免隨之進步耳。又據日人小川琢治氏之考證，知吾國中古時之五岳真形圖，爲表示地勢高下之地形圖。

黃喜嘉譯小川琢治著中國地圖學之發達：「漢武帝內傳曰：『……』。如謂武帝受此書（即五岳真形圖）於王母而授諸董仲舒，固荒唐無稽，不足信也。惟就『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

短，察丘山之高卑；乃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岳之盤曲，陵曲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畫形」之言推之，則此圖製作之目的，原在示山嶽之地形。所謂鳥瞰圖，描寫山岳於平面，是不難察度也。」（見科學月刊第二卷七、八、九期。）

此圖之繪法，大抵與近世之暈滃法相近（小川原文及科學月刊譯文均附有東嶽真形圖與泰山地形圖。）惟此種含有神祕性之發明，既源於道教，對於一般地圖，似無甚影響。以後又變而爲符籙，乃盡失地形圖之作用矣（參日本內藤博士還歷紀念支那學論叢井上以智爲論五嶽真形圖。）至於地形模型，則在中國古代或曾有之。九鼎上如有山水，則亦可謂介乎地形圖與模型之間之一種雕刻或範鑄。但無徵不信，不敢懸揣。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後漢書馬援傳）蓋所以濟地圖之窮，而亦可謂一種活動之地形模型也。其後中國古籍上確有地形模型之記載者，似以劉宋時謝莊之木方丈圖爲最早。

宋書謝莊傳：「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此圖疑卽據裴秀之地形方丈圖（參下章述裴秀地圖節）而變爲立體之木刻模型者。降及趙宋，沈括創製邊地之模型地圖；先以麵糊木屑製之而未成，乃改製木圖。又令邊州倣製。

沈括夢溪筆談：「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賫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此圖大抵失於靖康以後。及南宋時黃裳亦爲木製輿圖。朱子訪求之而未得，乃自以膠泥爲之。

玉海卷十四：「黃裳作輿地圖，以木爲之。」朱文公集，答李季章書：「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卽依謝莊木方丈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又答李季章書：「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便中書，欲煩借黃文叔家地理木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比近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以浮沉，不曾製得，則亦不必爲矣。」

其形制，當與謝莊木方丈圖相類也。

第二章 地圖史

中國地圖史可約分爲三大時期。晉裴秀以前爲上古期，此期地圖，由原始狀態進步至裴秀而集古來製圖經驗之大成，於是地圖之學，遂有理論上之準繩。裴秀以後，地圖與地志迭爲進退，方法上多因襲而少新創，是爲中古時期。洎乎明末清初之際，一面有利瑪竇坤輿圖之輸入，一面有康熙問東來教士之測繪中國地圖，於是地圖之學，始爲之大變。至近今坊間流行之中國地圖，猶間接受清初測繪地圖之影響。是爲地圖史之近世期。中古期間對於繪圖方法無大進步，而爲時甚長。吾人又可以其主要之地圖製作家而更劃爲三分期：即由裴秀至唐賈耽爲一期，由賈耽至元代之朱思本爲一期，而自朱思本以迄清初，則又爲一期。惟如此劃分，不過就地圖史上有顯著進步者言之。若就一般狀況言，則此等進步，其影響未必普遍。例如清初雖有近代科學測繪之地圖，而實際上自清代末葉以前，一般官私地圖，依然實行古來傳統之繪法。其能據內府測繪之圖而繪製者，僅有少數

學者耳。故若按前述之分期論述之，則其事至爲簡略，實不足以窺見一般之概況；且史事之時代關係，至爲複雜，多有互相掩蓋，不能明析劃分者。以是下此所述，並不按前述之分期，惟略按時代之先後，提其主要而衆多者，分別而論列之耳。且中國地圖，多掌於中央，故歷來製圖者，大抵直接間接與中央公藏圖籍有關。故本章所述，亦以官撰輿圖，及私撰總圖爲主，俾見綱要。其他零星之作，不能瑣瑣列述也。

地圖既掌於中央，故常因首都之喪亂而圖亦隨之散失；又常因易代改制，另製新圖，舊圖乃廢而不用。以是中國古輿圖，留傳後世者絕少。至今所見吾國最古之地圖，惟西安碑林之華夷禹跡兩片石耳。故下述諸圖籍，大抵早已散佚，今惟恃文字之轉引與古籍上間接之記載，以推見其涯略而已。

第一節 傳疑之地圖

先秦之世關於地圖之記載，不甚詳明，書詩論語，雖似有言及地圖者：

尚書洛誥：「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僞孔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所獻卜吉兆來告成王。」孔穎達疏：「周公……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

詩經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猶圖也……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爾雅釋言：「猷圖也。」玉篇大部：「猷圖也，與猶同。」

論語鄉黨：「式負版者。」鄭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但此皆後世注疏者之解釋，究其所言是否確爲地圖，尙未能下十分之斷語。顧在原始民族中，今已知其有地圖與地形模型，則謂西周或春秋之世，中國已有地圖，自亦未足爲荒唐之說。惟其圖之形式，當不離原始狀態，或卽九鼎與山海經圖之類耳。

春秋以降，各國戰爭頻繁，小國覆滅，而大國之疆土日擴；其用兵行政之際，必各有地圖爲依據，可以推知。故蘇秦以合縱說趙王，卽曰：「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戰國策趙策。）此事之是否確實，固另一問題，但其時天下各國，均有地圖可按，則似不成問題也。至於荆軻因刺秦王而「獻督亢地圖於秦」（見史記燕召公世家及戰國策燕策）則尤在情理之中。蓋戰

爭之際，除原始民族中各小部落之爭鬪外，皆不可不知異國山川之通塞，道路之險易，而後可以定攻戰之策。是以孫子論兵，即詳言地形。地圖者，即繪有山川、道路等地形，而可以爲攻戰之嚮導者也。是故荆軻以地圖誘見秦王，實爲計之得者。但由此可見地圖與戰事關係之密切，尙遠在荆軻刺秦王之前，而後世獻地圖與獻土地之連帶觀念，其來源亦甚古矣。

此外言先秦地圖最詳明者，莫如周官與管子。周官之言地圖，尤爲複雜。有冢宰之圖：

周禮 天官 冢宰：「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鄭司農云：「版戶籍圖，地圖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有司徒所掌之圖：

周禮 地官 司徒：「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水、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小司

徒之職……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有宗伯之圖：

周禮春官宗伯：「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又有司馬之圖：

周禮夏官司馬：「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如此詳備之地圖，謂已實現於西周之世，自屬可疑。周官著作時代考（燕京學報第十一期）謂周官爲六國時作品。茲以其言地圖者觀之，似亦以六國時狀況較爲近情。孟子言正經界，而

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可推想其時當有戶籍與土地之圖爲行政之所需，是冢宰與司徒之圖也。至於司馬之圖，則爲各國行軍外交所必需，殆卽繪有山林川澤等地形之圖。至於管子所言地圖，亦復與此相近，而尤注重於行軍與地形。

管子地圖：「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理。此地圖之常也。」

此其情況，大抵與周官先後不甚相遠（參上章第五節）。至其確實時代如何，今固未易考明也。

第二節 輿圖之掌管與造送

秦代以前，政府中執掌輿圖者，周官而外，未見有明白之記載。漢代圖籍，則御史中丞掌之。秦代當亦相同。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

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六中丞》：「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爲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原注：「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識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爲中丞。」

三輔黃圖稱蕭何所得秦圖籍，於成帝時移藏祕書，至東漢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掌典圖書。

《通典卷二十六職官八祕書監》：「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原注：「以其掌圖書祕記，故曰祕書。」）後魏武帝又置祕書令一人，典尙書奏事。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尙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原注：「魏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晉武帝以祕書併入中書省，而祕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祕書監，并

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大唐武德初，復改爲監……天授初，改祕書省爲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祕書少監爲二員，通制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而祕書省但主書寫校勘而已。（原注：「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爲鄰。」）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爲之。」

祕書省與御史臺雖常比鄰而並藏圖書，但竊謂御史臺所掌，殆爲當時政治上應用之新圖籍，而祕書監所藏，則多關於學術史料之舊典籍，故爲「好學君子所樂就。」蓋前此三輔黃圖已言秦圖籍於成帝綏和中歸祕書，而後此則宋之祕書監，卽「掌古今經籍圖書，及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事。」（續通典卷三十。）元祕書監，亦「掌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及明洪武十三年，始以祕書監所掌內府書籍，「并入翰林院典籍，遂不復設祕書監。」（俱引續通典卷三十。）且唐、宋、金、元，又有集賢殿書院，亦「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事。」（續通典卷二十五。）至明代設翰林院，遂與祕書監合爲一耳。

後魏北齊及隋，尚有工部虞曹，亦掌地圖。

通典卷二十三，工部尚書虞部郎中一人：「虞部，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雜木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掌山澤草木鳥獸而阜藩之。」隋書卷二十七，百官志尚書省：「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殺膳雜味等事。」

此所謂地圖，殆非一般之軍政圖籍，乃山林川澤等特種地圖也。

後周仿周官官制，隋初有職方侍郎，而唐代亦有職方掌地圖。

通典卷二十三，兵部尚書，職方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堠，防人路程遠近，親化首渠。」

唐職方所掌輿圖，由各州府每三年或五年一造送。凡山河之改移，州縣之創造，以及都邑之廢

置，疆場之爭訟均隨時改正之。

唐六典兵部：「職方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皆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

新唐書百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堠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

唐會要職方員外郎：「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卽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五載春正月，……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

五代之際，各地方送圖之制，曾經作罷。

五代會要職方：「後唐天成三年閏八月，敕諸道州府每於閏年合送圖經、地圖，今後權罷。」

繼又有奏請勅諸道州府進圖經者。

五代會要職方：「長興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尙書吏部王權奏，伏見諸道州府，每遇閏年，准例送尙書省職方地圖者，頃因多事之後，諸道州府舊本雖存，其間郡邑或遷，館遞曾改，添增鎮戍，創造城池，竊恐尙以舊規，錄爲正本，未專詳勘，必有差殊。伏請須下諸州，其所送職方地圖，各令按目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或經新舊移易者，並須載之於圖。其有山嶺濱湖，步騎舟楫，各得便於登涉者，亦須備載。奉敕令諸道州府，據所管州縣，先各進圖經一本，並須點勘文字，無令差誤。所有裝寫工價，並以州縣雜罰錢充，不得配率人戶。其間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風俗所尙，皆須備載，不得漏略，限至年終進納。其畫圖候紙到，圖經別勅處分。」

據前引唐書、唐六典及唐會要，均言地圖三年一造送。而建中元年，則改爲五年一造送。茲所謂閏年圖者，則當爲五年兩造送。此制似尙未見五代以前之記載。但按五代會要所言，又若閏年進圖，已成慣例者然。豈此制之起，即在建中以後，晚唐之世乎？

及於宋世，卽仍沿五代之法，以閏年進圖；但亦間有再閏一造者，則與唐建中之五年一造送相

類也。

玉海卷十四太平興國閏年圖與國二年閏七月丁巳（八日）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三年，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尙書省。國初以閏年爲限，所以周知地理，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雍熙中，吳晉悉平，奉圖來獻者，州郡幾四百。淳化四年，詔畫工集諸州圖，用絹一百匹，合而畫之，爲天下圖，藏於祕閣。又令諸州所上閏年圖，自今再閏一造。至道二年二月，王炳言二十四司載籍，惟職方有諸司閏年圖云。……兩朝志，職方受諸州閏年圖及圖經。」

惟宋初地圖，曾由儀鸞司掌之，至咸平中以吳淑上言，始歸職方。各路圖本，十年一上。

玉海卷十四咸平職方圖：「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吳淑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山川險要，皆王室祕奧，國家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土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何以傅合他郡。請令諸路轉運使，從今閏年各畫本路諸州圖一面上之；每十年各納本路圖一，亦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廣輪，如指掌而斯

在。從之。」（宋史吳淑傳略同此。）宋史職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砦道里之遠近。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爲之籍，過歲造圖以進。四夷歸附，則分隸諸州，度田屋錢糧之數以給之。分案三，置吏五，舊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掌，受閏年圖經。國初，令天下每閏年造圖，納儀鸞司。淳化四年，令再閏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職方，轉動畫本路諸州圖，十年一上。」

此十年一上之圖，爲咸平四年以後新增之各路總圖，而諸州圖則仍五年一上也。自是以後，歷金、元以迄明、清，與圖掌於兵部職方，成爲通例。

續通典卷二十九兵部：「金兵部尙書一人，掌兵籍、軍器、城隍、鎮戍、廩牧、舖驛、車路、儀仗、郡邑圖志、險阻障塞、遠方歸化之事。」又：「元兵部尙書三人，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廢置之故，山川險易之圖，兵站屯田之籍，遠方歸化之人。」又：「明兵部尙書一人，職方郎中一人，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天下地理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與官軍車騎之數偕上。」

清通典卷二十五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主事，滿洲、蒙古各一人，漢人二人，掌天下輿圖，以周知險要，敘覈過以待掌罰黜陟。」

但其實際之來歷，則固源於後周官制之模倣周官也。

秦、漢以降，此類官藏地圖，實爲中國地圖史之中心。但其製繪之人，恐多出於胥吏畫工之手，未免有欠精確。故每隔數百年，卽有學者起而研究改進之，是則裴秀、賈耽、朱思本以迄清初測繪地圖之西教士，皆中國地圖史上劃時代之人物也。顧一二學者進步之製作，其影響常不能普遍，而各地方造送之地圖，依然出於胥吏畫工之手，未必合乎新制，是以實際上地圖規制，其舊者反較革新者之勢力爲大。若以爲新制一出，舊制全改，則不僅昧於史實，亦且誤解進化觀念矣。

第三節 秦漢輿圖

秦滅六國，殆併各國之圖籍亦席捲而入關中。且一統之局旣成，中央政府，不僅備有「天下」各種之圖，疑更有綜合之一統之輿圖，以爲全國行政用兵之綱領者。沛公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固爲

劉漢治天下之基礎。

漢書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且秦以前之圖籍，疑亦有賴以保存者。史記大宛傳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此「古圖書」疑卽秦以前者。及成帝時，猶從石渠閣移藏於祕書。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礮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移此藏祕書焉。」（按「移」字，四部叢刊本作「於」，此據宸翰樓叢書本。）漢書地理志注猶有引秦地圖者。

漢書地理志代郡班氏下注：「秦地圖，書班氏。」瑯琊郡長廣實養澤下注：「秦地圖曰劇清池。」

此項圖籍，大抵散亡於漢末之兵亂，故魏晉之世，裴秀卽言未之見矣。

晉書裴秀傳引禹貢地域圖序：「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院既無古之

地圖，又無蕭何所得。」

漢代雖得秦圖籍，而政治區域與名稱有變更，宜必另繪新圖，以應新政之用。其封建諸王，不僅按圖而定區域，又必例奏輿地圖。

史記三王世家：「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王子，不許。……大司空融……奏議曰，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又明德馬皇后紀：「帝按輿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
東觀漢紀明帝紀：「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按輿地圖。」

且西漢王國，不僅有本邦之圖，又備有天下之輿地圖。

漢書淮南王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又江都易王傳：「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

此殆由中央地圖鈔錄之副本也。王莽時銳意於禮樂地理之改制，故更定圖籍（漢書王莽傳）是則秦漢之制，亦必按圖籍規定，可以逆推而知也。至於東漢之世，中央之有一統輿圖，似有記載可據。

後漢書馬援傳：「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卽曉勸於囂曰：……前披覽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又鄧禹傳：「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

至此項地圖之來歷，大抵如後世職方地圖，由各地方政府進呈之圖籍合繪而成。班孟堅東都賦所謂：「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者是也。

漢代輿圖，流傳至魏、晉之世。

漢書武帝本紀注：「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晉書裴秀傳引西域圖序：「又祕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

諸雜圖。」

又據裴秀之說，則其製作殊欠精當。

晉書裴秀傳引禹貢地域圖序：「今祕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裴氏觀察所得之評語，所言當甚可靠。其文字上所謂「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固不離山海經之遺風（參上章第四節），而其不備載名山大川，則似較先秦地圖之注意地形者，反退步矣。蓋此等圖籍，大抵爲設官行政時查考之用，重在戶口政區等分配，而山川之關係較小，故遂因而疏略也。東晉以後，鮮有稱引漢圖者。水經注初學記及文選注史記索隱等間有稱引輿地圖及括地圖者，但不知各書所引，是否依據原圖，抑係由類書地志等間接引證；而所謂括地圖者，又不知是否即漢之括地雜圖，均不得而知；卽或確係引證漢圖，亦恐不免爲轉輾傳抄之本耳。

*

*

*

*

漢代行政上所用圖籍，雖疏於地形，其供軍事上之用者，或另有特種地圖。漢書淮南王傳所謂「部署兵所從入」之「輿地圖」，當即繪有「山川要塞」，而江都易王傳所謂「天下之輿地圖」（俱見前引），則或係普通行政圖籍，故另有所謂「軍陳圖」也。此外，如經略異域，則尤非圖其山川地形不可。是則李陵固曾從事此種工作。

漢書李陵傳：「陵于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後漢時李恂亦嘗爲之。

後漢書李恂傳：「後拜侍御史，持節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班固封燕然山銘所謂「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者是也。

後漢時張衡曾繪有地形圖（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此爲全國地形之總圖，抑係表示地形之特種地圖，不得而知；但其圖之略而不詳，及其表示實際地形之不甚真確，當可推知。且恐含有藝

術性質。及三國時吳主趙夫人以刺繡「寫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見拾遺記）殆亦與張圖相類；不過有繪畫與刺繡之別耳。

第四節 裴秀製圖

裴秀與中國地圖史上關係之重要，近今學者，類多知之。惟此皆由於晉書裴秀傳中保存其禹貢地域圖序之故。否則不僅裴圖無從考知，即宋以前中國製圖準則之究竟，亦將茫然也。故此篇圖序，雖文字不多，實爲中國地圖史上至可寶貴之材料，用特錄其全文如次：

晉書裴秀傳：「武帝受禪，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缺；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尙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

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羸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明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用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隔絕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此一篇文字中最重要者，厥維論製圖六體一節，關於此節文字之意義，清初胡渭氏言之甚明，閱此

則可以不必另作解釋矣。

胡渭禹貢錐指、禹貢圖後識：「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爲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則岡巒，下爲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險夷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爲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人迹而出於下與邪與直也，則爲平行徑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則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爲圖矣。」

此其說除地球經緯度，爲當時所不知外，今日言製圖方法者，在原則上均與裴氏之說相一致。日人內藤虎次郎據胡氏之說以爲裴圖已有計里畫方之法（見所著地理學家朱思本）。雖分率爲一事，畫方又爲一事，惟只講分率而不畫方，則爲不易想像之事實。內藤之說，固亦在情理之中也。然此

只能就其方法上之原則論，實際上禹貢地域圖之作，是否能悉按此種準繩而無差，仍屬不可盡信。且裴氏雖甚言漢氏輿圖之劣跡，但其說之立，未必出於裴氏之新創，殆不過由秦漢以來積累之製圖經驗，至裴秀而始著爲「成文」之規制耳。且按裴氏自序，固明言有吳蜀正確之地圖爲據，而其關於北部地域者，自以漢魏傳統之圖籍爲據，可以推知。至於裴序中所謂「大晉龍興，混一六合」，疑爲籠統誇大之言。蓋據晉書本傳，裴氏已薨於泰始七年，其時吳猶未平，故序中只言蜀地圖之用，或有差，但未及吳地圖之真確與否也。又按杜預春秋釋例有所謂司空圖者：

杜預春秋釋例卷五（武英殿聚珍本）「今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爲正。時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示略。咸寧六年，吳乃平定，孫氏居八郡之地，隨其宜增廣，今江表凡十四郡，皆貢圖籍，新國始通，文記所載，猶未詳備。若足以審其大略，自荆揚徐江內郡縣人以各還其舊城。故此三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也。」

雖裴圖亦成於泰始，但疑此司空圖並非裴圖，而爲官府中傳統之公用地圖。且在平吳以後，有江表十四郡所貢圖籍，爲裴氏所未及見也。

裴氏除製禹貢地域圖之外，又縮製一地形方丈圖。此種簡縮之地圖，大抵亦爲司空圖之一種，所以便檢查者。

北堂書鈔卷九十六，圖九，方丈圖：「晉諸公贊云司空裴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緜八十疋，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爲方丈圖，以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按隋書宇文愷傳稱：「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疑有錯誤。）

梁昭明太子謝地圖賚啓：「晉世方丈，比非其妙。」

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珍畫祕圖：「裴秀地形方丈圖一。」

此圖疑與禹貢地域圖之分爲十八篇者非一。至於晉諸公贊所謂「舊天下大圖」，殆卽杜預所言「司空圖」之類。吾人姑不問其內容之精確程度如何，卽就其「用緜八十疋」之多而論，已可想見其製圖工程之偉大。由是更可知裴氏之圖之淵源有自，決非鑿空之作矣。

且裴圖之作，大抵不過發凡起例，主持其事，實際上從事於製圖工作者，乃其門客京相璠也。

水經注穀水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季彥之誤）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

倉西南池水名翟泉。」

隋書經籍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撰。」

蓋裴氏身爲司空，其不能從事工作，固在情理之中。而京相璠又著春秋土地名，對於古地理自有相當研究，故禹貢地域圖亦注意於禹貢等古地名，是則裴圖至少在此一點上，當以京相璠之力爲多也。水經注引有裴圖，則其圖本宜尙存於北魏之世。又據歷代名畫記，知其方丈圖至唐猶存。唐代亦有地域方丈圖，殆卽沿晉制而改製者歟？

第五節 十道圖

永嘉以後，圖籍散失者多，而地圖則以圖幅寬大之故，保存爲難，損失尤易。漢括地雜圖之所能流傳較長者，大抵因圖幅較小之故。是以由東晉迄齊、梁，似無大規模之輿圖製作。但惟圖幅小者與文字多於圖繪之「圖經」代之以輿（詳下章）及北周有周地圖記一百九卷，隋代纂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隋區宇圖一百二十九卷（俱見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藝文志等），於是地圖與地志

合流，一方面爲後此總地志與方志之始基，一方面亦可謂此時地圖退化之結果也。

唐宋之世，中央政府所藏歷年各州府進呈之地圖，當甚豐富。政府亦必據此以製作一綜合地圖，爲體國經野之參考，故唐代有十道圖之作。其見於記載者，計有長安四年之十道圖十三卷，及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俱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又有李吉甫之元和十道圖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八年，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進六代略三十卷，又爲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按十道州郡圖，當即元和十道圖，惟其卷數當以十卷爲是。所謂五十四卷，疑因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而誤。

且此等十道圖，其附說甚多，全國行政大綱均備載焉。

玉海卷十五道志：「寰宇記引唐開元十道要略。」又：「開元十道圖，其山川所分，貢賦所出，得禹貢別州任土之制，今載六典。」

直齋書錄解題：「唐十道圖一卷：唐宰相趙郡李吉甫引憲撰，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俸

料。唐志云十卷，今不分卷。」按由此可知元和十道圖尚存於南宋。及五代之際，是項總圖，仍沿襲未替，又常隨時修改。

五代會要選事上：「後唐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等司公事，並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格式。……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見施行從之。」舊五代史、唐書、明宗本紀：「長興三年四月戊午，中書奏準勅重定三京諸州府地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在。具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從之。」五代會要州縣分道改制：「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室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

五代會要州縣望注：「晉天福二年正月，尚書吏部奏，自清泰三年創造以上三縣（平涼、同

川、吉陽，欲編入十道圖，皆未有地望，勅以吉陽、平涼並爲中縣，同川爲下縣。」
及宋祥符間，乃變而爲有說無圖之九域志。唐初規制，至是始絕。

玉海卷十四景德重修十道圖：「景德四年八月己酉，^{日十六}命知制誥孫僅、龍圖待制戚綸重修十道圖。書不成祥符六年十月戊子，判吏部真從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圖，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法官亦以定刑，而戶口歲有登耗，請校定新本。詔校理真鏞、邵煥、晏殊校定，王曾總領之。天禧元年，書成，凡三卷。詔付有司。」

又祥符九域圖：「祥符初，命李宗諤修圖經，有司請約唐十道圖以定賦役。上命學士王曾修九域圖，六年成。崇文目二卷……熙寧……八年六月辛丑，劉師旦言九域圖訛舛，請刪定。既成，王存言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名曰九域志。」

惟據直齋書錄解題（見前引），知元和十道圖，至南宋猶存，顧此在當時已成爲古物，失其實用之性質矣。

第六節 賈耽隴右山南圖與海內華夷圖

據舊唐書賈耽傳，知賈氏素留意地理之學，尤注重於四夷地理。

舊唐書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終始，是以九州之險夷，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

故其先行製繪而進呈者，爲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圖。

賈耽傳：「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然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政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眞。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

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別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兇之師，臣並研尋史牒，剪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爲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慚悚。」

賈氏所謂「職方失其圖記」，殆指新進之本土地圖而言。舊圖如長安開元之十道圖等，當不至毫無留存。否則關於隴右之舊圖俱亡，僅恃「採掇輿議」，賈氏亦未能憑空創製也。且賈氏以前，已有親歷西州之元載圖河西、隴右地形。

舊唐書元載傳：「大曆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爲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兼圖河西、隴右地形。」

其後李德裕之籌邊樓中，當亦有圖及隴右者。

新唐書李德裕傳：「乃建籌邊樓，按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餽遠邇成具。乃召習邊事者，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

而憲宗亦嘗覽天下圖，（殆卽十道圖之類，）見河隍舊封赫然。及大中間，張潮義始以瓜州、伊、肅、甘等本土之圖來歸。

新唐書吐蕃傳：「乾元後，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隍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明年，沙州首領張潮義奉瓜州、伊、肅、甘等土州地圖以獻。」
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潮義遣兄義澤，以瓜州、伊、肅等土州戶口來獻。」

舊唐書地理志：「上元年後，河西、隴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

賈圖成於隴右失而復得之時期。則其另著之別錄六卷與通錄四卷，其記注貞元以前地理事實，當甚詳備。惟其圖繪，則恐不如張潮義等所獻者之正確矣。

其後賈氏又製海內華夷圖，並撰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是在地圖史上爲裴秀以後劃時代之製作，其大概可於舊唐書本傳所錄賈氏獻圖表見之。

舊唐書賈耽傳：「至十七年（貞元）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舍，夙夜兢惶，去興

元元年，伏奉進止，今臣修撰國圖，旋卽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績用尙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藁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並撰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於增減，蕃落敘於盛衰。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思，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公曹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就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成小謝，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鄴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優詔得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檣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

由是可知此圖注意之點有二：一卽注重外域，故其圖名亦以華夷稱之；惟其關於異域之地理，

則因賈氏於大曆末爲鴻臚卿，乃得諸「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與外國職貢圖之來歷相一致，可知其道里方位之真確，當較內地爲差。顧其言釐正舊籍之誤，所舉事例，皆在邊州四夷，則賈圖亦頗有功也。另一點爲古地理之注意，此則與裴秀之圖相同，惟其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則爲裴秀所未有。日人內藤虎次郎以此爲後世沿革地圖用朱墨對照古今地理之濫觴（見所著地理學家朱墨本一文）。惟所謂「今古殊文」當只於文字上分朱墨，其圖繪則恐未必分別，且若所分朱墨爲指郡國道縣四夷述而言，則與圖又不相干矣。（關於賈耽事蹟及其著作之詳，可參內藤氏賈魏公年譜、方志月刊六卷一號有張其春譯文。）

由地位與事業言，則賈氏頗與裴秀相似，但不知賈氏是否有類乎京相璠者，爲之製作，賈氏僅自言：「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而已。」設賈氏更無其他學者助之，則恐其以自力指導述作之成分，較裴氏爲多，蓋京相璠固不失爲學者，當非畫工可比，且其爲隴右山南圖，賈氏固早已從事於採訪地理事實之工作矣。惟其圖之製作，當有舊官府地圖爲據，則大抵與裴氏相同。蓋前乎賈氏有長安與開元之十道圖，而後乎賈氏者，又有李吉甫之元和十道圖。賈圖既出，十道圖之制，尙沿至北宋

祥符間而始失其真（見上節），是亦可見傳統之官府地圖自有其不變之中心勢力存焉。至其以一寸折成百里，則亦裴氏「分率」之法。其後南宋刻石之禹跡圖，由賈圖縮製而畫方，可知賈氏原圖亦畫方也。

賈氏華夷圖不知至何時亡失。但其縮本之華夷圖與禹跡圖，則於南宋時僞齊阜昌七年（紹興七年）上石，至今其石尚存於西安碑林。圖上既言「唐賈魏公圖」，又有建隆、乾德、寶元等年號，並稱契丹即大遼國，故疑此圖爲宋人據賈圖縮繪，而又經遼人摹繪修改者。宋人所繪者，殆即樂史掌上華夷圖之類歟（參本章第八節）。至於此勒石之華夷圖，其內容雖簡，但可因以推見賈氏原圖之涯略。今觀其所繪中國山川及平面地形之輪廓，大致能與今世之圖相近似，此固非賈氏一人之功，但宋、元以降，則又常有較賈圖爲下劣者，賈氏在我國地圖史上自有其光輝地位也。

第七節 方誌圖與其他總圖

隋、唐之降，另有一種地圖，似與普通官府地圖來源不同者，曰「方志圖」（或方域圖）。此種

地圖，與道教及曆法家有關。如李淳風父子所撰方志圖：

舊唐書李淳風傳：「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

又天文志注：「李淳風刊定隋方志圖，頗爲詳悉。所注郡邑，多依用。其復州縣，又隸管屬不同，但據山河以分耳。」

又天文志：「且懸象在上，終天不易，而郡國沿革名稱屢遷，遂令後學難爲憑準。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至開元初，沙門一行，又增損其書，更爲詳密。」

似有分野之說寄寓其中。且其目的固因「郡國沿革名稱屢遷」欲依天象以求一永久之標準，其方法雖不合科學，要亦有科學之意向存焉。其後呂才尙獻甫均有方域圖，殆亦與此同類。

舊唐書呂才傳：「呂才，博洲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技之書。……太宗又令造方域圖及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

又尙獻甫傳（方技）「則天時……以獻甫爲渾儀監。數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

此等圖中，是否有分野圖說，雖未敢斷定，但其編製皆出曆法占星家之手，與普通地圖之源於各地方及職方官吏者，當屬另一系統也。

又據呂和叔文集有李該之地誌圖：

唐呂和叔文集卷三地志圖序：「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原注：「一作序」）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成郭，羅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自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因不可同年而語其詳。

略也。……窮地而述，學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

據此，則李圖固亦有分野。惟其圖之要素，則不但表明當代形勢，似兼有沿革地圖之成分焉。

此等方志圖，及以圖爲附庸之地志而外（詳下章），唐代尙有數種總圖，可附述於此：馬敬寔之諸道行程血脈圖一卷（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與圖譜略記無，及崇文總目）殆卽全國道路總圖；而江融之九州設險圖：

舊唐書魏元忠傳：「時有左史蓋匡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韋瑾之域中郡國山川圖經：

玉海卷十四唐天下圖：「書目：域中郡國山川圖經一卷，韋瑾撰，始關內，終劍南爲圖。」（又

卷十五唐郡國志節略同。）

則爲山川形勢之總圖而有附說者，亦「圖經」之類也。另有唐地域方丈圖與地域方尺圖，或卽十道圖之改製本。

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稱唐地域方丈圖、唐地域方尺圖各一卷，並見圖譜略記無方丈圖如爲廣袤各一丈，則約當賈耽華夷圖面積（廣三丈縱三丈三尺）十分之一。

方丈圖之制，晉時裴秀早已有之。故疑爲「晉世方丈」流傳至唐，而唐代因以改製者。（參前第四節。）

第八節 宋代總輿圖

宋代職方承隋、唐舊制，各地方進諸州閏年圖及圖經，而圖經之編制，至宋代始大盛。明、清以來，方志之作，汗牛充棟，實多於宋代植其基礎。（參下章。）以是純粹地圖之製作，不免視唐代爲較遜。但圖經雖以記述爲主，亦皆附有地圖。而其他各種輿圖，數量亦復不少。茲略述其時之總圖與邊裔

圖，亦可以見宋代輿圖之概要矣。

據眞宗滋福殿觀圖之記載，可見宋初滋福殿所藏各地方輿圖，甚爲詳備。

玉海卷十四，至道滋福殿觀地圖：「至道三年七月四日，眞宗語宰臣曰：朕欲觀邊防郡縣，山川形勢（一作地形），繪圖以獻。丙寅（四日），御滋福殿召輔臣觀西鄙地圖，指山川堡壁曰：朕已令屯兵於地內州郡，簡冗省費，以息關輔之民。咸平四年十月庚戌，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地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畛，已命張雍出守，冀其撫綏有方。次指殿北靈壁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智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沙、伊、涼等州圖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山外，與禹貢所述異。又指北壁幽州北契丹國界圖，載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上曰：封域非廣，惜燕、薊之淪異族也。是年八月戊申，上出環慶清遠軍至靈州圖，指示輔臣。又指靈州西榆木天澗路，且議戰守方略。五年六月甲申，對輔臣於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示山川要害。」

至景德間曾下詔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

玉海卷十四，景德山川形勢圖：「四年七月戊子，詔翰林院遣畫工分詢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納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元年十月甲午，令張齊賢、丁謂具青、淄、齊、鄆、濮等州山河道路形勢，畫圖以聞。」

其後所製總圖之見於著錄者，有晏殊之十八路州軍圖：

玉海卷十四熙寧十八路圖：「仁宗初，晏殊以十八路州軍三百六十餘所，爲圖上之。表曰：……」

趙彥若之十八路圖：

玉海卷十四熙寧十八路圖：「熙寧四年二月甲戌（十八日），召集賢校理趙彥若歸館，管當畫天下州軍府監縣鎮地理。先是，中書命畫院待詔繪畫上之，欲有記問者，精考圖籍，故命彥若六年十月戊戌，上十八路圖一，及圖副二十卷。」

玉海卷十五熙寧九域志：「四年二月甲戌，命趙彥若歸考圖籍，畫天下地圖。六年十月甲午（一云戊戌），上十八路圖二，及圖副二十卷。」按宋史藝文志亦著錄，並註云：「熙寧間，天下州」

府軍監縣鎮圖。」惟不著撰人。

稍後，則又有沈括之天下郡縣圖（見宋史藝文志）。

玉海卷十四，天下州縣圖：「熙寧九年八月六日，三司使沈括言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圖，其間未全俱。先曾別編次一本，稍加精詳。欲再於職方借圖經地圖等草，躬親編次。從之。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賜絹百疋，以括上編修天下州縣圖故也。」

至於王洙等之皇祐方域圖志（見玉海卷十四及宋史掌禹錫傳）李德芻之元豐郡縣志（見玉海卷十五及宋史藝文志）及薛季宣之九州圖志（見倪瓚補宋史藝文志及雍正浙江通志引萬曆温州府志）雖皆附有地圖，與寰宇記輿地廣記之無圖者不同。但究以記志爲主，地圖實其附庸也。南宋偏安，尙有王象之之輿地圖，淵源於西蜀。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王象之輿地圖十六卷。紀勝逐州爲卷，圖逐路爲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諸郡尤詳。其兄觀之，漕夔門時所得也。」（按補宋史藝文志稱王觀之撰。）

陸九韶亦製有州郡圖。

宋史陸九韶傳：「九韶著作，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而光宗時黃裳亦製有輿圖，並製渾天儀、天文圖等。

宋史黃裳傳：「時光宗登極，裳進對：……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皇紹運，以百官終焉……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輿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至於黃氏及朱子，皆製有地形模型，則前已述及之矣（第一章第五節）。此外又有刻石之王致遠地理圖，其碑猶存蘇州府學。據王氏所題，知此圖由蜀中得來，淳祐七年仲冬摹刻。是為次於華夷圖之現存古地圖，但其規制，已不如華夷圖之佳勝。蓋此係一般之繪圖，與華夷圖另一系統也。惟北宋初樂史之掌上華夷圖（見玉海卷十四、十五及宋史樂黃目傳）則疑為賈耽華夷圖之簡縮本。若然，則今西安碑林中之華夷圖，殆亦以此圖或其傳鈔本上石者歟？通志圖譜略記有著錄華夷圖一種，不知是否為賈圖，抑即樂氏此圖。至於乾道間選德殿中屏風上之華夷圖，乃所以便御覽者，其時

大臣，或因君命而做製。

玉海卷九十一乾道選德殿御屏風華夷圖：「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座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分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襪識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

此外則總圖之撰人及時代未明者，尙有混一圖（宋史藝文志）地理圖（宋史藝文志兩見）玉海卷十四亦有地理圖（十七路圖）（通志圖譜略記無）等；而天下至京地理圖（通志藝文略）諸路至京釋程圖（通志圖譜略記有）十七路轉運圖（通志圖譜略記無）則皆路程之總圖也。至於稅安禮之地理指掌圖，則係沿革地圖性質。

直齋書錄解題：「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頗闕不備。此蜀本有涪右任愷序，言之頗詳。」

朱子語類：「指掌圖非東坡所爲。」

玉海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蘇軾爲指掌圖，始帝嚳迄聖朝，爲圖凡四十有四。其序曰……

書目二卷，不知作者。始自帝嚳，迄於皇朝，圖其疆域，著其因革，刊其同異。」（宋史藝文志有「指掌圖二卷」或即此圖。）

吾人所知統貫古今之沿革地圖，蓋以此爲最早，且至今猶未亡佚。惟今閱其翻刻本，（明刻單行本及明何鏜編修攘通考本）則內容殊粗略耳。

第九節 宋邊裔圖

北宋疆土，較唐代爲促小。昔日邊地，多淪爲異域。政府常有收復失地之意。以是宋代邊裔地圖，較爲衆多，而尤以契丹及與幽燕一帶爲主。吾人由此邊裔地圖之多寡詳略，亦可以略覘其對外關係之輕重焉。

眞宗於滋福殿觀地圖，卽注意於邊防地圖，可見北宋初對於邊疆之注意。（參上節所引玉海卷十四，「至道滋福殿觀地圖。」）及嘉祐間，歐陽修及曾公亮更爲圖籍，亦着意於邊務。

玉海卷十四元祐職方圖：「嘉祐五年，歐陽修爲樞副，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

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

至若契丹與幽燕地圖之見於記載者，在後唐時已有契丹所進圖。

補五代史藝文志：「契丹地圖一卷。長興三年，契丹東丹王突欲進。」

及宋太祖時，有曹翰之幽燕地圖。

玉海卷十四：「太祖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曹翰爲之。上曰：然。普曰：翰可取，孰可守云云。」

至道元年，破契丹，楊守斌乃上地圖。

玉海卷十四元祐職方圖：「至道元年，府州折御卿大破契丹，圖山川地形以按視焉，三月內

楊守斌以地圖來上，帝閱視久之。」

及嘉祐間，趙至忠又上契丹地圖。

玉海卷十六嘉祐契丹圖：嘉祐二年四月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虜廷雜記十

卷，言虜中事尤詳。」

而沈括之使遼圖抄，乃出諸有科學素養者之手，又因出使而親歷其境，其內容當較精確。

宋史沈括傳（沈遘傳附）：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文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

通志藝文略：「沈括使遼圖抄一卷。」（圖譜略有沈括使北圖，當係即使遼圖抄）。

沈氏又曾以木蠟等創製邊境之地形模型，而邊州皆爲木圖藏內府焉（參第一章末節）。此外另有契丹地理圖及契丹疆宇圖，其作者與時期均未之知。

宋史藝文志：「契丹地理圖一卷，並不知作者」（亦見通志圖譜略）又「契丹疆宇圖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契丹疆宇圖一卷，不著名氏。錄契丹諸夷地及中國失地。」

玉海卷十六，熙寧北道刊誤志：「契丹疆宇圖二卷，地理圖一卷，不知作者。」

是疑有與前列數圖同一，或由前圖仿製而改訂者。

關於西北地圖，則有鄭文寶之河西隴右圖：

玉海卷十四咸平河西隴右圖：「鄭文寶傳，咸平中命相府召詢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亦言靈州可棄。序曰：淳化初，掌漕陝右，周覽河隴徧尋方志，廣問象背，探月支日逐之穹廬，討金城玉關之甌脫，列於藻繪，煥然在目。」按宋史盛度傳略同，但不引序文。

曹韋、張宗貴之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

玉海卷十四，詳符山川城寨圖：「三年四月，先是曹韋、張宗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己未，上出示王欽若曰：處置得宜，儲備詳悉，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宜令別繪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密院，令諸將按圖以計事。」

盛度之西域圖與河西隴右圖：

玉海卷十四河西隴右圖：「天禧二年十一月，己未朔，以知制誥盛度爲學士。先是，度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祥符六年，遷知制誥。明年，奏事使殿。上問山川形壤之制，內出繪命工別繪度因言已圖漢所置五郡（酒泉至金城）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唐置節度，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爲河西隴右圖以獻。上稱其博學。」（宋史盛度傳略同。）

其後劉渙又得西州地圖以獻：

玉海卷十六景德交州圖：「康定二年，劉渙抵青唐，得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四月庚辰，爲秦隴招安蕃客使。」

而元豐中劉昌祚又上鄜延邊圖。

玉海卷十四元祐職方圖：「元豐六年七月壬申，知延州劉昌祚以鄜延邊而東，自義合西至德靜，綿互七百里，堡寨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乃立爲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強弱，分地望，畫山川形勢上之。上嘉納。」

又有所爲「對境圖」者，蓋亦當時之邊疆圖也。

玉海卷十四元祐職方圖：「舊有西界對境圖。自與師西討，諸處所奏異同。元豐五年六月己未，詔畫五路都對境圖。」

玉海卷十六元豐五路對境圖：「五年六月己未，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西討以來，奏報文字，指畫山川道里多異同，無以考證。今逐路選委出界，就知賊境次第者，差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

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候到，取舊對境圖及軍興奏報，比對考校，繪爲五路都對境圖。

又有大遼對境圖、大金接境圖及西夏賀蘭山圖（俱見通志圖譜略記有），其作者及時期，均未詳。此外更有六合運掌圖。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六合運掌圖一卷，不著名氏，凡爲圖四十，首列禹跡，次爲中興後南北三境。其後則諸邊關隘險要，以及虜地疆界亦著之。」其名稱雖似普通輿圖，實乃邊境圖之性質也。

第十節 朱思本輿地圖及其影響

中國地圖自裴秀以後，至賈耽而爲之一振。後此除沿襲賈圖外，一般官用地圖，大抵仍依傳統之繪法。北宋沈括，固有科學修養，且亦從事地圖與模型之製作。但非專志於此，故在體制上似無大進。及南宋時華夷禹跡二圖上石，而賈圖勢力，亦幾於強弩之末矣。降及元代，乃有朱思本崛起，輿圖

之作，始又中興。歷明代以迄清初，多爲朱思本之勢力所統罩，其影響之大，較元以前之賈圖有過之無不及焉。（關於朱思本之身世及其所製輿圖事，有日人內藤虎次郎之地理學家朱思本一文考之甚詳，原文刊於日本大正九年之藝文雜誌，繼而編入其昭和四年所刊之讀史叢錄中。後吳晗先生譯爲漢文，並附跋尾，加以補證，刊登於北京圖書館館刊七卷二號。本節所述關於朱思本自身事跡，卽多據此。欲知其詳，可參譯文。）

朱思本事略，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所述甚爲簡要。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二十二：「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鈔本）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江西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從張仁靖真人扈直兩京，又從吳全節居都下。後主席玉龍萬壽宮。嘗以周遊天下，考覈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惜今不傳。」按內藤氏所考朱思本事蹟，卽以貞一齋雜著（適園叢書本）爲據。

凡此多與內藤氏所考相同，惟朱圖曾勒石上清，則爲內藤氏所未及。但有數事，爲內藤氏所考明者，卽爲朱氏生年在元世祖至元十年，而卒時在順帝初年。又其事與朱氏製圖及遊歷頗有關係者，則

元代注重道教，而朱氏常奉詔代祀名山河海是也。故朱氏遊歷之廣，實非偶然；而古今學者之成功，固未能盡恃天才與興趣，要亦有適當之境遇以養成之也。

朱思本原圖，今已不可得見，惟據姚際恆之好古堂書目著錄元朱思本與圖大本一本，則似尚存於清康熙間。今日可以間接推見朱圖者，惟賴明羅洪先之廣輿圖及其他轉輾改製之圖耳。朱圖原名輿地圖，貞一齋雜著有「輿地圖自序」而羅洪先廣輿圖序有「因廣其圖至於數十」之言，千頃堂書目亦著錄「羅洪先廣輿圖四卷」，可知廣輿圖之名，乃因羅氏增廣而改稱者也。

關於朱氏足跡所至，及其製圖之依據、經歷與時期，則由朱氏自序可見其概：

羅洪先廣輿圖朱思本自敘：「予幼讀書，知九州山川，及觀司馬氏周遊天下，慨然慕焉。後登會稽，泛洞庭，縱遊荆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轍燕趙，而京都實在焉。繇是奉天子之命，祠嵩高，南至於桐柏，又南至於祝融，至於海，往往訊遺黎，尋故迹，考郡邑之因革，覈河山之名實，驗諸潞陽安陸石刻禹跡圖（貞一齋雜著作「樵川」）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圖，乃知前人所作，殊爲乖謬，思構爲圖以正之。閱魏鄴道元注水經、唐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元豐九域志、今祕府大一統志，

參考古今，量校遠近，既得其說，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大夫，使於四方，遐爾攸同，冠蓋相望，則每矚以質諸藩府，博采羣言，隨地爲圖，乃合而爲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始成功。其間山河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若夫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蕃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如。嗟乎！余自總角，志於四方，及今二毛，討論殆遍。茲圖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後之覽者，始知其非苟云。是歲日南至，臨川朱思本初父自敘。

由是可見朱氏之圖，雖未嘗無圖籍之依傍，而其足跡之廣，目驗之多，自屬突勝前人。裴秀、賈耽均弗如也。且其圖止繪華夏疆土，若賈氏之得諸傳說詢問者，均爲朱氏所不取。「姑用闕如。」則其求真覈實之態度尤足多者。小川琢治氏猶欲推究朱氏曾否參考阿拉伯輸入之地球儀，而謂廣輿圖之西南夷圖及建文朝鮮圖，有類於印度輪廓之 Ptolemaeus 地圖（見所著中國地圖學之發達）；殆小川氏並未注意朱序篇末所言對於外域之闕疑，而所謂西南夷等圖者，當係羅洪先所增廣，非朱思本所繪。其在官府，則仍有傳統之職貢圖（據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紀）之作，相當於外國圖焉。

又據羅氏廣輿圖序附記謂：「朱圖長廣七尺，」是則朱氏先「隨地爲圖，」而後乃合成此「長廣七尺」之總圖也。羅序又言朱圖「有計里畫方之法，」今所見廣輿圖固亦畫方者。設此法始於裴秀，則自裴秀、賈耽以迄朱思本，其間雖以次相距約五百年，但其方法可謂一脈相承遙相應者；彼司空圖、十道圖、十八路圖之類，竊恐未必畫方，仍係胥吏畫工之普通繪法。雖二者之間，非無關係，未易劃分，但亦可謂系統各別淵源不同者。故元代另有經世大典地圖（魏源海國圖志據永樂大典本轉錄）蓋亦官府傳統之輿圖，與朱圖之出於私撰者有別也。

*

*

*

*

朱思本之製圖雖利用國家公務之機會，而實係私人之作，官府圖籍恐未必因而改觀。即在元末明初之際，一般輿圖殆亦鮮受影響。及嘉靖間有羅洪先氏，因朱圖而改製爲廣輿圖，其勢力始稍普及。設無羅氏之作，恐朱圖早已湮沒不彰矣。是則羅氏實可謂朱圖之功臣也。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明史本傳僅言其「考圖觀史，自天文、地理、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研。」但未言其製廣輿圖。惟藝文志中列有「羅洪

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二卷。羅氏自序後附記言「朱圖長廣七尺，不便舒卷，今據畫方，易以簡編。」可知朱氏之由分圖而合爲總圖者，至羅氏則又因其綜合之圖，而分繪之也。今其圖之普通刻本（清翻明萬曆本），尙不難見之。卷首除朱氏及羅氏自序外，有嘉靖辛酉（四十年）胡松及徐九臯序各一，嘉靖丙寅（四十五年）霍冀韓君恩序各一，最後爲萬曆己卯（七年）錢岱重刻廣輿圖序。胡松序云：「佐余意程梓辦費。是正讎校，則武進左子丞之勞多矣。」韓序又云：「念庵羅先生考訂增定，從而廣之，家藏未傳。家宰我柏泉胡夫子刊布著論，始傳於浙，猶歎未廣；夫子以恩爲門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可知此圖最先由胡松刊行，繼而韓君恩又爲翻刻，及萬曆初錢岱之刊行，已屬第三次矣。

陳相綬皇明職方地圖大序云：

「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庵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衛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參以桂少保、李太宰、默二公之圖，廣以許論之邊圖，鄭若曾之海圖，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意置制，略無異議。」

陳氏不知圖敍與邊圖爲韓君恩所加入（參下）固係忽略，但其言朱思本舊圖之「山川悉」而「郡縣則非」，至羅念庵始增廣之，殆係事實。蓋朱氏注意於方位分率之真確，而羅氏則着意於記注地名之詳備，其致力之點有所不同也。羅氏在自序中附記其圖，共有「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六」、「九邊圖十一」、「洮河、松潘、虔鎮、麻陽諸邊圖五」、「黃河圖三」、「漕河圖三」、「海運圖二」、「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圖四」。又言「凡沿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旁綴者，各爲副圖六十八」。可見其增廣朱圖者甚多。但今日檢此通行圖本，除黃河、漕河、海運實各一圖，而分畫爲三幅外，另有琉球、日本二圖，爲胡松刊布時所增（胡序言「爲補倭及琉球兩圖」）。此外卷末尙有華夷總圖一、朝鮮圖、後有東南海夷總圖及西南海夷總圖各一，羅氏未曾述及，疑爲刊行時所加入。至於羅氏所謂副圖六十八，今亦不見。究竟是否尙未刊行，抑爲後刻之本所刪略，則因未見各種刻本，未能遽下斷語。

韓君恩序云：「……因各出目耳觀記，并增桂見山先生進宸圖敍十六首，許默齋先生邊論九首，付青郡杜守校刻爲書。」所謂桂見山進宸圖敍，卽桂萼與圖記敍，「許默齋邊論」卽許論九邊

圖論，可知此皆原圖稿及第一次刊本所無，而爲第二次刊行時加入者。至於桂氏輿圖，亦成於嘉靖之初，原爲李默所作之天下輿地圖，其圖大抵源於官府圖籍，既不畫方，亦不如羅圖之真確，其系統實各不相同。九邊圖論亦然。（關於桂萼與李默輿圖之考證，詳拙著明代輿圖考，編入一九四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中。）

萬曆末葉，有汪作舟刊廣輿考（北京圖書館藏原刊殘本）。按其內容，蓋即據羅氏之圖而改製者。及崇禎間，陳組綬又因羅圖改製爲皇明職方地圖三卷（北京圖書館藏原刊本），其內容大抵較羅圖爲稍勝。

皇明職方地圖大序：「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里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辨。舊圖（按即指廣輿圖，下倣此）於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京省郡縣，全在責實於內，故凡逋逃藪澤，不可不備。舊圖於邊牆圖其內，不繪其外，所以圖以內易見，而圖以外難知。九邊之要，全在謹備於外，故外夷出沒，不可不詳。舊圖邊鎮不分，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四邊雖失，猶二祖之版圖也，烏可遂棄而不問？舊圖有黃河有漕河，皆今昔莫辨，而無農丈人之禹貢河山圖，無江

山圖，無弱水圖，無黑水圖；以此高山不足以刊旅，大川不足以滌源。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無太僕圖。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朝代異則沿革異，故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爰作天下大一統圖二，以便全覽；作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五，以知官守；作新舊九邊圖，七鎮圖十有五，以嚴大防；作山川圖四，以察地勢；作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作太僕統轄圖一，以知馬政；而亦尾以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島夷圖終焉。」

今以廣輿圖與此圖相對照，知上述特點，除確增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四邊圖，江山圖、弱水圖、黑水圖、海防圖、太僕牧馬圖，以及萬曆後地名沿革之修改外，其他特點，則兩圖大略相似。廣輿圖之漕運圖僅繪運河，而職方圖之漕黃治蹟圖則黃河與運河合繪。關於運河沿岸地名，反較漕運圖稍略。惟以大體觀之，則職方圖較為寬大，圖中所註文字較小，不若廣輿圖之擁擠雜亂。（此據清初翻刻本廣輿圖言之，嘉靖刊本不知較佳否。）而圖繪亦較清新美觀，圖旁及圖後記注亦較詳。此外則廣輿圖有東南海夷及西南海夷兩總圖，而職方圖則併爲皇明朝貢島夷圖；廣輿圖卷末有華夷總圖一，職方圖無之；又廣輿圖中有日本圖（鈔鄭若會所製）而職方圖代之以日本入寇圖，此亦二圖

互有詳略之處也。

至於大序中所謂「七氏之圖」，大抵係指上文所言朱思本、羅念庵、桂萼、李默、許論、鄭若曾以及所謂農丈人七家之作而言。（農丈人，卽余寅、鄞人。）此外文字上所引申用懋九邊圖說程百二方與勝略諸書，尙不與焉。是則職方地圖不僅承襲朱羅二氏之系統，亦可謂集元明輿圖之大成者矣。

較職方地圖稍後，有吳學儼等之地圖綜要（有崇禎末年刊本）及潘光祖之輿圖彙考（清順治刊本），皆直接或間接出廣輿圖，惟地圖綜要之江防圖，較前爲詳備，而輿圖彙考則各圖均不畫方，僅形式尙與廣輿圖相近耳。且二書之圖，均較簡略，而文字記注益多，尤以輿圖彙考爲特甚，故實際上可作爲地志，而輿圖乃其「附庸」，此卽所謂「未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者也。（四庫提要地理類敘中語）

此外又有清代舊鈔本輿圖，坊間偶可見及（北京圖書館藏有二部），其內容頗與廣輿圖相類，而間引羅氏說，初不知其作者與來歷，後經茅乃文先生之查勘，發現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附

圖，與此皆相同，以是知此類抄本，殆在方輿紀要未刊以前，由顧氏稿本傳鈔者。但此類鈔本，未必定在紀要始刊以前，蓋因轉輾傳鈔之故，或未免忘其來歷，仍視爲稀見之圖本而鈔錄之也。

至於其他明代輿圖之在朱思本系統與非其系統下者尚多，惟除桂萼、李默之圖可明知其不同朱圖外，其餘多因未見原圖，不易辨別。茲列其總圖之待考者如下，以見一斑（參明代輿圖彙考）。

- (一) 項篤壽考定輿地圖十卷。（見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
- (二) 沈元華輿地圖志三十卷。（見千頃堂書目。此疑爲地志性質。）
- (三) 程道生輿地圖考六卷。（見汪氏振綺堂書目，並入禁書目。）
- (四) 仙克謹中邊圖志考。（見禁書目。）
- (五) 許重熙輿地分合指掌圖。（見千頃堂書目及常昭合志藝文志。）
- (六) 袁中道輿圖考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及徐氏家藏書目。）
- (七) 姚星吳輿地圖。（見康熙杭州府志人物志姚星吳傳略。）
- (八) 周子德輿圖。（見振綺堂書目。）

(九) 沈翹楚廣輿圖考。(見培林堂書目及傅是樓書目)

(十) 方輿圖「四冊明刊本」。(見孫氏祠堂書目)

(十一) 中原地理總圖。(見棗竹堂書目)

(十二) 地理圖十卷。(見季滄葦書目)

大抵自顧祖禹輿圖出後，其因朱羅二氏之圖而改製者絕少。惟清初西教士所測繪之中國地圖，在當時並不普及，故朱氏系統下之地圖，在清初宜仍有相當勢力也。

第十一節 利瑪竇世界地圖及其影響

利瑪竇世界地圖之史蹟，禹貢半月刊第五卷三四期曾出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論述此圖及其有關之史實與材料，至為詳備；而其中尤以洪燮蓮先生之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陳觀勝先生之利瑪竇對於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二文為中心，本節即多據此。欲知其詳，則參閱該專號可也。

中國之知地爲球形與經緯線之世界地圖，當在元初阿拉伯天文地理學輸入之時。元世祖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其中卽有地球儀。

元史天文志：「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爲圓球，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由此說明，知其爲地球儀無疑。但其時新大陸尙未發現，此地球儀所繪地域如何，實爲一頗有趣味之問題。顧其在當時地學知識之影響，恐甚狹小，其內容亦無從考見。逮明末利瑪竇世界地圖出，而後地球與近代世界地圖之知識，始爲一般士大夫所注意耳。

利瑪竇 (Matteo Ricci) 於明嘉靖三十一年（西曆一五五二年）生於義大利之馬西勒太 (Macerata)，及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年）利氏東來至澳門，其目的全在宣傳天主教。但因當十六世紀發現新航路，與探險新地之時代中，對於地理之學，亦相當注意，故於東來途中未達澳門之前，已注意於南北極之高低。又至澳門不及一年，卽爲范禮安神甫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 以拉丁文著華國奇觀一文，其中卽附有中國地圖。此圖當卽參閱中國通行地圖繪製。後又

將此文以西班牙文重編於一函，於萬曆十二年八月初十由肇慶寄其友人。函中即有關於中國地圖之言：

「竇今未能先寄奉西式中國全圖，而繼以原式各省分圖，蓋尙未整理就緒也。然無論公何往，總期能於近中寄奉。公見此等圖樣，將謂一切省邑，皆繪得精美。」

是則利氏於介紹世界地圖於國人之前，已先將中國地圖譯製而宣揚於西人也。惟中國「原式」地圖，只知畫方之法，或且有併畫方而無之者，其與西式地圖之有經緯度者異趨。欲將原式改繪「西式」，非先從事於測量工作不可。故利氏每注意於中國各地經緯度之測量，同時又轉而介紹西式地圖於中國。但其後所以屢次繪刻世界地圖之故，一方由於國人好奇之心理之要求，一方則利氏亦迎合此心理以堅中國士大夫對於西人之欽仰，而爲宣傳天主教之助力也。此中消息，於利氏入華記錄中言之甚明：

「各神甫以一張西文世界地圖置大廳內。中國人聞所未聞，其智者欲得漢譯本以研究其內容，當時利神父已稍知漢文，於是長官命利氏爲之，使盡譯原圖上之註釋，且擬刊行以佈全國，

而收衆譽。

「幸而利氏昔在羅馬時曾從克拉微烏神甫 (Christoforo Clavio) 學相通數理，遂與已相識之士人某共爲之。已而世界地圖製就，較原本爲大，而漢文注釋，對漢人立言，亦較原文爲佳。欲使中國人重視聖教事宜，此世界地圖蓋此時絕好絕有用之作也。前此中國人亦自刊刻輿地圖誌多種，然僅以中國之十五行省居圖之中部，稍以海繞之，海中置島若干，上列知聞所及諸國之名，合諸島之地廣袤，不及中國一小省也（按此係當時海圖之實際情形）。彼等既以爲世界惟中國獨大，餘皆小且野蠻，則欲使彼等師事外人，殆虛望而已。

「迨彼等既見世界之大，中國小而局處一隅，其愚者輒加此圖以訕笑，其智者反此。圖中經緯度，南北二分，赤道五帶，整比齊列，地名繁多，國俗各異，既皆出於舊圖，而舊圖亦爲刻本。雖欲不信，不能也。

「此後若干年，無論在北京抑在各地地方，諸神甫輒修訂而改刻此圖，印而又印，傳行遍滿中國。其如何使吾人受榮甚多，如何使中國人對善於測繪之歐洲學者深致欽仰，吾人將復敘及。且

此圖表現海洋廣浩，而歐洲諸國，去中國至遠，彼等將不復虞歐人之東來侵略。此其堅拒信教要因之一，將不復存在矣。」（據洪煨蓮先生文轉引，下倣此。）

由此可知中國人士對於世界地理之態度，至爲明顯。而利氏利用此圖以爲傳教之工具，則金尼各神甫之中華傳教記尤直言不諱：

「利神甫曾從數學大師克拉微烏受業，故甚精數理，遂從事編製此圖。利固深知殊方傳教，不可泥執一法，而此事適與彼傳佈福音之計相合也。誠然以此爲餌，中國人頗多落入教會網中者。此圖較原圖爲大，蓋漢字大於西文字母，且於原圖注釋，利氏多相度中國文脾味，及對彼等傳教之便利而改增焉。鼓及各國風俗，利氏輒述及吾國聖奧，俾藉圖而傳佈於中國。此中國人前此所未聞者也。」

利氏第一次繪刊之世界地圖，係於萬曆十二年在肇慶時所繪，嶺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爲之刊印，分贈要人。利氏自言其圖甚爲粗率。

利瑪竇全集 萬曆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利氏寄羅馬耶穌會總監函：「寄奉漢文譯本之天

主十誠、天主經、聖母經，此外又西式畫而漢文譯名，漢里、漢辰計算之世界地圖一張。此圖肇慶城長官命寶編製方就，彼卽刊印。圖中頗有乖訛處，半出於手民，半出於寶。初不知其刊印之急，故編製稍或疏忽，在歐洲不足觀也。然長官甚珍視此圖，藏其版於所居，不願以印本傳售，而乃以饋贈中國要人。此庶亦長者所樂聞乎。」

及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春，利氏由韶州北行，欲往北京。及至南京，不得志，乃回南昌，爲江西巡撫陸萬垓所善視，又獻其所繪世界圖誌於建安王多燦。萬曆二十四年，復爲王佐等繪二三圖，自言其較以前所製爲勝。

全集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寄耶穌會總監函：「日前往謁本地長官（南昌知府王佐），贈以石製晷儀二枚，彼酬寶以錢甚多，且請再爲製造他項巧物。因此，寶遂爲編製世界圖記，多附注釋，今尙未訖。好巧之人，常來觀看，且謂此當爲中國人所極重者也，請必以付印。多年前寶曾製一圖，然解釋既陋，而刻印主於他人，其工復劣，故尙不甚爲人所珍。今所爲圖若出，當遠過之矣。」（按此所謂「多年前」曾製之圖，顯係在肇慶所繪而王泮所刊者。）

此爲利氏第三次繪製之圖，但曾否刊行，尙待考證。萬曆二十六年夏，利氏離南昌，又欲往北京，在南京時，知應天巡撫趙可懷，曾得其友人所贈利氏圖而摹鑄上石於蘇州。蘇州府志云：「山海輿地全圖中丞趙寧宇刻石，在姑蘇驛。」不知此石或其拓本，今尙有殘存否。苟有所獲，則圖本雖劣，亦可以見其最初本之內容焉。

利氏於萬曆二十六年八月達北京，留約二月，不得志，又南返，至蘇州。二十七年正月，回南京。遇達官吳左海（中明），請利氏修訂其圖，而爲之刊行，較前圖又擴大而詳備。據人華記錄所述，可見其圖受時人歡迎與傳播之廣。

「不久有達官吳左海者，請利神甫修訂某廣東所印之世界地圖，且增加注釋焉。吳氏擬重新刻此圖於署中，凡人欲刷印者皆許之。」

「利神甫於是繪較前本更大之圖，事物注釋，皆有所增加。吳左海喜甚。卽延巧工刻之，且弁以美序一編。」

「新刻果較廣東本爲完美，其爲衆所賞識亦較廣，刷印更多，流遍各地諸神甫。亦有以寄往

澳門及日本者，他人亦有從而翻印者。」

其時若誠有翻印者，則其圖當較原本爲粗劣耳。萬曆二十八年，利氏又離南京再赴北京。上表進貢。其貢品中卽有萬國圖誌一冊（見黃伯祿正教奉褒）。此後利氏卽長居北京。約在萬曆二十九或三十年頃，馮應京刊利氏書，其中有世界輿地二小圖（萬國二圈圖）卽爲圓形之東西兩半球圖。及萬曆三十八年，程百二翻刻之，入方輿勝略（禹貢利瑪竇地圖專號卷首有翻印本）。其後清初順治七年刊行之潘光祖輿圖彙考中，附有纏度圖一及纏度圖二，則又重翻方輿勝略之二圈圖者。方輿勝略所刊固已簡略，而輿圖彙考本則更粗率矣。萬曆三十年頃，利氏又增訂南京吳中明本而李之藻爲之刊印，一時風行海內，因有刻工等翻刻之者。

利氏全集卷一（三九四至三九五頁）：「李存我浙江杭州人，吾輩至北京時，彼正官於工部，多才藝之博士也。」

「彼於少年時曾爲中國十五行省圖誌，甚精確。然以爲天下已都在其書內矣。及見吾人之世界地圖，始知中國與世界之比。彼本聰明人，故容易理會西洋學者所言地爲圓形，及其大小，地

有兩極，天有九重，日與諸星較地之大幾何，諸如此類，他人不易悉者也。於是與吾人深交，勤事此學，凡無礙於公務者，彼皆爲之。

「彼最先着手之事，則重刻世界地圖是也。此次所刻較舊者爲大甚，分六條，高過人身，可展可合，中國式甚巧。此圖既較大，故利神甫能於其內容更有所增益，不僅新增之圖頗多，且亦多具新注，稍述各國各地之奇物。又爲全圖作一較詳之序，並解釋數理，日及諸星。此圖刻印甚精美，故傳佈遍全國，爲人所珍。李存我自撰序文而外，又得其他學者多序，頗爲此作增色。版片既刻就，彼刷印多本，遍贈其友，他人亦有送紙來印者，合之不下數千本也。剗此圖之刻工，又私梓一板，大小盡同，故一時有版本二。然尙不足以應求者之多。故天主教徒某，以吾人之助，別爲一更大之圖，分列八幅。刻既就，遂以販售於印刷者，於是在北京共有三本焉。」

此卽所謂坤輿萬國全圖，今羅馬瓦第剛圖書館及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均藏有此圖（禹貢學會有影印本）是爲利氏所繪諸圖之最完善者。惟馮應京刊本爲二圈圖，而李刊本則一橢圓形圖耳。至於另刻彼八幅大圖之「天主教徒某」則據洪先生之考證，知爲明史李如松傳與朝鮮傳中

之李應試（教名保祿）也。此外則貴州巡撫郭子章，亦曾將吳中明本刊行，惟李之藻刻版，後爲李氏攜回原籍。而刻工私刻之本，又因北京大雨，塌屋而毀。其時明神宗（萬曆）適見此圖印本，遣太監求之，以李保祿之八幅大圖應之。太監以皇帝所求者乃六幅本而非八幅本，不欲以之進呈，卒以舊六幅版補繪之，而太監云將於宮中刊行之。但洪先生則疑其並未刊成，僅摹繪若干份以資供奉；而近今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之坤輿萬國全圖，殆卽此種摹繪本之一，蓋因其與李之藻本大體相同也。

利氏歷年繪製之世界地圖，洪先生文中列有一表，茲錄之如下，以清眉目：

山海輿地圖	萬曆十二年（1584）	王泮刻版	肇慶	
（世界圖誌？）	萬曆二十三年（1595）		南昌	繪贈建安王多輝
山海輿地圖	萬曆二十三年（1595）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本
（世界圖誌？）	萬曆二十四年（1596）		南昌	爲王佐編製
（世界地圖？）	萬曆二十四年（1596）		南昌	繪得一或二本

山海輿地全圖	萬曆二十八年 (1600)	吳中明刻板	南京	增訂王泮本
輿地全圖	萬曆二十九年 (1601)?	馮應京刻板	北京?	二小圖圖等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三十年 (1602)	李之藻刻板	北京	增訂吳中明本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三十年 (1602)	刻工某刻板	北京	複刻李之藻本
山海輿地全圖	萬曆三十二年 (1604)	郭子章刻板	貴州	縮刻吳中明本
世界地圖?	萬曆三十四年 (1606)?	李應試刻板	北京	增訂李之藻本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三十六年 (1608)		北京	諸太監摹繪李之藻本若干份

至若此圖之製繪，究以西方何種地圖為據，此為一重要之問題。但此事現今似尚未得詳確之考定，惟知其大體為參合比利時與意大利地圖家法而成耳。其中關於中國方面，則利氏曾測算北京、南昌等地之經緯度，並參考中國地理圖誌之遠近道里而製繪之。至其橢圓形之地圖以南北美洲繪於亞洲之東，則固因迎合中國人之心理而特為改繪者也。

其後繼利氏而作此種世界地圖者，有龐迪我之海外輿圖全說二卷，（見澹生堂書目。又見職）

方外紀李序及艾序。據云其圖未刻，京師有傳寫者。艾儒略職方外紀中之萬國全圖（大學初函本，福建重刻本，守山閣叢書，墨海金壺及邊防輿地叢書等本）而湯若望亦曾爲之（見不得已等）又有南懷仁（坤輿全圖北京圖書館藏，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前天津工商學院翻印本，東洋歷史參考圖譜第十三輯縮印原刻東半球。順治間有坤輿圖說刻本，又指海本）與蔣友仁之坤輿全圖、地球圖說一卷（文選樓叢書本）但此皆不如利氏圖之風行一時也。

利瑪竇等之地圖不僅附有異物圖繪，不脫原始地圖之形式，且有矮人國等類乎神話之記載，彷彿吾國之山海經。然西洋新地學與世界地理知識之輸入中國，而確有相當影響者，要以利氏爲先導。計利氏之圖，對於中國之新地理知識之貢獻，約有六點（據陳觀勝氏文加以刪改）：

（一）測量經緯度 中國言地理者，雖未必皆信天圓地方之說，但一般觀念大抵以地爲平面，故繪地圖者，亦只知有畫方之法，初不知平面之圖不足以真確表示弧形之地面也。及利氏圖出，衆始知有經緯度之繪圖法，並須作實際之測量矣。利氏以其所謂量天尺（astrolabe）測各地緯度，又利用日月蝕以測經度，其所得結果，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西安等處，與現今所測者相差無幾。

(二)地名之譯定 外國地名之漢譯見於漢唐以來之異域圖志者甚多，而宋時周去非之嶺外代笈且有涉及北非、南歐，但多糊塗影響，頗不確定。及利氏圖出，其所譯地名不但遠及新大陸，且有首創譯名如亞歐、非美各洲名，以及大西洋、地中海、羅馬、古巴、加拿大等，至今猶襲用之。至於「地球」、「南北極」、「北極圈」、「赤道」等地理名詞，則亦爲利氏所創譯而至今仍沿用者也。

(三)新地知識之傳入 利氏當探險新地之時代，將十五紀以迄當時所得之地理知識，大抵均列入其圖。以前中國對於西洋地理知識，至多僅及北非、西歐者，今因利氏之圖，乃一躍而及於南非與南北美洲，而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及對於外國地理之知識，乃大開眼界矣。

(四)五大洲之觀念 利氏之五大洲，即歐羅巴、利未亞（即非洲）、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及墨瓦蠟泥加。其中僅墨瓦蠟泥加泛指南極地方，而尙未知澳大利亞洲。（清初南懷仁之坤輿全圖已繪及之。）但後世五大洲之觀念，即開始於此焉。

(五)地球說 周髀算經「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本是指地圓而言。近代地圓說之輸入，宜在元初阿拉伯地球儀輸入之時。惟其時學士大夫，能瞭解而承認之者不多。故實際上地圓說輸

入而改變天圓地方之舊說者，當自利氏之圖始。其所製二圈圖，可謂中國最早之東西兩半球圖也。

(五)五帶之分割 利氏以南北極圈與南北二回歸線 (利氏稱「晝長晝短二圈」) 分地面爲五帶 (二溫、二寒、一熱) 其影響且及於近代。近世地理課本中以寒溫熱五帶講地面氣候者，猶可見及也。

綜上所述，利氏於地圖學誠有一定貢獻，然此圖在當時雖受一般士大夫之歡迎，而利氏卒後，不久即鮮重視及之，清初地理述作，絕少引用之者。甚且目此類圖籍爲荒誕失實，不足憑信。直至道光以後，東西文化有利害上具體之接觸，而世界地理知識，始爲國人所接受焉。陳觀勝氏推論利圖所以在清初消沉之故約有五點：

- (一) 利氏死後，鮮有真知灼見之學者，繼續勘正製繪。
- (二) 當時歡迎利氏圖者，不過爲一般學士大夫，未能深入民間。
- (三) 當時絕少有科學基礎之人，能接受利氏之學識。一般人士，多以此爲一種玩好之品，並

未真能了解其意。

(四)利氏以地圖爲宣傳天主教之工具，但多數國人之反對洋教者，則不免并其地圖而厭惡之。

(五)後此翻刻者之不明究竟，往往愈翻愈誤，如三才圖會、圖書編等遺誤至多。

此五因中，竊謂以第三原因爲最要。蓋一種文化學術之傳佈，必有其適當之環境與歷史。利氏之圖，與中國古來傳統之地理知識與繪圖方法，爲截然不同之系統。故其圖之出，在中國社會中，可以動士大夫一時之觀感，而不足以深入中國之學術界。時人之爭得此圖者，殆如得一新山海經圖，或新職貢圖耳。若夫外國地理知識，則遠者有周秦漢唐以來二千餘年傳統之地理圖籍可參，近者則有海夷圖或鄭和海圖（茅元儀武備志附之）等關於外國之圖籍，是與航海商人之實生活上，有密切之關係者。中國社會，尙在閉關時代，利氏此圖，除供文人學士玩賞談論之資外，並未發生重大之影響。

利氏之圖，既與當時之社會環境無大關係，即在一般社會生活上，亦無具體之根據。惟當時另

有一種地圖，其科學基礎雖不如利氏之圖之真確，而實際上似反較利圖之流行爲久遠者，卽所謂「海圖」是也。此等海圖，據個人所見，除廣輿圖以降所附西南海夷等圖外，似以附刻於明茅元儀武備志中之鄭和海圖爲詳。明清之際，施永圖之武備三大祕書中所刻外國圖，蓋亦相類，而姚虞之嶺海輿圖則較簡略矣。此等地圖之內容與淵源，尙未詳考，但竊疑其來歷蓋出於海舶賈人之手，是則此圖至少與一部分人之實際生活有深切關係，且係由經驗得來者。較之利氏等圖之破空而來，在國人經驗中毫無根蒂者，自不可同日而語矣。至其繪圖之粗劣而欠精確，則本未可據以定方位，其實際上從事航海者，尙有海道針經之類可作指南也。後此陳炯倫著海國聞見錄，其所附海圖，蓋亦屬於此系統之下，疑與利氏圖不涉者。

第十二節 清初測繪地圖及其影響

關於清初測繪地圖之事蹟，國內之記載甚略。翁文灝先生著清初測繪地圖考（北京地學雜誌十九年三期），依據西文舊籍，如蘇西孩（Soucié）之印度中國數學天文地理歷史及物

理觀察，（雍正七年巴黎出版）及杜赫德（Du Halde）之中國地理歷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雍正十三年巴黎出版，附有唐維爾（D'Anville）氏根據康熙間教士所測地圖而增改之中國地圖〕等，對於清初測繪地圖之經歷、方法及其內容，考論甚詳。繼而又爲重印乾隆內府與圖作序，與前文互有詳略。本節所述，即據此二文節錄（引號內者均係原文）。

「中國地圖之重要根據，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測量。以後雖經西洋遊歷家，多次續測，究皆沿循路線，或局於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個的計劃，與普遍的實測。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央及各省測量局，皆測有詳圖頗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國之大地測量。故迄今中國地圖十之七八，實尙源自清初。當十七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geotic survey），亦尙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實爲中國地理之大業，雖出異國專家之努力，亦足見中國計劃規模之遠大焉。」

（甲）康熙間測繪地圖之次序與範圍 「據一七三六年法國杜赫德（Du Halde）著中國地理志序中，記述康熙帝先命天主教耶穌會各神父，先作北京附近地圖。帝親自校勘，認爲遠勝舊

圖。乃命測製各省全圖。於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西曆一千七百零八年七月四日）開始工作，由白晉〔一作白進（Bouvet）〕西人名凡有原用華名可查者均仍用之，無可查考者，用譯音以待續考。〕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諸神父，先從長城測起。白晉二閱月後即病，餘二人繼續工作，至一千七百零九年一月十日返北京，繪成一圖，凡長城之各門（共有三百個）各堡，以及其附近之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繪入。

〔北直隸之測量，於一七〇七年十二月十日開始，至一七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完工。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雷孝思、杜德美、弗里德里（Fridelli）諸人，開始測量滿洲。當時各教士等稱之爲 Tartarie Orientale。先從遼東入手，東南至朝鮮邊境圖們江，東北至松花江之魚皮韃子區域。一七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命更進至黑龍江省，當時稱爲 Saghalien Oula。時爲防俄故，新築墨爾根（今嫩江縣）、齊齊哈爾（今龍江縣）二城。當時測定齊齊哈爾在北緯四七度二四分三〇秒，十二月十四日，圖成。

〔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帝命添人工作，分爲二隊：雷孝思（Regis）、卡多羅（Cardolo）

爲一隊往山東；杜德美 (Jartoux)、弗里德里 (Fridelli)、蓬若 (Boujoar)、奧古斯丁 (Augustin) 又爲一隊，出長城至哈密，測定喀爾喀蒙古之地，歸途徑由陝西、山西而返。至一七二二年回北京。山東圖已先成，因西部圖尙未成，乃更命卡多羅 (Cardole)、塔脫爾 (de Tarte) 同往山、陝（其時陝西兼包甘肅）二省。圖成，塔脫爾在帝前親爲說明，頗蒙獎許。

「雷孝思又偕馬俠 (de Maille) 及肯特雷 (Kenderer) 同往河南，又合測江南（江蘇及安徽）、浙江及福建。塔脫爾、卡多羅合測江西、廣東及廣西。弗里德里及蓬若則往測四川、雲南。蓬若因勞死於雲南。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弗里德里亦病，乃於一七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又派雷孝思赴滇。與弗里德里同測雲南、貴州及湖廣之圖。至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始功成返京。在杜德美領導之下，作成皇輿全圖，於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進呈。於是關內十五省，及關外滿蒙各地，皆經測量成圖，爲中國從來未有之大功。迄今尙爲中國地圖之最重要根據。其實地工作，自康熙四十七年始，至康熙五十五年竣事，至五十七年而全圖繪成。

「考之法國教士張誠 (Pere Gerillon) 所記康熙帝之留心算理及測量，殆始自康熙二十

八年尼布楚締約之後。此次中俄和約之成，頗藉張誠、徐日昇二教士通譯疏解之力。張誠後乘機以亞洲地圖進帝，說明關於滿洲地理知識之缺乏，帝遂命諸教士不時以滿語進講算理，親自學習，孜孜不倦。併令推荐專家，購買儀器。（當時由廣州購入儀器，皆以秘密行之。）以後數次征撫蒙古，游歷滿洲，及巡幸江南，皆命張誠隨行，隨地測定緯度。從此可見康熙帝測量全國地圖之計劃，實定於康熙二十餘年。不過當時尙未宣令明言，至四十七年乃始明令測圖，實行工作，至五十七年全圖乃成……從此亦可見在康熙二十餘年至四十年間，諸教士之工作，多在測定各處緯度（即當時所謂北極出地高）爲製圖之準備，而在四十七年後，乃始實行三角測量，正式測圖。康熙地圖，實兼用此二種根據而成。」

（乙）測量之方法 「自康熙四十七年開始正式測圖工作以後，主要工作，厥在測定全國三角網（triangulation），然後各地之詳圖方得而附麗焉。茲據雷孝思神父（Pere Ragis）自述（見杜赫德書第一冊之序文）及「其他零星記載，可得概論如下：（一）康熙四、五十年間測繪地圖，雖頗重經緯度，但因當時天文測量方法及儀器之限制，殊不能過於多測，且亦不能十分精確，尤

以經度測量爲不易。故只得根據少數比較可靠之天文測量爲基礎，而多用實地丈量以補之。(二)實地丈量之方法，頗爲審慎周密。蓋中國以前之言距離者，大抵不用同一尺度，或不講方向角度，或不問地勢坡度，故距離一遠，丈量即不可靠。茲則盡矯其弊，尺度既一，復用測鏡測定坡度，對準方向，並先量極準確之基線，用三角法遞推互較，由近至遠；而更由已知之他處，以返求而覆測之。由是言之，康熙時代之測量，乃是中國第一次之三角測量 (triangulation) 工作也。因此，天文測量雖因方法日精，多需改定，而當時地圖所示之各地點相互之位置，則實比較準確，不愧爲中國地理之基礎工作。」

(丙) 經緯度之根據與觀察 「康熙年測量地圖所用之經度，因大抵非由天文觀察，實行測定，即緯度亦多約略測定；作圖時仍參考三角測量，再行推定經緯度數，作爲標準，然後繪入。杜赫德中國全志第四冊末載有一七一〇至一七一六年作圖所用之經緯度，首加說明曰：「天主教士用以繪成中國全圖之測定（指天文的測量），緯度之一部分，及由幾何測量（大約即指三角法的）所得之經度，」可見緯度係測定，而經度則係約推。」

「此項有經緯度數之地點、處數，列表如下：

直隸	四七處	江南	三七處	山西	二八處
山東	二八	河南	二九	陝西	二八
浙江	三〇	江西	三〇	湖廣	五四
四川	二八	福建	三〇	臺灣	七
廣東	三七	海南	七	廣西	二八
貴州	二五	雲南	二九	遼東	八
吉黑	三六	蒙古	九四	共計	六三〇

以當時交通之不便，儀器之不精，而六、七年間成此鉅工，抑亦偉矣。

「當時經度皆以北京爲中線，而分爲東經西經；緯度皆以北極出地高爲言。」

「據蘇西孩氏書中所載清初天主教士用天文觀察以定經緯度者，計有（一）太陽觀察，（二）月食觀察、木星、衛星觀察諸法。」惟其「測量實不甚精密。同一地方緯度，可以差至數分，而經度有

時或竟差至一度。其一七〇八至一七一六年作圖之根據，實尤重在三角測量，而並未過重天文觀察……當時已有可靠之天文觀察，尙爲數極少。卽如北京之經度確數，尙係康熙地圖測成後哥爾及戴進賢兩氏繼續實測而得之。

「因此吾輩似可信康熙地圖於各地點之相對關係之精密，過於絕對位置……然作圖諸教士，所以寧舍天文測量而偏重三角測量者，良以彼等實信當時已有少數天文測量，尙並不精確耳。故雷孝思氏記末又言當時實甚願在極東極西邊界，及中國適宜地點再定數處之經緯度精密度數。乃圖成而帝意已足，故不及遂行云云，可見原作者亦固已想到此點。揣其原因，殆以當時天文測量，如觀察月食及木星、衛星等，需時較久，而成功較難。各教士奉命測全國輿圖，幅員奇廣，而期成甚急，不能不酌取較易之法而收速成之功耳。」

(丁)西藏地圖之測量 「康熙時測量地圖之天主教士，皆未親至西藏，但康熙帝於派兵入藏時，已派人注意繪圖。在藏二年回京，於一七一一年將圖交雷孝思神父審閱。圖中並未定有經緯位置，雷氏以爲與內地各圖不易連接，認爲無用。帝乃再派曾在欽天監學習數學測量之喇嘛二人，

自西寧至拉薩，復自拉薩至恆河之源。帝以留心佛經，故特注意恆河，並命取其河水至京。嗣以策妄犯藏，二喇嘛剛至恆河發源處，卽不再前進，匆促言歸。圖中所載，頗多採諸傳聞。一七一七年，帝以新圖交測圖之西洋教士重爲審定，諸教士認爲較前進步。且以出自欽天監出身之喇嘛所測，不敢過於批評，遂據之成圖。圖中將拉薩繪於北緯三十度之上，蓋以天文實測，尙不及實地丈量也。此種標準，當然不合，故唐維爾 (D'Anville) 氏所作西藏圖已改正之。又當時於岡底斯山之緯度，亦未及測正，故作圖者因之頗爲困難。諸教士改正之法，乃用康熙時已測定之西寧、打箭爐、麗江三處爲起點，復以自三處至拉薩之里程距離爲根據而定拉薩之緯度。

「觀於唐維爾之西藏地圖，已有許多出於唐氏用西亞及印度方面之地理知識，自行考訂，故能駕於康熙天主教士原圖之上。康熙天主教士之原圖，亦並未親測，實根據喇嘛所測而酌爲修正。康熙所用測圖喇嘛，雖曾略受訓練，但因阻於戰亂，亦僅親勘西寧、拉薩、恆河一段，其餘亦得之藏寺舊聞，加以編製。可見康熙時代西藏地圖，殊不及內地及滿蒙之詳密，而於藏地西部，尤未詳勘，故多錯誤。

乾隆帝於康熙時代地圖工作，頗知繼續進行，但其工作方向已漸次變化，重於考據，而忽於測量，過於鋪張，而實遜精密。其後私家著述，有西藏圖識（按此係衛藏通志之誤）、西招圖略、衛藏圖識、西藏圖考等皆有圖，然皆不著經緯，不甚明比例，但略記山川地名而已，茲不詳考。」

（戊）新疆地圖之測量 「康熙時代，額魯特、雄據西陲，敵視清人，相持未下。故康熙時代測量地圖，至哈密爲止，未再西向。卽唐維爾圖，亦至此爲止。當時所知者，僅由圖理琛、西征錄（按係異域錄之誤）等旅行紀程，得其一二而已。乾隆朝始先後擊敗準噶爾及回疆，同時命專員隨同軍隊繼續地理工作。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上諭劉統勳會同何國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諮詢覲記，得自身所經歷，彙爲一集。又同年四月初九日，諭命何國宗往伊犁一帶測量晷度（卽經緯度），並令繪成地圖，由巴里坤一帶及額林哈必爾漢等已足伊等今歲辦理。至冬間冰雪凝寒，或回至巴里坤或哈密居住。俟明春草長，再行前進，可卽從巴里坤自行備裹乾糧，從容前往。劉統勳亦卽會同何國宗一路行走，遵照前旨，將山川地名，考驗纂進云云。可見當時以何國宗任測量繪圖，而以劉統勳任考察採訪。何國宗大約當爲不甚諳文學，而曾直接或間接由西洋教士學習測

算之人，而劉統勳則爲隨營之一文人，雖曾貽誤軍機，而以文事頗邀帝眷，故仍委以地理調查者也。劉、何二人所辦西域圖志，實成於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奉旨交軍機處方略館，是爲後來一切新疆地圖之所本。但實地測量調查，雖成於何、劉二人，而乾隆帝仍別派一大批總裁、提調、纂修等官，增加若干天章宸翰，成爲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閱二十年之久，至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始稱告成，稱爲傳三十六國之規模，宏三十餘年之聲教。」

又據「乾隆帝題大清一統輿圖詩自注……可見當時以何國宗等測量天山以北，明安圖等測量天山以南，且遠至塔什干、薩馬爾干及喀什米爾一帶，現在已不復屬中國境土。然考今日所傳西域圖志，並不見繪有經緯度數，惟其山形繪法，北南方向等，尙留有西洋圖法之成規而已。」

「西教士中擔任測繪者，有亞洛沙（E. L'Arrocha）、愛司丙哈（J. Espinha）等，但於中亞地理貢獻較多者爲哥皮爾（Antoine Gaudil）。其工作尤重在搜集俄、蒙記載，考定中亞細亞及北亞城邑形勢。經此融合中西，貫通新舊之工作，不但中國，即全亞洲之地理，皆於焉集其大成。乾隆二十六年（西一七六一年）曾有西教士倍奴亞（Benoit）彙編亞洲全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重印之乾隆內府輿圖，「殆卽其圖，或根據其圖而成者也。」

康、乾兩朝，努力測製地圖，其所繪者當不止一份。法國唐維爾 (T. B. D'Anville) 所製之中國分省圖及滿蒙藏圖 (附杜赫德書中)，卽據康熙時測繪之圖而訂正出版者。瀋陽故宮博物館曾發現康熙時所製圖，由該館石印出版，題爲清內府一統輿地祕圖，「其圖於內地各省地名，悉用漢文，滿蒙地名，則用滿文。此種寫法，與杜赫德書中第四冊第二頁所述者，正相符合。可見其爲康熙時所作。」其後「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民國十四年五月點收故宮造辦處存物，發現地圖銅版一百零四方，經朱邊先先生整理審定，認爲卽清乾隆朝皇輿全圖，重行排印。」「茲所重印之一百零四幅，既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及二十五年庚辰二詩，則圖之製成，當在二十五年（西一七六〇年）或以後。考倍奴亞洲全圖成於乾隆二十六年（西一七六一），則是圖當亦製於此時。而丙子、庚辰二詩，特追錄其上，藉以紀念乾隆之測定西域緯度，因以完成康熙未竟之功者也。……以此圖與瀋陽所重印者相較，除關內各省一二地名之變更外，大部分完全從同，可見倚康熙圖爲根

據，絕少增益。惟其所補充之範圍，則殊不止西域一隅。瀋陽重印之康熙圖，西僅至西經四十餘度，北僅至北緯五十五度；而茲所重印之乾隆圖，則西至西經九十餘度，北至北緯八十度，故圖幅多至一倍以上。其幅員所暨，北盡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及紅海，顯然不僅爲中國全國，而且爲當時最完善之亞洲大陸全圖。惟「其最精詳之部分，蓋猶爲康熙朝所實測之滿洲、東蒙與關內各省，及乾隆朝所實測之西域各地。此外所增雖廣，而內容實不甚精詳。例如西南方面，實圖至鐵壁關而止，與康熙圖同，但餘幅所加，遠及回教聖地之麥格，其間地方，率甚模糊，或僅留空白而已。」

此圖除測量之概況，及其根據已略見前述外，尙有二事可注意者：「（一）尺度之規定。中國里數長短不一，測量距離，大感困難。康熙帝毅然規定以二百里合地球經線一度，每里一千八百尺，故每尺合經線千分之一秒。中國政府以地球形體定度制，蓋猶在十八世紀末法國以赤道長度規定米突制之先。（二）實測經線一度之長距。康熙四十一年（西一七〇二年）測定經過北京之中經線上，霸州至交河間之長距，四十九年（西一七一〇年）又在滿洲實測北緯四十一至四十

七度間，每度之長距；因而發現每度經線，因緯度高下而有差。當時固未盡明其意義，然此殆發現地球扁圓實證之始。故此工作，不但奠中國地圖之基礎，抑且富有學術意義。」

「由此圖會引起，且可以引起種種地理問題。例如羅布諾爾之位置，此圖繪於北緯四十度四十分，以後中國地圖皆依據之。一八七六年，俄人普舌華爾乃見之於四十度以南，因以爲中國地圖之大誤。近年瑞典地理學者斯文赫定等復往調查，始知民國十年湖水復經北遷，遂以證明此湖地位，原經屢易，乾隆圖並未錯誤。又如此圖沿海一帶地形，頗多與今不同。山東大清河口海岸甚直，可見今之伸入海中之黃河三角洲，大部分爲河決儀封北遷後所成。江蘇崇明島以北，當時長江北口猶甚寬闊，呂四場近在江口；以較今圖，足證海門以東淤積之速。諸如此類，地理學家按圖以索，必大有裨益於斯學之研究者。乾隆四十一年，阮學濬序齊召南所著水道提綱曰：『先生迺按內府圖籍，猶翹爲之。其圖縱橫數丈，列之中廷地上，扶服諦審，默識會通。此他人所目迷五色者，而先生一覽無遺。』齊氏所見，據其自序，實猶康熙舊圖，而未見乾隆增訂。向令得見此圖，則於西域水道，必更精詳。」

「瀋陽及北京故宮所發現之內府輿圖，皆梯形投影法 (trapezoidal projection)，此法在現

代殊不經見。其法以中經線（經北京之子午線）爲依據，經緯度皆繪成直線。其「離中經線較近者，比例方向距離，均尙準確，但距中經線過遠者，距離比例，相差漸多；而經緯度相交過斜，形勢方向，尤感錯覺。全圖比例尺約爲一百四十餘萬分之一，不易算至更爲精密……然科學圖法，當時未有說明，中國後來作圖者，往往不能了解。乾隆晚年及嘉慶初年，猶令各省繪進詳圖，大抵以中國開方舊法，與髣圖投影混爲一談。宮中審查，歷歷指駁。故宮文獻館中，猶有此類批注之本。卽其後依據內府輿圖所作之圖，如道光年間六承如之皇朝輿地圖略，同治初年胡林翼、嚴樹森之大清一統輿圖，亦仍復返於計里開方之古法，或兩者重疊用之，實多因襲而無進步。至中俄界務交涉起，國人再行輸入西洋地圖，始復見新式圖法……」

竊謂中國古來地圖，自裴秀以迄明末，卽有計里開方之法與傳統之通俗繪法相重疊。及清初測繪地圖，經緯圖法輸入，而地圖繪法乃成三重之局。且由上述諸節，知裴秀以後中國古來地圖之傳統繪法，並未消沉，直至清代猶然。至今北京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藏舊輿圖（均有目錄印行），多有康熙、乾隆以後者，而其圖繪不僅無經緯度之法，且并畫方之法而無之。至於清初測

繪地圖之所以不能普及者，一方固由於國人對於科學測繪不甚瞭然，一方亦因內府輿圖之祕藏，僅有少數官吏得見之故。及同治間胡林翼之大清一統輿圖出，而後始行普及，且其時西方學術，亦多輸入，漸爲國人所了解而接受也。

第三章 地志史

第一節 漢隋間地志之發達

一、引言

禮記王制云：「廣川大谷異制，人居其間異俗。」隋書經籍志地理類總敘曾引此語。又曰：「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變遷。是故驅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是其說略與今世所謂區域地理之觀念略相脗合。惟實際上中國古來之地志，按其內容，大抵爲歷史記載與不定期之年鑑性質居多。而溯其遠源，則尤以史事爲主體。中國古籍之可謂地志者，山海經、禹貢而外，周官亦言邦國志與四方之志。而方志之稱，亦於是乎始見。

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殺之二陵。」

又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尊世繫，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志，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孫詒讓正義：「掌邦國之志者，謂掌王及畿內侯國之史記，列於外史，掌四方之志，爲畿外侯國之志也。」

又「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注：「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此所謂志，蓋即附離於各地方之故事史記，而所謂方志者，亦無非地方史記而已。劉知幾以華陽國志爲地理書（見史通雜述篇），而近代學者，每以越絕書與華陽國志爲現存方志之最古者，其於古義自非無據。惟按其內容，則未免史傳溢於地理，即與後世之地志相較，於體例上亦多出入也。故章實齋氏，即不以華陽國志之列入地志圖經爲然。

章氏遺書補遺史考釋例：「割據與霸國之書，初分二門，今合爲一，亦謂如越絕書吳越春秋，下至南唐諸家是也。惟華陽國志、隋志入於霸史，後人多仍其目，或入地理。按此書上起魚鼈蠶叢，

中包漢中公孫述、劉蜀漢，下及李氏父子，非爲一國紀載，又非地志圖經，人於霸國固非，入於地理尤非。斯乃雜史支流，限於方隅者耳。如建康實錄、滇載記、炎徼紀聞，皆是選也。此例前人未開，緣種類無多，均附霸史或地記耳。今創斯條，將後有類此者，可准例焉。故名雜史方記，暗分子目，與地理志方隅之記，名同而實異也。」

顧後世方志，內容複雜，而人物之志，往往占頗多之篇幅。是則史志與地志雜糅，事實上本難劃分者也。

竊謂中國古地志，約可分爲二類：一爲普通有文無圖之記志，一爲圖說兼具之圖經。而有文無圖之志，其初多爲地方性質之史傳記載，史記與地志雜糅。魏晉以降，因門閥關係，別傳與各地耆舊傳之作甚夥，史傳之闡入地志者較少，但亦尙有注重史事之方志。及趙宋以後，而圖經地志，兼詳人物，始成風氣矣。

二、方志與風俗傳

周官所謂「方志」，大抵多記史事。惟漢代亦有所謂「方志」者，則似與周官之方志相類。

後漢書西域傳論：「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

而宋贛之風俗記，爲漢書地理志所據者，雖亦可謂「方志」之類，其內容則已注重地理。

漢書地理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改變，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究宣，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敍：「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其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敍，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

史通雜述篇：「地理書者，若宋贛所采，泐於九州，闕闕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

及後漢應劭撰地理風俗記，卽與朱記同科。

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注，太平御覽，及太平寰宇記俱引之。

凡此皆風俗地理之總記，而非分記各地方者。及光武時有南陽風俗傳等，注意於人物傳譚。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敍：「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至於蜀郡，有趙寧之鄉俗記：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太守陳留高朕亦撰文教。太尉趙公初爲九卿，適子寧還蜀，朕命爲文學，撰鄉俗記。」

陳留有罔稱之風俗傳：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敍：「陳留風俗傳三卷，罔稱撰。」又雜傳類：「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罔稱撰。」按水經注、前後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俱引之。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康按罔稱不知漢何代。水經注卷八引陳留風俗傳曰：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則稱章帝後人也。」

姚振宗隋志考證：「按此風俗傳與耆舊傳本爲一書。前世著錄家乃分出耆舊傳二卷，入雜

傳類；而此連風俗傳併入地理，務各充其類也。唐經籍志併入此類，新志則兩頭互見。則亦含有傳記成分，與前所謂「方志」者相類矣。惟楊終之哀牢夷傳，雖名為傳而實際上疑為風俗記性質。

侯康補後漢志：「論衡佚文篇：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康按范史西南夷傳引此書。」

而邊裔地記，如各外國傳（見下）以及正史中之外域傳等，蓋亦史傳與風俗地記之混合品。降及隋代，復有北荒風俗記與諸蕃風俗記等，其性質當亦類此。

隋書經籍志：「北荒風俗記二卷。」章宗源考證：「太平寰宇記河北道有隋北蕃風俗記。」又「諸蕃風俗記二卷。」章宗源考證：「通典邊防門註，金姓相承，三十餘葉，稱隋東蕃風俗記。洪遵泉志……並引諸蕃風俗記。」姚振宗考證注：「案兩唐志有裴矩高麗風俗一卷，似卽此書之佚存者。矩在煬帝時領護西域諸蕃互市事，有西域圖，見後。」

又「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章宗源考證：「通典邊防門注引有突厥本末記。」

而隋代當修區宇圖志之際，同時有諸郡土俗物產記之編輯（參下總地志項）是殆集各地風俗傳記以及異物志等雜地記之大成者。惟魏晉以降，所謂地記，如朱育之會稽土地記、荀綽之九州記等（見下）仍多以史傳爲主體。蓋古籍名稱，每無定則，未可望文生訓，要當考其內容，惟魏晉以降，雜傳之作繁多，地志之容納史傳者，或較減少耳。近今余季豫（嘉錫）先生，辨萬斯同、閻若璩等以地志不應多列人物傳記之說之不當，列述漢魏以降地志之有人物傳記，論證頗爲瞻博（見所著四庫提要辨證太平寰宇記）。但私意則謂古昔「方志」（如周官後漢書所言）以及地方風俗傳記，原以史傳爲主，而魏晉以降，地記之注重史傳人物者，固亦數見不鮮也。

三、異物志與風土記

東漢以降，有所謂異物志者，其意義與山海經之記異物相類似而較爲嚴實。且其所述，大抵以南方事物爲多，所以爲北方人士廣見聞者。惟此類述作，流傳後世者絕鮮，僅於古籍中目錄舊注，以及類書之屬，可以略見梗概，茲輯述如此，亦以見當時述作之一種風尚焉。原此種撰述，最早見於錄者，爲東漢時楊孚之南裔異物志（或作交州異物志），亦即粵人著作之最先見於史志者。

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又：「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姚振宗考證：「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帝時南海屬交趾部，刺史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爲異品以諷切之，著爲南裔異物志。後爲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世服孚高識，不徒博雅。……南海曾劄輯本序曰：『考楊孚爲漢章帝時議郎，而臨海置於吳太平二年，又續漢五行志注引楊孚董卓傳。據此，則議郎歷漢末，至吳時尙存，蓋百餘歲人矣。而史志猶稱爲漢議郎，其不仕吳可知。粵人著作見於史志，以議郎爲始。爰刺取羣書，以宋爲斷，稱楊孚撰者，得若干條，編爲一帙。其著撰名，惟稱異物志者，雖灼知爲議郎書，亦別爲一帙，附於後。』案章帝至董卓伏誅之後，已百餘年，此甚可疑。區志會序所云，恐皆非事實。別無可存，姑存錄之。」姚振宗後漢書藝文志：「楊孚臨海水土記。按續漢郡國志，唯有勃海、東海、北海、南海郡，無臨海郡。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春二月，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臨海立郡始此，時爲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區氏稱臨海太守，豈南海之譌歟？抑漢時嘗立臨海郡，後復省併，史失其事歟？是書名目，恐亦未確，今姑過而錄之。」

三國時有譙周之巴蜀異物志。

文選蜀都賦注等引譙周異物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譙周異物志……按文選鵬鳥賦注，史記周勃世家集解、屈賈列傳索隱、漢書周勃賈誼傳注，並引巴蜀異物志，不著撰人，疑卽譙氏此書。」按顧櫟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及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與黃逢元之補晉書藝文志俱列此書。
萬震之南州異物志。

隋書經籍志：「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萬震南州異物志，藝文類聚、御覽屢引之，其中有用四字韻語者。如云：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繁飾，文若羅珠。……竊意此書體例，每物各爲一讚語，而別以散文詳說其形狀，如戴凱之竹譜之例。諸書或引散文則無韻，或引讚語則有韻，御覽引扶南海隅一條，有小注，蓋卽取其散文，附注各韻之下也。」

而朱應之扶南異物志則述外域。

隋書經籍志：「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章宗源考證：「唐志同作朱應，通典、邊防門注，

……史記大宛傳正義……並稱宋膺異物志，省扶南二字。朱作宋，應作膺，未知孰是。」按梁書南海諸國傳，朱應與康泰同使扶南諸國，設二志果爲一書，則宋膺當係朱應之訛。惟張澍則疑宋膺異物志爲涼州異物志（見下引張氏涼州異物志輯本序）。

此外則有沈瑩之臨海水土異物志：

隋書經籍志：「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舊唐書經籍志：「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新唐書志同。）

史通志書篇：「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厥類衆夥，諒非一族。」

章宗源隋志考證：「唐志作臨海水土異物志，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沈瑩臨海水土志。文選江賦注……稱臨海風土記。文選江賦注……稱臨海異物志。又江選江賦注……稱臨海水土記。廣韻注……稱臨海風土記。文選江賦注……稱臨海異物志。又江賦注……稱臨海水土物志。江文通雜體詩注……藝文類聚木部……並稱臨海記。」

姚振宗隋志考證：「案吳志孫亮太平二年二月，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也。吳太平二年立領縣五。此蓋郡志之最先者。史通敘是書於周處之前，二人

同時仕於吳，故皆有風土記之作。晉戴凱之竹譜引是書。本志既次於朱應之後，唐志亦與萬震朱應相類從，是吳之沈瑩爲多。通志藝文略乃云隋沈瑩撰，殊爲眩惑，殆墮下脫志字耳。」又原注：「又諸書所引，有吳郡臨海記，是吳郡亦有臨海地名，不知與此是一是二。」按吳郡臨海記，太平御覽地部等引之，臨海疑非地名，或係記臨海部分之吳郡地志也。

薛瑩之荆揚已南異物志：

章宗源隋志考證：「荆揚已南異物志，卷亡，薛翊撰，不著錄。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果部……並引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姚振宗考證：「案汪師韓文選注引羣書目作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巴似已之誤。」按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吳士鑑及黃逢元之補晉書藝文志均列此書。而其兄薛翊亦有異物志之作。所記大抵仍屬南方州郡異物。

章宗源隋志考證：「異物志，卷亡，薛翊撰，不著錄。一切經音義：鑄錯鉅錯，引薛翊異物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吳志薛綜傳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注引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翊爲五官中郎將，奉使至蜀求馬。」（原注：「吳主孫皓傳，建衡元年十一月，遣監軍虞汜，

威南將軍薛翊，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就合浦擊交趾。三年，范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翊卒，當在建衡三年，瑩之兄也。」

及晉時則有續咸之志：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異物志，續咸撰。見咸傳。元按通志、氏族略、續氏志云，晉有續武威撰異物志，石趙有太子少保續咸，是誤析一人爲二。」

而東晉之發蒙記，雖不以異物志名，實亦同類之作。

隋書經籍志：「發蒙記一卷，東晉撰，載物產之異。」章宗源考證：「隋志經部，小學類，有東晉發蒙記一卷，此疑重出。然記特言紀物產之異（原注：「小學類注無此語。」）或名同而書殊也。」史記匈奴傳索隱……般本紀正義……初學記獸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東晉發蒙記。此類與諸異物志相彷彿，故入地理類。」

其有時期未詳者，有陳祜暢曹叔雅之作。

章宗源隋志考證：「異物志一卷，陳祜暢撰，不著錄。見唐志。太平御覽果部、甘蔗、益智、梔子、餘

廿三廉、百卉部葭蒲，並引陳祜暢異物志。」又「異物志卷亡，曹叔雅撰，不著錄。藝文類聚水部：廬陵城中有一井水……，引曹叔雅異物志。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亦引金井事。又山都木客二事，並稱叔雅廬陵異物志。」

而涼州異物志之作者，亦尙待考焉。

隋書經籍志：涼州異物志一卷。章宗源考證：「唐志二，太平御覽天部，涼州異物志曰……寰宇記隴右道引龍勒山貳師將軍祠，又葱嶺水東流爲河源二事。」（原注：水經河水注引葱水事，作涼土異物志。」）

張澍涼州異物志輯本序：「……蘇頌本草引徐衷南州異物志。史記正義引宋膺異物志，是異物有志，在昔繁矣。而涼州異物志，著於隋唐志。隋一卷，唐二卷。博物志水經注均引作涼土異物志，惜不傳作者姓字。觀其寫致敷詞，頗諧聲律；采藻精華，方諸萬氏，又未嘗不嘆其散佚也。宋膺異物志隱匿鮮章；史注所引，多說西方。且月氏羊尾，文與涼州異物志同，太平廣記引涼州異物志，羊子生土中，文亦與宋膺異物志同，疑涼州異物志，卽宋膺所纂。漢晉之時，敦煌宋氏，俊才如林，文采

多麗。竄其然乎？以無左證，未能質言耳。」按張氏以宋膺志爲涼州志，其例證不甚可靠。因古籍記南海諸國，而兼述大秦等地者，並不少見。前章宗源說似較可靠。

至於徐衷之南方異物志，疑卽徐氏之南方草木狀（或作草物狀，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或草木狀爲異物志之一部分也。至於稽含之南方草木狀始著錄於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而猶流存於今日；四庫提要（地理類三）雖不疑爲僞，但稽氏實未至廣州，宋本題銜亦誤，故稽氏是否曾述此書，仍難置信。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子辰注）「南方草木狀一卷，襄陽太守稽含撰。」家大人曰：本書含傳，永興初，除中庶子，道阻未應召，授振威將軍，襄陽太守。是則舊題襄城，實襄陽之誤。」（原注：「含拜廣州刺史，未發，被害。七錄雖有廣州太守之目，實則含未蒞南方也。」）

竊疑此爲纂輯徐衷之作而僞託稽著者，但亦未可遽斷耳。此外尚有不知撰人與時期之嶺表異物志及張華之異物評（俱見宋史藝文志。張著始見於宋志，疑有訛誤，或張華爲另一人。）而房千里

之南方異物志（一卷），孟瑄之嶺南異物志（一卷），以及劉恂之嶺表錄異，段公路之北戶錄（俱見新唐書藝文志），則均爲唐代之述作。至劉、段二氏之作，則猶遺存今日，雖不以異物志名，內安實相類也。

綜上所陳，述東晉與續成之作，及涼州異物志而外，大抵皆記長江流域以南之異物者，所記多草木禽獸，以及礦物之屬，之異於中原者，而間附以故事神話，是殆當時北方士民南移之一種反映也。此外又有所謂風土記者，其體制與異物志大致相似，而兼述山川風俗古跡，故其內容較寬，並已具地志之規模。如前述沈瑩之臨海水土異物志，其名稱與內容，實皆不僅志異物，而兼風土。外此則東漢時盧植有冀州風土記，疑尙多記風俗事跡，而鮮及物產。

章宗源隋志考證：「冀州風土記卷亡，盧植撰，不著錄。寰宇記河北道，盧植冀州風土記曰：黃帝以來，未可備聞，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姚振宗考證注：「按泉藪，唐人所改也。」

及魏、晉間，周處之風土記，則頗多異物志之成分，而所記亦較繁複矣。

隋書經籍志：「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

晉書周處傳：「追贈平西將軍，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

史通補注篇：「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土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

嚴可均風土志輯本序：「處著默語風土記，吳書今默語吳書，隻字不傳，而風土記引見各書者尚多，采得二百餘事。省并重複，定著一卷。其正文協韻，如古賦，而故實皆載於注。注卽子隱自撰，徵用者多取注而略正文。故今所輯注，居十之九。其書撰於吳時，故稱大吳。惜其久亡，所得見者僅十之二三。然而亭邑、古跡、山川、節候、風俗、舟車、器服、物產、果實、草木、鳥獸、蟲魚，品類略備。原次無可考，卽以此區分焉。又曰，隋志三卷，舊唐書作十卷。以史能之咸淳毘陵志考之，知石晉後有續補本，或舊志誤據而新志沿之，故卷數增多耳。」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周處風土記三卷。姚鼐江寧府志卷第五十五云：此書昔人謂專記陽羨風土，然如辨吳越歷山之見水經注，河水下記洞庭地脈之見編珠卷一（原注：「按編珠偽

書，不足據。」皆概言吳越風土，非專志陽羨也。」

此種以韻文加注之體裁，爲當時編著地志之一種風尚。如前述萬震之南州異物志，及未知撰人之涼州異物志等，固未可一二數也。

四、山川圖記

(甲) 山水圖記

魏、晉以降，釋道盛行，寺觀多在山林之中，加以老莊思想，亦風行當時，文人學士多傾向於自然風景之欣賞，以是兩晉時描述山水之作尤夥。此後山川寺觀志之作，蓋濫觴於此時焉。計當時記山之作之見於舊籍者，晉、宋之際，有釋慧遠之廬山記：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廬山記略一卷，釋慧遠。謹按，見唐志原本書鈔百五十一兩類兩引是記，無略字。白帖卷五兩引此記，亦無略字。」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廬山記三卷，附廬山紀略一卷，釋慧遠廬山紀略一卷，舊載此本（按即指陳舜俞廬山記）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入，今亦錄之。」

而王彪之、劉遺民、張野、宗測、周景式，均有廬山記之作。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王彪之廬山記。書鈔一百五十八王彪之廬山記曰……」又「劉遺民廬山記。書鈔一百五十一引劉遺民廬山記云……」又「張野廬山記。藝文類聚卷七張野廬山記曰……御覽四十一亦引之。陳舜俞廬山記卷一引之。按陶潛傳有鄉親張野，卽其人。世說文學門注，引張野遠法師銘。永樂大典六千三百三十九引江州志曰：張野字萊民，詮族也。徙家柴桑，與陶潛通姻。學兼華竺……入惠遠蓮社。遠之葬，謝靈運作銘，野序焉。年六十九卒。有廬山記行於世。」

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廬山記，卷無考，宗測撰。據南齊書本傳，今佚。」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廬山記卷亡。周景式撰。不著錄。藝文類聚山部，周景式廬山記曰……。」

伏滔有遊廬山序：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伏滔遊廬山序。類聚卷七伏滔游廬山序曰……。陳舜俞廬山記亦

引之。」

此外則關於羅浮山者，有袁宏之羅浮山記，與竺法真之登羅山疏。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羅浮山記。袁宏謹按，元和郡縣志嶺南道引御覽引作羅山疏，蓋誤以竺法真書當之也。」又「登羅山疏。竺法真謹按，御覽地部、香部、獸部、豸部、竹部，均引白帖卷五山類，引作袁彥伯羅浮山疏，蓋誤竺書爲袁書。」

文廷式補晉志：「晉書藝術道開傳：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關於虎邱者，有王珣之虎邱記與顧凱之之虎邱山序。

文廷式補晉志：「王珣虎邱記。類聚卷八，王珣虎邱記曰……又虎邱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曰……」又「顧愷之虎邱山序。類聚卷八，晉顧凱之虎邱山序曰……御覽四十六引首二語。」

關於衡山者，有徐靈期南嶽記及宋居士之衡山記。

隋書經籍志：「衡山記一卷，宋居士撰。」章宗源考證：「南齊書高逸傳：宗測字敬微，宋徵士。」

炳孫也。澗少靜退，辟徵不就。嘗遊衡山，著衡山記。又「南嶽記，卷亡，徐靈期撰。不著錄。藝文類聚居處部、服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並引徐靈期南嶽記。」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南嶽記徐靈期撰。元案，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卷中，衡嶽觀條有晉太康八年吳人徐靈期。又上清宮條云：吳人徐靈期真人，修行之所。採訪山洞巖谷，作南嶽記，敘其洞府靈異。」

而袁山松有勾將山記：

文廷式補晉志：「袁山松勾將山記。章宗源考證曰：寰宇記山南東道……御覽地部卷四十九……並引袁山松勾將山記。按御覽四十九，又引此記，敘勾將山特詳。章氏未檢。又初學記卷八，勾將山記曰……不題袁山松名。」

葛洪有幙阜山記：

文廷式補晉志：「葛洪幕阜山記一卷。太平寰宇記一百六分寧幕阜山，在縣西二百九十里。晉葛洪著山記一卷。書錄解題云：幙阜山記一卷，葛洪撰，其山在豫章。」

盧元明有嵩山記：

章宗源隋志考證：「嵩山記，卷亡，盧元明撰，不著錄。太平寰宇記河南道，盧元明嵩山記曰：

……水經禹貢山水釋地……文選洛神賦注……並引嵩高山記，不著撰名。」

賀循有石簀山記（御覽引），而不知作者之天台山圖（見文選天台山賦注），則爲一山之圖之最早見於記載者。此外猶有不知撰人之太山記：

章宗源隋志考證：「太山記卷亡，不著錄。史記趙世家正義……藝文類聚木部……並引太山記。太平御覽地部，引太山、天門、日觀、秦觀、吳觀、周觀諸山語，與漢官儀同。」

鄒山記：

章宗源隋志考證：「鄒山記，卷亡，不著錄。水經汝水注……史記夏本紀正義……並引鄒山

記，

及羊頭山記：

文廷式補晉志：「羊頭山記御覽一百七十六引三條，記漢石經、石虎聖壽堂、原城萬歲樓三

事，疑晉人書也。」

凡此諸記，皆專志一山，大抵篇幅甚短，或不過如記序之文章而已。至如支遁之天台山銘序（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以及傳玄之華嶽銘序（藝文類聚卷七引）之類，則固碑記之文，尤不作為地志。惟此等文字之撰人，多為釋氏，或與釋道有關者耳。若文人學士所記，不止一山，或專記某地山水者，如袁山松之宜都山川記：

丁國鈞補晉志：「宜都山川記，袁山松謹按，是書原本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均引，或省作宜都記，蓋山松曾守宜都，本傳失載。此其在郡時所著。藝文類聚、嘯類，載桓玄與袁宜都書，即山松。」

羅含之湘中山水記：

崇文總目：「湘中山水記三卷，羅含撰，拯注。釋（錢釋）按，通志略作盧拯撰，誤。」

直齋書錄解題：「湘中山水記三卷，晉末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羅拯注。（注：「案文獻通考作盧拯，此本誤作盧極，今改正。」）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附益也。」

丁國鈞補晉志：「謹按是書水經注、白帖、御覽均引作湘中記。」

張玄之之吳興山城名

繆荃孫吳興山城名輯本序：（雲自在龕叢書）「吳興山城名，卷亡，隋經籍志，新舊唐書未

著錄。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張元之作。又云，晉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按談鑰吳興志云，吳興山城名，張元之作，見統記，撰引不一。吳興郡疏一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是元之韶之所撰，截然兩書，象之合爲一，誤甚。晉書謝安傳：張元之，字祖希，吳郡人，少學顯，武帝時吳興太守，與會稽內史謝元之同年之郡，論者以爲南北之望，時稱二元。寰宇記引作玄之。章氏宗源考證誤作充之，嚴氏均可以爲作前溪曲之沈充，亦誤。章氏又引金山等二十二事。今按章氏脫飛雲山、九龍山、龍目峴三事。實二十三事。爰輯輿地紀勝、吳興志、明勞鉞湖州府志、鄭餘慶湖錄、石柱記箋釋，都爲一卷。」

殷武之名山記（見太平御覽引）謝靈運之遊名山志，與居名山志。

隋書經籍志：「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又「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宋書謝靈運傳：「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遍歷諸

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姚振宗隋志考證：「案，山居賦當在是志。賦及注，多至六七千言。」）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會賞，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按此則所謂遊名山志，疑卽永嘉山水遊記，而居名山志則似在會稽，或卽所謂山居賦。蓋當時地志之爲賦體而加注者，固不一而足也。

更有黃閔之神壤記與王韶之之神境記，同記滎陽山水，不知孰先。

隋書經籍志：「神壤記一卷，記滎陽山水，黃閔撰。」章宗源考證「神境記卷亡，王韶之之撰，不著錄。太平御覽地部，滎陽縣蘭巖山……人事部，滎陽有靈源山……並引王韶之之神境記。」姚振宗考證，神壤記：「神境記，蓋亦記滎陽山水古蹟，與此相類。特不知黃閔與王韶之孰先孰後耳。」而王濱山記，則大抵亦爲越中一地方之山記。

文廷式補晉志：「王濱山記，初學記地肺山者，王濱山記謂之木榴山，一名地肺。」

惟其綜全國名山者之圖志，則除山海經與國家一統圖籍，當兼繪山川外，大抵以戴勃之九州名山圖爲最早見於記錄（見歷代名畫記）。惟此圖恐甚簡略，又疑與天台山圖同爲山水畫性質，而逐一分繪，如後世之名勝圖冊者。至於陶弘景之山圖（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引）則不知其所繪記之地域範圍如何耳。

（乙）水道圖記

山水圖記之外，尙有專記水道之圖記，則多爲地理圖志性質，與前述圖記之淵源於釋道與名勝之欣賞者，系統稍別。此種典籍，除山海經、禹貢兼記水道外，其專記水道者，自以漢時桑欽之水經爲最早。

隋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注。」又「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水經四卷。右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

畢阮山海經新校正篇目考：「海內東經篇中自岷三江首，至漳水入章武南，多有漢郡縣名。據隋書經籍志云：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經末，當即海內經中文也。又有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乃桑氏之經。杜佑不知郭注，是海內東經中水經，乃云水經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是以二經爲一。又引經云，濟水過壽張云云，而責景純注解疏略，是以郭璞爲注桑氏之書，其謬甚矣。」

惟水經之所以有價值，而能留傳久遠者，乃在酈氏一注。蓋吾國隋代以前地志之留存今世者絕鮮，而酈注引證廣博，不僅中國水道舊況，藉以質證，即言隋以前地理者，亦以此爲最重要之材料也。魏晉以降，其他水道圖記之見於古籍者，有虞仲翔之川瀆記：

章宗源隋志考證：「川瀆記，卷亡，虞仲翔撰。不著錄。寰宇記江南東道，虞仲翔川瀆記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北通晉陵，滂湖水，東通嘉興，韭溪水……」姚振宗三國藝文志：「案李氏兆洛地理今釋晉陵郡縣始於南宋，非吳時所當有。又吳大帝以立太子和改禾興爲嘉興，事在

赤烏五年，時翻已前卒，亦非所及。知此或爲樂史改稱，或別有虞仲翔其人，今姑過而存之。」

庚仲雍之江記與漢水記：

隋書經籍志：「江記五卷，庚仲雍撰。漢水記五卷，庚仲雍撰。」章宗源考證：「水經江注……

並引庚仲雍江記。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鮑明遠還都道中詩注……此題庚仲

雍江圖。又「初學記地部……藝文類聚水部……史記夏本紀正義……並引庚仲雍漢水記。」

舊唐書經籍志：「尋江源記五卷，庚仲雍撰。」姚振宗隋志考證：「按尋江源記，似卽江記之

異名。」

張須無之江圖與劉氏之江圖：

隋書經籍志：「江圖一卷，張氏撰。江圖二卷，劉氏撰。」章宗源考證：「尚書禹貢正義張須

緣江圖云……陸氏釋文亦稱張須元緣江圖。通典州郡門注，稱張須九江圖（原注：「據書疏，似須

元乃雙名，通典注則須爲單名。」）……史記夏本紀索隱，稱張須九江圖。須與須字，相似而訛。

……按此當卽隋志所稱張氏江圖。又文選蕭賦注……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寰宇記劍南

西道……並引江圖不著撰名。唐志有江圖二卷，亦無撰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江圖劉氏三，張氏一。姚振宗考證：「覆按釋文作張須无，非元字。馮貢所釋文，乃誤爲元。章氏又誤以爲正義所引。」又「案御覽三百三十五引吳時緣江戍圖，今畫家有傳長江萬里圖者，不過寫其風景。輿地家有長江圖，則開方計里，徵實之學焉。」按此長江圖是否開方計里，固不可知。惟所謂吳時緣江戍圖，則當爲軍事性質，如後世之江防圖，與長江萬里圖之爲寫風景者有別。顧其圖式，則當繪有山水城邑，大抵相似耳。

又有釋道安之江圖，與四海百川水源記：

隋書經籍志：「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通志圖譜略記無「僧道安江圖。」

凡此諸圖記，除四海百川水源記，爲總記水源外，其他大抵爲晉世關於長江流域之述作。殆亦北人南徙，與長江流域漸趨繁盛之一種反映。其後酈氏之注水經，因歷史久遠之故，對於北方水道較詳，其關於江域者，當亦得此類圖籍作爲參考也。

此外又有一種著作可附述於此者，即關於論潮水之文字是也。魏晉之世，此種著述之見於古

籍者，有嚴陵之潮水論（見三國志吳志本傳）其內容如何今不可知，而葛洪又著有潮說。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姚寬西漢叢話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不知誰氏。云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注云葛洪潮說。據此，則洪以潮爲天河所激，與盧肇諸家之說不同，今姑錄其目。」

此以地面現象類推於天象，是與分野觀念爲同一推論方式。今雖知其不合科學，但未嘗不可謂其有探求科學真理之志也。

五、各州郡地記

魏晉以後，不僅有異物志山水記之興起，各地方地記之作尤盛，且亦以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各州郡爲多。其內容則大抵爲風土記與風俗傳性質，或重史傳，或重地理物產，頗不一致。茲略按地域列述如次。

關於交廣者有王範之交廣二州記：

見新唐書藝文志。三國志注、後漢郡國志注、太平御覽等引之。或作交廣二州春秋、交廣春秋。

黃恭（黃義仲）之交廣記：

藝文類聚、御覽、北堂書鈔引之。或作交廣二州記、廣南記。

而裴淵與顧微各著廣州記：

左傳正義、水經注、齊民要術、御覽引裴記，有曾釗輯本。北堂書鈔引作裴氏海東記及南海記。

御覽類聚等並引顧記。

劉欣期、鄧中岳及姚文感，又均著交州記：

水經注、書鈔、初學記、文選、吳郡賦注、御覽等引劉記，有曾釗輯本。鄧中岳，見通志引豫章書，及

豫章古今記。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引姚記。

更有蓋泓之朱崖傳，不知撰人之日。南傳（具見隋書經籍志）及王叡之始興記（水經注、初學記、

類聚等引之）而始安郡記（續漢郡國志注引）則及今粵西地矣。

關於吳越地域者，魏晉時有顧啓期之婁地記（見隋志）韋昭之三吳郡國志

寰宇記引之。王象之之輿地碑目有韋昭、吳興錄。兩唐書志有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三卷，不著撰

人。

顧長生之三吳土地記：

見輿地碑目，寰宇記引之。

顧夷之吳郡記（隋書經籍志複見）張勃之吳地記：

見兩唐書志。宋書州郡志引吳記及張勃說。文選注，御覽等引張勃吳錄。

郭璞之臨安志（見吳越備史），朱育之會稽土地記：

隋書經籍志：「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姚振宗考證：「案本書土地記一卷，兩唐志合土

地人物爲一書，故四卷又以其書記人物爲多，故入之傳記。

賀循之會稽記：

隋書經籍志：「會稽記一卷，賀循撰。」姚振宗考證：「案本志雜傳類有會稽先賢像贊五卷，

不著撰人。兩唐志並云賀氏撰。似其舊本與此爲一書，凡六卷；後人分析言地域山川者入此類，遂

分屬兩篇。」按朱賀二記中，傳記與地志雜糅，亦漢方志與風俗傳之遺制。

及劉宋以降，則孔靈符亦有會稽記：

文選注、後漢書注、類聚、御覽引之。初學記、御覽、寰宇記有稱孔暕會稽記者，暕，殆卽靈符名。

虞孝敬有廣梁南徐州記（見隋志，疑此非專記南徐者）。山謙之有吳興記、南徐州記及丹陽記：

隋書經籍志：「吳興記三卷，山謙之撰。」又「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吳興記，繆荃孫有

輯本（雲自在龕叢書）。文選注、類聚、書鈔、初學記並引山謙之之丹陽記。

劉損有京口記（見隋書經籍志）。王僧虔有吳郡地理記（太平御覽逸民部引之）；其有著作時

代未詳者，有劉道真之錢塘記：

水經注、類聚、初學記、御覽、後漢書注等引之。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按顏氏漢書敘，劉寶，字

道真，高平人。何由而記錢塘，俟考。」

鄭緝之東陽記與永嘉記：

水經注、類聚、書鈔、御稅引、東陽記、初學記、書鈔引永嘉記。按水經注引鄭記，則其書當在劉宋

以前。

更有不知撰人之揚州記（世說語言門注引）、蘇州記（御覽及寰宇記引）、吳郡緣海四縣記（文選注御覽引之）、吳郡臨海記（御覽引）、會稽舊記（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會稽十城地志（御覽引）以及江乘地記（初學記書鈔引）諸作。

其關於今皖、贛一帶者，有不知撰人之淮南記（見隋志，寰宇記引）、紀義之宣城記（文選注類聚書鈔寰宇記引）、王元謨之壽陽記（御覽時序部引）、朱陽之九江壽春記（寰宇記淮南道引）、徐整之豫章舊志（新舊唐志雜傳類）、雷次宗之豫章記（見隋志）、劉德明及王韶之之南康記：

秦榮光補晉志：「南康記劉德明撰，據寰宇記引。案通典注作劉嗣之，漢書張耳傳注引作鄴德明。」又「南康記據初學記引……王韶之撰。」

荀伯子之臨川記（御覽州郡部引）、張僧鑒之尋陽記：

文廷式補晉志：「張僧鑒尋陽記二卷，據豫章十代文獻錄引豫章書題二卷。見新唐志。說郛中有此書。按江岡、尋陽記、初學記、世說新語注多引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三十九引江州志云：

張僧監南陽人，父須無，徙尋陽，世爲江州別駕從事。僧監善屬文。先是，須無嘗作九江圖，具載八州曲折成江者九，僧監因之，遂作尋陽記。後又有張密者，不知何許人，亦著九江新舊錄。或曰，其裔也。關於九江圖，參前。

王烈之之安成記：

初學記、寰宇記引之。御覽引作王孚安成記。

關於荆湘者，有庾仲雍之荆州記與湘州記：

文選注類聚引荆州記。隋志：「湘州記二卷，庾仲雍撰。類聚引作湘中記，初學記作湘州記，御覽作庾穆湘州記。」

覽作庾穆湘州記。

鮑至與郭仲產之南雍州記：

隋書經籍志：「南雍州記六卷，鮑至撰。」通典州郡門注引。唐志作鮑堅，御覽、寰宇記引郭記。范汪之荆州記（史記正義、類聚、書鈔等引），郭仲彥之湘州記，蕭世誠之荆南地志（二書均見隋志），「仲彥」疑卽「仲產」之誤。（史筌之武昌記（書鈔引），御覽引作史岑，）黃閔之武陵記（後

漢書注、書鈔、御覽引。伍端休之江陵記（御覽引）、甄烈之湘州記（御覽引）、黃閔之武陵記（後漢書注、書鈔、御覽引）、楊元鳳之置桂陽郡事（見梁書劉杳傳）、以及不知撰人之湘州蔡陽郡記（續漢郡國志注引）、與荊州土地志（類聚引）。

關於巴、蜀地記，則有譙周之三巴記（見隋志）、益州志（文選注引）及蜀本紀，而蜀本紀之內容，實以傳記爲主，且上承司馬相如、揚雄等諸作，下爲以後華陽國志之前身之一。

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城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及本記略舉其隅，其次聖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祚別爲著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按隋志有揚雄蜀王本紀一卷。

此外則常寬有蜀志（見隋志）、黃容有梁州巴記（見華陽國志容傳）、袁休明有巴蜀記（水經注引）、段氏有蜀記（寰宇記引）而任豫、李膺均有益州記。

隋書經籍志：益州記三卷，李氏撰。章宗源考證：「續漢郡國志注……文選蜀都賦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地部……並引任豫益州記。史記河渠書正義……北堂書鈔酒食部……」

並引杜預益州記。杜預任豫，字形相近而訛，自是一書。」又「南史梁李膺傳：膺字公允，爲益州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唐志作李膺後漢書公孫述傳注……南蠻西南夷

傳注……元和郡縣志，並引李膺益州記。」按寰宇記劍南東道引李膺蜀記，當卽益州記。

又有不知撰人之巴蜀記（見隋志，或卽袁休明之巴蜀記；）而魏完之南中志及不知撰人之南中八郡志，則均遠及雲南諸地。

文選蜀都賦注引南中志。書鈔、御覽引八郡志，亦作南中八郡異物志。

以上各記，皆爲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者。若其記述黃淮海河流域之作，則有劉芳之徐州記：

書鈔、寰宇記引之，唐志作徐地錄。

李叔布之齊州記（隋志錄四卷），伏琛、晏謨及解道彪之齊地記：

水經注、御覽引伏記。水經注、寰宇記引晏記，亦見唐志。御覽引解記，史記封禪書索隱引作解道彪齊記。

不知撰人之三齊略記（水經注、初學記等引），阮籍之宜陽記（御覽引），杜預之汝南記（初學記、

御覽引）而陸機、戴延之、華延儁均著洛陽記：

後漢書鮑永傳注、御覽一百九十五引陸記一卷見唐志，又有戴祚西征記一卷，見隋志。
祚乃延之名。書鈔、初學記、御覽、寰宇記並引華記。

陸、鄴與石虎均有鄴中記：

陸記見隋志，今存。石記，太平御覽引。

又有裴秀與喬潭之冀州記：

史記、封禪書、索隱引裴記。書鈔六十五引喬記。

以及不知撰人之洛陽記：

隋志錄四卷。新唐志有後魏洛陽記五卷。

司州記（隋志錄二卷），河南郡境界簿（文選注，御覽引），晉中州記（水經、穀水注引），上黨國記（見晉書載記及史通），趙記及代都記略（具見隋志）。至其關於秦、隴一帶者有阮籍之秦記（御覽引），段國之沙州記，辛氏之三秦記（二書有張澍輯本），潘岳與葛洪之關中記：

潘記見兩唐書志、水經注、文選注、初學記、御覽等引之。葛記見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及玉海引中興書目。

郭仲產之秦州記（後漢書注、御覽、寰宇記引）與仇池記（御覽引）及撰人不詳之甘州記（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

以上所述，除遊記、宮殿簿、古蹟、舊事記（如三輔舊事）以及各州地記爲總地志（如荀綽九州記見下）之一部分者，均未遑備述外，漢、隋間方志地記之見於著錄者，大半具此。惟其中誤記、複出、僞託、因襲以及內容之分量性質，及時代問題，則尙有待於詳考。顧卽此觀之，亦可見魏、晉以降，地志發達之梗概矣。且吾人若將北方之洛陽、關中等記之注意都會事實者除外，則仍以南方地記爲多，是又與異物志山水記之情勢相類似者。蓋北方風土，不僅爲中原人士所熟知，亦有官府載籍可據，不若南方記載之疏略，多官府載籍所未詳者也。

六、外域傳記

中國對於西域之眞確地理知識，自當首推張騫所述。

漢書張騫傳：「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在西域傳。」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其地多暑濕，乘象而戰，其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隋書經籍志：「張騫出關志一卷。」章宗源考證：「崔豹古今注曰……事出張騫出關志，洪遵泉志外國品，亦引騫出關志。」

是其所詳，大抵以中亞一帶爲主體，印度事實，已屬影約傳聞。及經後漢班超、甘英之探險，而國人足跡與地理知識，始遠及西亞海濱。

後漢書西域傳序：「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焉。漢世張騫懷致遠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據夏德（Hirth）考證，「西海」卽今波斯灣），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

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至於南海外夷，則漢書地理志粵地條下所載諸國，東西學者之考證，雖尙未能全定，而黃支爲南印度之建志補羅（*Kāncīpura* 今 *Comjevaram*），則殆可公認。此漢志原文，謂「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由此不但可知漢代對於南海之地理知識，至少已達南印度，且可知此一段記述，當得諸南海譯使，而留存於官府者。但其記述之人，則不可知矣。

魏、晉之世，因佛教與商業之關係，外域之地志行記漸多，其著者除前已述及之外國圖、哀牢夷傳、扶南異物志，以及涼州異物志等兼述異域者外，在三國時有康泰之吳時外國傳與扶南記。

梁書海南諸國傳：「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向達漢唐間西域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敍錄（北平圖書館刊四卷六號）：「康泰書不知佚於何時。今散見於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吳時外國傳、太平御覽引書目作此，而卷九七一及卷九七五引作吳時外國志，藝文類聚卷八七引亦作吳時外國志。扶南記、水經注卷一引作扶南傳，卷三六引作康泰扶南記，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作扶南土俗……今就散見羣書之

吳時外國傳與扶南記觀之，所述大致相同。外國傳紀扶南事頗夥，而扶南記所誌亦不盡爲扶南。如水經注卷一引扶南記……與御覽卷七七一引吳時外國傳文略同，少有繁簡之殊而已。如屬兩書，似不應如此雷同。故楊守敬氏以爲「吳時外國傳其總書名，扶南傳又其書之一種。」（水經注疏要刪卷一）余疑不惟所謂扶南傳者爲卽吳時外國傳中之一部，卽扶南記，扶南土俗與外國傳，亦實一書。扶南記等名，如非原書之子題，則係傳鈔者以意分之，後時沿襲，遂成二書耳。

及晉時而法顯之遊天竺記（佛國記）歷西域、印度以及南海，其書猶留傳至今日。

隋書經籍志：「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水經注河水注，引作法顯遊天竺記，法苑珠林作遊歷天竺記，僧祐三藏集記稱佛遊天竺記。近人岑仲勉氏爲作考釋，稱佛遊天竺記考釋，因佛國記爲唐人之稱。

此外則尚有釋道安之西域志：

文廷式補晉志：「釋道安西域志一卷。見梁僧祐出三藏集記卷五，三寶記、開元釋教錄等並

載之。藝文類聚卷七十六引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七引六條。又案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甚多，蓋亦出此書。御覽九百十一西域諸國志曰……」丁國鈞補晉志：「西域記一卷，釋道安。謹案見大唐內典目錄。」

支僧載之外國事：

水經注、書鈔、御覽並引之。楊守敬據水經、河水注引此書中「一據據者，晉言千里也」一語，謂支僧載爲晉時人（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卷一）。

釋智猛之遊行外國傳：

隋書經籍志：「遊行外國傳，釋智猛撰。」

竺法維之佛國記：

水經注卷一，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十三俱引之。

釋法盛之歷國傳：

隋書經籍志：「歷國傳一卷，釋法盛撰。」通典西戎總序作法盛歷諸國傳。信行翻梵語引之。

竺枝之扶南記。

水經注引之，御覽引作竺芝。以上各書之詳，可參考西域南海諸國古地書敍錄。

釋曇勇之外國傳。

向達西域南海古地書敍錄：「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隋書經籍志著錄，今佚。曇景，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西戎傳總序注引作曇勇，今按卽高僧傳卷三之釋曇無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無竭則譯其義；而隋志又訛勇爲景，其實一人也。高僧傳稱其所歷事跡，別有記傳。歷代三寶記第十，曇無竭著述有外國傳五卷，竭自述西域事。」

又有不明作者之交州以南外國傳、林邑國記，以及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

隋書經籍志：「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又「林邑國記一卷。」又「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通典西戎總序注有翻法師外國傳疑卽此。）文廷式補晉志：「林邑國記一卷。文選注藝文類聚諸書多引之。每記范文事，蓋晉人書也。」按水經注、通典亦引之。

而惠生行傳所述，當限於西域。

隋書經籍志：「惠生行傳一卷。」魏書釋老志：「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于世。」姚振宗隋志考證：「羊街之洛陽伽藍記，備載此記年月與文，頗不同。」

至於隋代之北荒風俗記、諸蕃風俗記，以及突厥所出風俗事，則前已述及，茲不復贅也。

此等外域記傳，其晉以後作，多與佛教有關。至其內容，今雖未能詳悉，但所述地理知識之範圍，大抵較漢代無大增進；惟於北印度與中亞之知識，當較以前更爲詳確耳。

七、圖經與圖志

中國古代地志，多未必有地圖，而地圖之有文字說明，則幾成通例。山海經圖、職貢圖等姑勿論，彼秦、漢輿圖，以及裴秀等所製圖，殆莫不於地名之外，兼有記注說明，故其圖雖亡，而後世尚有採引其文字之遺跡可見。惟其說明文字之詳略多寡，自不一致耳。蓋吾國古來輿圖，其繪法至簡，一切政治、經濟及自然地理之狀況，多未能以圖繪表示，故不得不有說明以濟其窮。故實際上吾國之地志與地圖，多未易爲明白之劃分，但在晉、宋以前，方志地記之附圖者絕少，而地圖雖有說明，在名目上

亦尙以圖稱，不與地志相混。及宋、齊以降，各地圖經之作漸多，至周、隋之世，又有總圖志之募集，於是地圖與輿地志，遂混合爲一體。下迄宋代，各地圖經之作大盛，其內容卽等於方志，而後世方志與總地志之例須冠以地圖者，蓋皆導源於漢、隋之際之圖經也。

竊嘗以爲吾國圖經之見於記載者，以王逸之廣陵郡圖經爲最早（見馮貢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拙著地志與地圖）繼而知其不確，蓋疑此王逸爲南齊時王邃之之譌也。

馬國翰喪服世要行記輯本序：「隋志有喪服世要行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舊唐書逸作邃之，與南齊書合作逸者，傳寫誤也。南齊禮志載其與王儉答問一篇，禮志稱王邃，脫之字。誤邃爲逸，有由然矣。」

姚振宗隋志考證：「喪服世要行記。按此書次王儉之後，以齊書文學傳考之，實是王邃之撰，兩唐志題名不誤。……六朝人名，或連之字，或不連之字，類是者甚多。馬氏謂誤邃爲逸，得其實矣。」按文選蕪城賦注引王逸廣陵郡圖經，此王逸當亦王邃之訛。但在後漢桓帝時，已有巴郡圖經可參，則圖經之始，固在桓帝以前也。

華陽國志卷一巴志：「孝桓帝以并州刺史張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四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觀此所述，則中國古時一般官府地圖所表示者，亦大抵如此；惟此種圖經，於圖之本身記注外，必另有說明記錄，可以推知，是卽所謂「經」也。

自是以後，歷魏、晉及宋，似未有地圖或地志之以圖經稱者，惟另有所謂「圖副」者，其體制疑與圖經相類，亦爲地圖之外，另加說明者。

章宗源隋志考證：「荊州圖副記，卷亡，不著錄。水經沔水注……此引荊州圖副記。文選注，後漢書注諸書所引，或稱荊州圖記，或稱荊州圖。」隋書經籍志有不著撰人之湘州圖副記一卷，唐志同。

至於三輔黃圖以及楊佺期洛陽圖之屬，雖原爲圖說兼詳之作（黃圖今存其說），而其所繪記者

乃都會之坊巷宮闕（有如唐、宋之洛陽、長安圖記）與圖經之爲各州郡圖志者，性質有別。故竊疑隋書經籍志所錄，及文選注等所引諸圖經，疑爲南齊以後之作。其見於隋志者，有冀州、齊州、幽州之圖經各一卷，而均不著撰人。

章宗源隋志考證：「太平御覽地部引冀州圖經曰：……寰宇記多引冀州圖，省經字。」姚振宗隋志考證：「案冀州、齊州、幽州，隋以前皆屬北朝，以上四書（按四書卽指此三圖經及李叔布齊州記）大抵皆北朝人作。寰宇記數引舊圖經，似卽此類。」

外此則有雍州、上谷郡、洛陽、弘農郡、河南郡、東郡、歷陽、宣城郡、廣陵郡、江都、丹陽郡、蜀郡等地之圖經。

章宗源隋志考證：「文選西征賦注……徐敬業登琅琊城詩注……並引雍州圖經。」又

「文選放歌行注，上谷郡圖經曰：……」又「文選東京賦注……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注……並引

洛陽圖經。御覽州郡部，寰宇記河南道引有洛陽地圖。」又「文選西征賦注，弘農郡圖經曰：……」又「文選西征賦注

……懷舊賦注……洛神賦注……嗣宗詠懷詩注……並引河南郡圖經。」又「文選爲曹公與

孫權書注，江都圖經曰：……」又「文選奏彈曹景宗注，歷陽郡縣圖經曰：……御覽地部雜疏山、梁山二事，引歷陽圖經，省

郡縣二字。又「文選鮑明遠還都道中詩注……謝玄暉敬亭山詩注……並引宣城郡圖經。」御覽地部引十餘事。又「文選蕪城賦注，王逸廣陵郡圖經曰……」（按「王逸」即「王遂」之訛，見前。）

又「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江都圖經曰……」。又「文選范蔚宗樂遊苑詩注……謝靈運送方山詩注……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注……並引丹陽郡圖經。」又「文選南都賦注，蜀郡圖經曰……」。

凡此諸圖經，除廣陵郡圖經有撰人而誤外，其他均不知作者，殆由地方政府繪述，如後世之方志。至於引此者多爲文選注，唐以前書，似未見有引之者，大抵爲南齊及隋時之作也。太平御覽亦引圖經甚夥，除歷陽宣城二圖經，與文選注所引，或係相同之書外，尙有茶陵淮陰永嘉夷陵懷寧南康盱眙壽春歙縣衡山江寧長沙鄴縣九江魏郡涇陽閩山信州江夏諸地之圖經。但此中或有唐代以後作品，或創始於唐以前而後加以改修者也。

北周時有周地圖記百餘卷（見隋志，詳下。）當卽集合各地方圖經編輯而成。及隋代統一，修區宇圖志，卽由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尙書。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總敘：「隋大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尙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此所謂諸郡物產土俗記，可謂各郡之地志之纂集，而諸州圖經集卽各州之地圖。至於區宇圖志，則由此二者編纂而成之總圖志也。故圖經之初，原爲有說之地圖，及周、隋之世，與地志合編，記注益衆，而地圖乃爲地志之附庸矣。惟周、隋圖志雖混，而形制則尙不同於後世之方志，猶留圖經之原式。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圖，虞茂氏撰。」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著書下引隋大業拾遺：「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帙太少，更遣子細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敍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敍城隍則卷首有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姚振宗隋志考證注：「案此言一千二百卷者，蓋合上圖志圖經而重修之，仍名區宇圖志，其體如今之通志，合郡縣風俗山川、人物、土產爲一編。是所謂正御書，與通行者不同，故本志仍分載三書，止於三百八十卷也。」

(參下)

此種一卷一圖，而各附說明之格式，可以逆推前此圖經之形式，當亦如是，而以後府縣志、通志與一統志之將各圖總彙於全書之首者，實屬古昔圖經之變體也。蓋其先所謂圖經，尚不失爲地圖，而以說明爲「附庸」，及周、隋之世，圖與志相混，說明記注益多，而圖與說之關係亦疏，推尙保留圖經之形式耳。及唐、宋以後，此式又變，而圖乃退處「附庸」之地位，僅將各圖彙編卷首，似稍稍保留圖經之遺制而已。至於後世不同於方志之特種圖說，尙有一圖一說相間之格式，則固與昔日圖經之制無甚差異也。

八、地理總圖志

漢以前地志，除山海經、禹貢及周官職方等簡約之記述外，未聞有綜合全國之地志。至於御史中丞所掌，爲與地圖相連帶之典籍，或有各郡國史志，未能成爲一統之總地志。惟朱贛之風俗記（見前），雖簡約而述及各地風俗地理，可謂略具總地志之規模，及後漢應劭續有地理風俗記之作，又另著十三州記（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注亦引之）。

姚振宗隋志考證：「應劭十三州記，應劭地理風俗記。按應仲遠此兩書雖不傳，其體制略可想見。十三州記如班書地理志，風俗記如班氏志郡國以後繫以分野風俗。兩書當合爲一編，其卽續漢書所謂十一種，百三十六篇之一歟。」

依姚氏之說，則班氏據朱贛風俗記者，不過篇末所述分野風俗之類，而其前文所志各郡國地理之詳，疑另有官府圖籍爲據。隋書經籍志所謂「班固因之作地理志」一語，其意若地理志全以朱記爲據者，實則其來源各別，初不相混。故應氏除承朱贛作地理風俗記而外，別撰十三州志以記全國州郡地理也。至十三州志之體制，大抵與漢書以後各史之地理志，及晉太康地記、王隱地道記等相彷彿，所謂「但記州郡之名」者，（隋書經籍志地理類敘中語）惟漢志則并分野風俗而合記之耳。應記以後，有黃恭（苗恭）之十四州記，及黃義仲之十二州記。

丁國鈞（子辰補）補晉書藝文志：「十四州記，苗恭謹按，見藝文類聚。家大人曰：恭不知何時人。玉海於晉地道記下附此，蓋以爲晉人也。今據以著錄。」按黃恭十四州記及黃義仲十三州記等，亦見玉海（卷十五）漢方志及闕駟十三州志下。丁氏之假定爲晉時，未必可靠。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黃恭交廣記。恭見廣州人物傳。按藝文類聚地部引苗恭交廣記。苗黃形近而譌。太平御覽州郡部引作黃恭，不誤。又二百六十五職官部，引黃義仲交廣二州記。義仲蓋恭字也。」又「黃義仲十二州記。水經注河水注，兩引之。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十四州記，卽此書也。與水經所引詞亦略同。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黃恭十四州記三條。」按文氏以文詞略同而證爲一書，不足爲據。因此類書籍，後書可因前書修改而成，故文字相同纂述者未必相同也。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州記，卷亡，黃義仲撰，不著錄。水經注河水注……此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愚按藝文類聚地部苗恭交廣記，建安二年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拜南陽張津交州牧，錫弓矢，與中州方伯同，自津始也。」

二記不明其一是二，其時大抵當在晉世。此外尙有後魏時闕駟之十三州志：

隋書經籍志：「十三州志十卷，闕駟撰。」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俱作十四卷。水經注卷十六引稱「闕駟地理志。」

魏書闕駟傳：「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纂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

宋書氏胡傳：「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卷……十三州志十卷，……合一百五十四卷。」按此所獻十三州志，當即闕駟所著。

史通雜述篇：「地理書者，若朱贛所采，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

張澍十三州志輯本序：「顏師古漢地理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纂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今並不錄。獨有取於闕氏，可知其書之精密。」

其後梁吳均又著有十二州記（見宋書及南史本傳），豈即據沮渠茂虔所獻闕氏之志而改編者歟？

三國時地理總志，有張晏之地理記。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郭璞注爾雅引張氏地理記云云。水經注卽作張晏。是張晏所著有地理記，惜不傳。晏，三國時中山人，字子博。」按尚書正義「烏鼠同穴」句下亦引張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又山海經海內南經郭璞注，引張氏土地記，疑卽張晏此書。

晉代總志甚多。西晉之初，太康元康永寧之時，相繼有地記之作。太康中所作者卽太康三年地志。

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總序：「晉太康地志，不著撰人。舊唐書云：太康三年撰新唐書十卷。其稱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見於宋書州郡志會稽郡始寧令下，一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孫皓起顯明宮下。考晉書武帝太康四年，徙遼東王蕤爲東萊王，而是志於東萊尚言郡；水經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長樂，而是志尚云信都，則書成於太康三年無疑。惟晉書地理志云：罷秦州亦在三年，而是志尚列秦州；或書成後州始廢矣。晉初輿地之學最著者爲裴司空秀，繼之以京相璠、摯虞。是書或成於數君之手……今復其舊，名曰太康三年地志。沈約止稱之爲地志（按宋書州

郡志敘稱「太康地志」又本志永年下稱「太康永寧地誌」(酈道元稱爲地記。司馬貞張守節稱爲地理記。新唐書稱爲土地記，其實一也。)按黃奭之漢學堂叢書中亦有此輯本。通典卷五十三，引太康郡國志，疑卽此書。惟文廷式以爲與太康地記別爲一書(見文氏補晉書藝文志)。另有太康州郡縣名。

舊唐書經籍志：「州郡縣名五卷，太康三年撰。」新唐書藝文志：「太康州郡縣名五卷。」此後則元康三年有地記之作：

隋書經籍志：「元康三年地記六卷。」續漢書郡國志注，及水經注引元康地道記。藝文類聚地部，文選謝靈運經竹澗詩注，及太平御覽俱引作元康地記。

另有元康六年戶口簿記。

隋書經籍志：「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

宋書州郡志敘：「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按此所謂「元康」，當指元康六年戶口簿記，而非元康三年地記，是則所謂「太康」，當另有太康中之戶口簿記也。

及永寧而又作地志：

宋書州郡志：「董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太康永寧地誌，並無疑是江左立。」

凡此各志，大抵後者襲前，因政治之變革而加以修改者。宋書州郡志又有所謂晉地記者，則不知爲何時所撰矣。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子辰注）：「晉地記。家大人曰：凡太康地志，宋志往往稱太康地記，其稱晉地記者，凡四見，蓋又是一書，非太康地志，亦非王隱晉書中地道記也，故別著於錄。」

其有著作時代大抵同時，而年期尙不甚明晰者，有皇甫謐之地書或郡國記。

隋書崔續傳（附崔廓傳下）：「臣按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引「皇甫謐郡國記」。按所謂地書與郡國記，疑卽一書。通典卷五十三引太康郡國志，如亦卽此書，則皇甫氏卒於太康三年，此書當作於太康元年至三年間。時間甚近，而作同性質之二書，又似不類。

其弟子摯虞又纂畿服經一百七十卷，隋志稱其詳備。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總敘：「晉世摯虞，依馮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稽志史部地理類序云：摯虞依馮貢周官作畿服經，凡一百七十卷，今亡。故部目不著錄。元秦水經洛水注引虞仲洽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又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同作虞摯曰。又文選南都賦注引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此數語當即是經佚文。」此外則荀綽之九州記，疑以歷史成分居多。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荀綽九州記。案魏志袁渙傳注渙子準，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核以羣書所引，實兖州記之文，疑晉宋時止傳兖冀二州記，餘七州絕無可徵引矣。」又「荀綽冀州記，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崔琰傳注，裴潛傳注，牽招傳注，夏侯尚傳注，世說德行門注，官語門注，品藻門注，文選沈休文彈奏王源注，御覽卷二百四十七，並引此書。」（按世說賞譽篇注，亦引荀綽冀州記。）又「荀綽兖州記。章宗源考證曰：世說文學篇注，引此書云……（原注）北堂書鈔設官

部，藝文類聚職官部所引並同。」余按魏志杜畿傳注、鍾會傳注、世說品藻門注、初學記卷十二，並引此書。章氏偶未檢也。」

章宗源隋志考證，荀綽冀州記原注：「按此書所記，似非地理類。前志皆不著錄，無從考定。今姑依名編之。」按此書殆與漢代之方志及風俗記同類。

而其年期尙待考定者，有樂資之九州志：

章宗源隋志考證：「九州記卷亡，樂資撰，不著錄。水經河水注……引樂資九州志，江水注鄂今武昌也。（原注「史記外戚世家集解同引」）稱九州記、太平御覽、寰宇記多引九州要記。」按水經注、江水注，及太平御覽、寰宇記三書所引，皆不著撰人，究爲荀綽抑樂資所著，抑另爲一書，均未可斷定。文廷式、丁國鈞、秦榮光、吳士鑑補晉書藝文志均列此，是皆定爲晉時之作。

及不知撰人之九州郡縣名：

隋書經籍志：「九州郡縣名九卷。」姚振宗考證：「按魏志武紀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詔書併十四州，復爲九州。荀綽有九州記，司馬彪有九州春秋，此或從兩書鈔出者，大抵是三國時郡縣

名。」

至於王隱晉書中之地道記，雖爲史中之一志，而王氏適在東西晉之交，後世言東晉以前地理者多依據之，其重要不亞於獨立之地志也。

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總序：「晉書地道記，晉王隱撰，在晉書九十三卷之中，不知卷數……準是數條，則處叔所編，足正唐人撰述之謬，非僅與太康地志相爲發明已耳。蓋二書作於晉而盛行於齊、梁、北魏之時。沈約撰宋書，劉昭注續漢書，魏收述魏史，所徵輿地，不下數百，然約之州郡，惟準太康，昭之注郡國，收之述地形，則一本地道。他若酈道元等又皆懸其片言，視若準的。今觀沈約之論曰……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統一，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足知當時言地理者，自兩漢地志之外，於三國及秦始之際，則徵太康，於晉之東西，則徵地道，不以別書參之，亦信而有徵者矣。至唐而藝文類聚、史記注文、選所徵引，始覺寥寥，則是書已不顯也。宋初修太平御覽，尙述是書，故樂史寰宇記亦間引之。厥後闕如，蓋亡失可知矣。」按御覽及寰宇記所引，未必直接引原書，故不足爲地道記尙存於北宋之證。

東晉之世，雖係偏安之局，而伏滔之地記，疑亦記中原疆土。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地志伏滔撰。見書鈔六十，類聚百八十五，御覽百七十七，水經洛水注引存，無撰人名。」按宋書州郡志所引晉地記，不知卽此書否（見前）。

惟宋時之元嘉六年地記，則其體制雖上追太康、元康等志，而其範圍，則殆以南朝爲主體矣。

隋書經籍志：「元嘉六年地記三卷。」姚振宗考證：「案，元嘉文帝年號。是歲三月立皇子邵爲皇太子。五月，於雍州置馮翊郡，九月於秦州置隴西、宋康二郡，見本紀。是記蓋猶在永初郡國志之前。」

及南齊時更有劉澄之所撰前代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及郡國志：

隋書經籍志：「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尙書劉澄之撰。」又「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章宗源考證：「唐志同。初學記文部……太平御覽地部……並引劉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水經夏水注……文選苦熱行注……初學記天部……並稱宋永初山川記（原注：

「省古今字，御覽、寰宇記亦從省。又御覽州郡部黎陽國，居處部魏武殿前聽政門，稱澄之古今山川記，省永初二字。」水經河水注……獲水注……汾水注……穀水注……並稱劉澄之永初記（原注「省山川古今字。」）又澄之鄭氏注或稱劉中書。」姚振宗考證：「案武帝受禪，改元永初。永初之時，拓地稍廣。宋書州郡志序，言所據諸書，有永初郡國，故篇中時以爲言。是時蓋總名永初郡國記。故初學記、御覽引劉澄之揚州記、荊州記、江州記、豫州記、梁州記、廣州記、交州記，而本志亦別出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皆是書之篇目也。是書明著二十卷，而章氏云一卷，別以御覽諸書所引廣州記等六部分著於後，皆以爲本志不錄，何其謬歟」（原注：「章氏唯欲自詡博覽，於本志多所竄亂，地理類尤甚焉。」）按姚氏言劉氏各州記之爲郡國記之部分，甚是。唯言山川古今記亦爲永初郡國記之一部分，恐尙未能遽斷。至於司州山川記爲永初山川記之一部，則固不成問題也。

而陸澄所撰之地理書，則集山海經以來百六十家地志之大成。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

本之外，其舊事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又本志地理類敘：「齊時陸澄聚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姚振宗考證原注：「今案列於上者止三十九家，今惟見四十二家，則已佚其三家，今無從知之矣。」又「案四十二家，今惟見三十九家，尙有一百二十家，其書名撰人，皆在陸書，今不可見矣。又澄合百六十家之書而編卷止於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雜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

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人，當世稱爲碩學……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史通志書：「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

舊唐書經籍志：「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按此一百五十卷，其中當有一卷爲目錄。）新唐書藝文志：「鄧基陸澄地理書一百五十卷。」姚振宗隋志考證：「鄧基未詳，豈與陸澄同編是書歟。」

章宗源隋志考證：「水經濟水注……文選赭白馬賦注……左太冲詠史注……（原注）江文通雜體詩，竟陵王行狀注同。」（原注）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原注）子建七啓注同。」（原注）

藝文類聚水部……北堂書鈔禮儀部……並引地理書，不著撰名。（原注任昉、劉澄並有地理書鈔，此所引不著撰名，則未能定爲陸澄之書，附此存考。）

其後梁任昉又加增輯，成爲地記，較陸書爲巨。據隋志所謂「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知是書之編制彷彿類書性質，又似以地域分部之叢書。

隋書經籍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惟十二家。今列之於上。」（按梁書與南史本傳，及新舊唐書志所記書名，卷數俱同。）姚振宗考證注：「案自三輔故事至并帖省置諸郡舊事，實有十三部。十二家，當是十三家之誤。」又「案陸任二家之所合二百二十四家之書，梁書皆存焉。自江陵覆沒，悉爲煨燼，以迄於隋，僅存五十四部。（原注：「今惟見五十二部。」）然有二家之書在，則所謂零失者，實未嘗失，所謂見存者，亦皆是見存也。見存之本當著錄，否則仍用附注之例，如釋文載張璠周易集解之法，使後人得見其書名，豈不甚善。爾乃拘滯於隋人目錄之例，以見存別部爲斷，致其餘一百九十一家之名目，渺無可稽，豈不惜哉！」

陳時顧野王又撰輿地志，其卷數少而其體制則同，亦爲纂輯諸家之書而成。

隋書經籍志：「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按陳書南史本傳，及新舊唐書志俱同。）又本志地理類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章宗源考證：「王象之輿地碑記曰：寶雲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並建屋立像，曰顧侍郎祠。通志州郡門孔安國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自夔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太平御覽、寰宇記引輿地志甚多。」

外此則陸澄、任昉二人，又均有地理書鈔，大抵爲編纂地理書與地記之節略，其性質大概如今日之叢書。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鈔二十卷，陸澄撰。」章宗源考證：「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山南東道……並引陸澄地理書鈔。」姚振宗考證：「案梁書庾仲容傳：仲容鈔衆家地理書二十卷，疑卽鈔陸氏之書，此或是歟。」原注：「兩唐志有雜記十二卷，似卽此書。以二十爲十二，誤倒其文也。」按「雜記」舊唐書志作「雜志記」。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鈔十卷，任昉撰。」姚振宗考證注：「兩唐志有雜地記五卷，似卽是書之殘贖。」按「雜地記」新唐書志作「雜地志」。

另有劉黃門地理書鈔，其著者及時代均未詳，或卽陳時之書歟？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抄十卷，劉黃門撰。」姚振宗考證：「劉黃門未詳。（原注：「疑是梁劉璆，有京師寺塔記，見後。」）又「案任陸二家所集，但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有如今之叢書，重複互見，時所恆有。後人節鈔其書，省併複重，故有上三家書鈔，而失注鈔撰者姓名耳。」（原注：「唐藝文志有地理志書鈔十卷，卽此書也。」）按姚氏以陸氏等之地理書爲如今之叢書，私意則亦可謂爲類書，惟二者亦未易明白分析，因類書性質之書，如將整部書籍編入（如明之永樂大典）可與叢書相混也。

上述南朝地志，雖所記不限南朝，而編者大抵爲南朝學者。其在北朝，則除前述闕駟之十三州志外，尙有大魏諸州記。

隋書經籍志：「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舊唐書經籍志：「魏諸州記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後魏諸州記二十卷。」章宗源考證：「太平御覽木部……此稱大魏諸州記。寰宇記河北道……此稱後魏諸州記。水經注多引魏土地記。（原注：「史記趙世家正義……亦引魏土地記。」）元和郡縣志河東道……引後魏風土記（原注：「寰宇記亦引後魏風土記數事。」）太平御覽地部……（原注：「寰宇記河北道同。」）並稱後魏輿地風土記。」

至北周而地志與地圖合，乃有周地圖記。

隋書經籍志：「周地圖記一百九卷。」舊唐書經籍志：「周地圖九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周地圖一百三十卷。」章宗源考證：「文選爲曹洪與魏文書注……（原注：「後漢書劉焉傳注同。」）元和郡縣志山南道……並引周地圖記，太平御覽、寰宇記尤多引之。」

及隋代統一南北，而地理圖志之體制內容，亦歸統一。除所謂州郡縣簿與前此之「州郡縣名」相類外：

隋書經籍志：「州郡縣簿七卷。」玉海卷十七隋郡縣：「隋州郡縣簿七卷。」按唐六典亦述

及州縣定簿，」此蓋備國家行政隨時檢查之需，恐歷代多有之。

當時中央又彙輯圖經與土俗記而編纂總圖志。內容之豐富，與卷帙之衆多，蓋可謂空前之巨著焉。

隋書經籍志：「隋區圖志一百二十九卷。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芝撰。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又本志地理類敍：「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尙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

舊唐書經籍志：「虞茂區圖一百二十八卷，郎蔚芝之隋圖經集記一百卷。」又「諸郡土俗物產記十九卷。」（新唐書志同。）姚振宗隋志考證注：「案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書有傳。其名與宇，兩犯唐諱，故此言虞茂氏。唐志亦沿舊題，節去世字。」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著書下引隋大業拾遺：「大業之初，勅內史舍人竇威趙盾，舍人崔祖濬及龍川替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宜勅責威等云：昔漢末

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有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等可乎？然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勅追祕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瞻，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繼；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袁朗杜寶吳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聽勅。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參前圖經項。

隋書 郎茂傳：「郎茂字尉之，恆山新市人也。……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又崔頽傳（附崔廓傳後）「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

章宗源 隋志考證 隋區宇圖志：「太平寰宇記 河北道……御覽 地部……並引隋區宇圖

志。」又隋諸州圖經集：「太平御覽州郡部，隋圖經集記曰……：地部，居處部，多引隋圖經（原注：「省集記二字。」）寰宇記亦引甚多，又引有舊圖經。」

此圖經集記與土俗物產記，大抵爲彙編各州郡圖經及風俗異物等雜地記而成，彷彿以地域分編之類書。其編制則與陸、任二家之地書相類，多鈔輯而少修撰，爲編纂區宇圖志之長編。至若區宇圖志，則殆經學者詳加編修而成，乃唐以後地理總圖志及一統志之濫觴。而隋以前之總地志，既多與地圖分立，又且內容簡略，與諸史中之地理志相類，至齊、梁之世，始漸恢宏耳。惟北周之世，雖半壁山河，其周地圖記，亦可謂隋圖志之先河，而圖經集記土俗物產記之輯，則又有陸澄、任昉等地理書導其先路也。是故周、隋間之地理圖記，實爲中國地志與地圖史之重要關鍵；東漢以來各種官私圖籍與雜地記，至是始告一結束，而後此圖志之新局面，亦於是乎開。蓋唐以後之總地志，其內容之分配，或互有詳略，其體例大綱，則已略定於此時矣。

第二節 唐宋總地志

隋代以後，地志之作漸少。吾人試略翻唐書藝文志所錄關於地理類之述作，可見其唐以前書，蓋居半數以上，至宋代而方志（圖經）之作，始復興盛焉。茲將唐、宋時之總地志，列述如次，以見其地志沿革之一斑。其他各種地記雜志，以及州縣圖經，其體制大抵沿魏、晉、南北朝之舊，未遑一一詳述也。

唐代總地志，除所謂「方誌圖」（見上章第七節）而外，大抵以魏王泰之括地志（坤元錄）爲最早。

新唐書藝文志：「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勗撰。」

玉海卷十五唐括地志。坤元錄：「魏王泰善屬文，卽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貞觀十二年，奏撰括地志，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謝偃、蘇勗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分道計州，緝疏錄，凡五百五十篇，曆四載成。詔藏祕閣，賜物萬段。……會要：貞觀十五年正月三日上。通鑑十六年正月乙丑上……宗笈仕魏王，與謝偃撰括地志。中興書目坤元錄十卷，泰撰。卽括地志也。其書殘缺，遺

典引
之。」

孫星衍括地志輯本序：「其書稱述經傳山川城冢，皆本古說，載六朝時地里書甚多，以此長於元和郡縣圖志，而在其先。隋、唐志載輿地志永初山川記諸書目，凡數十種，今惟水經注存，大抵亡於宋南渡時，括地志亦竟散佚。其殘文時時見於傳記所引。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不能博考書傳，獨恃此疏證古地名。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亦引之，或稱坤元錄。路史注引有括地象，按其文亦即此書。羅莘從他書鈔撮，故譌志爲象字。玉海所引多於史記正義者，其時據史記注善本，王應麟亦不見本書也。序略起魏武時置郡，惟見初學記，蓋其下卷，餘書未見引據。按泰等以四年成此書，當極精博。」

而太平寰宇記所引唐開元十道要略，或卽與開元十道圖並行之記志也。降及建中之際，孔述睿會修地理誌。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孔述睿傳：「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修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修地理志，時稱詳究。」（新唐書本傳略同。）

玉海卷十五唐郡國志：「唐新集地理志九卷。」按此不知是否卽孔術容之地理志，抑爲孔氏所據以重修之原本。

其後賈耽製圖，除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圖另有別錄六卷，及吐蕃黃河錄四卷，爲局部之地志外，其海內華夷圖亦別有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見舊唐書本傳。參上章第六節。）可謂獨立之總志。惟此書似兼詳於古今沿革，故賈氏另有貞元十道錄之作，蓋與開元十道要略相彷彿，所以撮述當時之政治地理者。（近在燉煌發現寫本貞元十道錄殘頁，鳴沙石室佚書中有影印本。）

權載之文集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相國魏公……以爲言區域者闕略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夷圖一幅，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窮鞞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轅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提其要會，切於今日，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迂直，割裂境界，而爲都會。在景雲爲按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謬誤，採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若護單于

府並馬邑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公焉。……時貞元壬午（十八年）歲夏四月謹序。」

後此則元和間李吉甫編製十道圖（見上章第五節）之外，更撰元和郡縣圖志。吾國總地志之留存於今日者，除貞元十道錄殘本外，當以此爲最早矣。

唐書藝文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闕，或裨聰明。豈欲希鄼侯之規模，庶於盡朱贛之條奏。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尙古遺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敝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敍事之前，并目錄兩卷，

總四十二卷。」按此所謂「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首」一語，可知其尙保存隋圖志及以前圖經之形式。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一：「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御史大夫栖筠之子。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忠懿。事跡具唐書本傳。是書據洪邁跋稱爲元和八年所上；然書中更置宿州一條，乃在元和九年，蓋其事爲吉甫所經畫，故書成之後，又自續入之也。……後有淳熙二年程大昌跋，稱圖至今已亡，獨志存焉；故書錄解題惟稱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此本又闕第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六卷，其第十八卷則闕其半，二十五卷亦闕二頁，又非宋本之舊矣。……輿記圖經，隋、唐志所著錄者，率散佚無存。其傳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其體例亦最善，後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

此圖志之體制，實上承周、隋以來之圖記圖經，故不僅與括地志之有志無圖者不同，即與郡國道縣四夷述及貞元十道錄等爲地圖之別錄者，亦異其趨也。及晚唐之世，有韋澳、袖次方志爲山河地名

要略（處分語）

唐書藝文志：「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一作處分語。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韋澳傳：「爲學士時，帝常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細加補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玉海卷十五唐山河地名要略注：「大中九年，令澳纂次諸州境上風俗及諸利害爲一書。」又「出謂澳曰：上處分驚人，皆處分語中事也。」按此不僅類於朱贛風俗，亦各地政略之會要矣。繼而梁載言有十道志之作。

唐書藝文志：「梁載言十道志十六卷。」宋史藝文志：「梁載言十道四蕃志十五卷。」玉海卷十五道志：「唐太府少卿梁載言十道四蕃志十卷，以十道爲本，而以州縣圖志附列於下。」郡齋讀書後志：「十道志十三卷。右唐梁載言撰，唐分天下爲十道，所載頗詳博。其書多稱咸通中沿革，載言蓋唐末人也。」

此外則其時期待考者，有劉之推文括之九州要略與郡國志。

唐書藝文志：「劉之推文括九州要略三卷。」又「郡國志十卷。」

及曹太宗之郡國志：

玉海卷十五唐郡國志：「中興書目：郡國志二卷，曹太宗撰，始關內，終於嶺南。」

上述諸志，除括地志、郡國道縣四夷述及元和郡縣圖志外，其內容均甚簡約，多爲便利行政經略上檢閱之需者。是則曹璠之須知國鏡或亦與此同類。

玉海卷十五唐須知國鏡：「書目二卷，唐左武衛兵曹璠撰。璠案六典戶部十道纂及採諸節一府賦稅戶類物產，京畿文武百官俸給，以至岳瀆山川四夷八蠻，並撮其機要，使覽者纖毫無遺。」惟其編制，恐係分類排次，而未必按地域分編耳。

及五代北宋之交，有徐鍇等所撰方輿記：

玉海卷十五唐郡國志：「南唐徐鍇等撰方輿記一百三十卷。」本傳云百二十卷。紀郡國事跡，及程塗遠

近甚詳。」

宋史藝文志：「徐鍇方輿記一百三十卷。」亦見宋史徐鉉傳。

至北宋統一，樂史乃著太平寰宇記，以資稱頌，並著總記傳，與坐知天下記。

樂史太平寰宇記表：「我宋朝太祖以握斗步天，掃荆蠻而幹吳蜀，陛下以呵雷叱電，薄閩越而縛并汾，自是五帝之封區，三皇之文軌，重歸正朔，不亦盛乎！有以見皇王之道全，開闢之功大。其如圖籍之府未修，郡縣之書罔備，何以頌萬國之一君，表千年之一聖。眷言闕典，過在史官。雖則賈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國志，不獨編修太簡，抑且朝代不同。加以從梁至周，郡縣割據，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討源，窮本知末，不量淺學，撰成寰宇記二百卷，并目錄二卷，自河南周於海外。至若賈耽之漏落，吉甫之闕遺，此盡收焉。」

玉海卷十五太平寰宇記：「書曰直史館樂史撰，凡二百卷，載天下州郡國志，所著古今事跡。太平興國中，天下一統，史取自古山經地志，考正訛謬，纂成此書上之，始於河南道，終於四夷。又有總記傳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一：「宋太宗時，始平閔越，并北漢，史因合輿圖所隸，考尋始末，條分件繫，以成此書；始於東京，迄於四裔。然是時幽、嬀、營、檀等十六州，皆所割以賂遼者，實未入版章；乃因

賈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舊，概列其名。蓋太宗置封樁庫，冀復燕雲，終身未嘗少置，史亦預探其志，載之於篇，非無所因而漫錄也。（按宋代東北邊裔圖亦多，與此同一用意，參上章第九節。）史進書序譏賈耽李吉甫爲漏闕，故其書採摭繁富，惟取該博。於列朝人物，一一竝登，至於題詠古蹟，若張祐金山詩之類，亦皆竝錄；於後來方志必列人物藝文志，其體皆始於史。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是而大變。然史書雖卷帙浩博，而考據特爲精核，要不得以末流冗雜，追咎濫觴之源矣。」又地理類總敘：「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爲州縣志之濫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列傳侔乎家牒，藝文溢於總集，未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

洪亮吉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至若地里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詞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寧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於此。此其所短也。」

地志之詳人物瑣事，實不自樂史始，蓋不僅漢、魏、六朝間地志不乏其例，卽以前徐鍇之方輿記亦

「紀郡國事跡」疑寰宇記之作，或卽由方輿記而增廣者。王應麟氏卽有「李吉甫、徐鍇、樂史諸書，雖詳略不同，大抵皆相因」之說也。且元和志原尙有圖，而徐、樂二氏之作則無之，其增廣之文字，殆鮮當代事跡，而多採自舊籍。故寰宇記中頗多唐以前地志之佚文，而唐代總地志，除賈耽之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等，兼詳沿革外，其他大抵詳於當代政事地理，與隋以前之地志不甚相似。故徐、樂二書之注重史事，復隋以前地志之舊狀，或卽由於採引此類舊地志而受其影響之故歟？惟樂史作寰宇記以後，其子黃目又著聖朝郡國志，殆卽寰宇記與坐知天下記之節略，而注重當時地理者，彷彿賈耽於郡國道縣四夷述之外，另著貞元十道錄也。

玉海卷十五太平寰宇記：「樂黃目著聖朝郡國志二十卷。」

及皇祐間，王洙等上地理圖，而詔賜名皇祐方域圖志，其後又有續圖，是爲圖志兼備之作，其體制殆與元和郡縣志相似。

玉海卷十四皇祐方域圖志：「三年七月己巳，二十日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新修地理圖五十卷，國史志三卷。圖繪要覽一卷，詔賜名皇祐方域圖志，會要云九城志云圖記。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洙禹

錫上皇祐方域續圖。

宋史掌禹錫傳：「管豫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按王洙、掌禹錫等所修皇祐地理新書，蓋係堪輿家言，見玉海卷十五。）

其後元豐間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圖志，則又與皇祐圖志相類，惟其志與圖，疑不相間而分爲兩部。且自是以後，宋代總地志之有圖者絕少矣。

玉海卷十五元豐郡縣志：「元豐三年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圖三卷」）

至於熙寧、元豐間所修之九域志，則景德、祥符以來由十道圖、九域圖而變爲無圖之地志（參上章第五節），是爲地圖演變爲地志之最明顯者。

玉海卷十五熙寧九域志：「八年七月十一日辛丑，詔三館祕閣刪定九域圖，以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

降，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集賢校理趙彥若，館閣校勘曾肇，充刪定官。彥若辭，復命光祿丞李德芻刪定，而知制誥王存審其事。既而上言，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九域志；壤地之離合，戶版之登耗，名號之升降，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皆志於篇。始四京終化外州。道里廣輪之數，昔人罕得其詳；今一州之內，首鉸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舉，弗相混淆，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次州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爲十卷。」及紹聖、大觀間，又曾爲增廣九域志之工作，迄宣和而未成。

玉海卷十五，元豐郡縣志：「紹聖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黃裳言，今九域志所載甚略，願詔職方，取四方郡縣山川民俗物產古跡之類，輯爲一書，補綴缺遺。詔祕書省錄山海經等送職方檢閱。大觀二年四月二日，詳定九域圖志，強淵明上言續修其書，詔四方以事來上。宣和罷書局，不及成。」是爲宋代地志趨重文字記錄，而忽略地圖之顯例。且在大觀、政和間，程績之撰職方機要，即據歷代諸史，并採異聞小說：

玉海卷十五，熙寧都水名山記：「書曰：職方機要四十卷，大觀中晉原承程績撰。續案新舊九

城二書，上據歷代諸史地志，旁及左傳水經注釋并通典言郡國事，采異聞小說，紬次爲書。」按此，則大觀間已有新舊九域志之別。四庫提要（地理類存目）以新定九域志爲南宋坊賈所增定，疑誤。

而陳坤臣又進郡國人物志並參與修定九域志事：

玉海卷十五，政和郡國人物志：「政和元年，漢州教授陳坤臣進郡國人物志一百五十卷。四月十七日，詳定九域志。何志同言其書包括千載文婉事詳，詔藏祕府。」

及歐陽忞撰輿地廣記，亦「考摭史傳，及山經地志」等古籍。

玉海卷十五，政和郡國人物志：「輿地廣記三十八卷，政和中歐陽忞撰，考摭史傳，及山經地志爲三十八篇。」

四庫提要地理類一：「輿地廣記三十八卷，宋歐陽忞撰。晁公武讀書志謂實無其人，乃著書者所假託。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其書成於政和中；忞，歐陽修從孫，以行名，心字爲據。按此書非觸時忌，何必隱名，疑振孫之說爲是。然修，廬陵人，而此本有忞自序，乃自稱廣陵，豈廣，廬字，形

相近，傳寫致訛歟。」

可知地志之重人物傳記，雖不自太平寰宇記始，而宋代地志之注重史傳故實，則固爲顯然之現象。是殆當時學者注重歷史之風之一種表現歟？

及南宋偏安，在大略同時期間，有兩總志尙留存今日：一爲王象之之輿地紀勝：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輿地紀勝二百卷，宋王象之撰。四庫未著錄，惟有輿地碑記四卷，云象之金華人，嘗知江寧縣，所著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此卽其中之四卷。今於江南得影宋鈔本二百卷，前有象之自序，象之，東陽人，略云：余披括天下地理之書，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以及山川人物詩章文翰，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今考其成書之年，在南宋嘉定十四年，故其所指在所，以臨安府爲首，而一切沿革亦準是時。又宮闕殿門壽康宮下引朝野雜記，云寧宗始受禪云云，則是作序在嘉定，全書之成又在理宗時矣。」

一卽祝穆之方輿勝覽：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一：「方輿勝覽七十卷，宋祝穆撰。穆字和甫，建陽人。……是書前有嘉熙己亥呂午序，蓋成於理宗時。所記分十七路，各係所屬府州軍於下，而以行在所臨安府爲首。蓋中原隔絕久已，不入輿圖，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書中體例，大抵於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賦戶口，關塞險要，他志乘所詳者，皆在所略；惟於名勝古跡，多所臚列，而詩賦序記所載獨備，蓋爲登臨題詠而設，不爲考證而設，名爲地記，實則類書也。然採摭頗富，雖無裨於掌故，而有益於文章，擷藻揆華，恆所引用。故自宋、元以來，操觚家不廢其書焉。」

是則由注重史傳而變爲典故類書之性質矣。此外與舊體裁相近而其書今已不存者，有王日休之九丘總要：

玉海卷十五淳熙九丘總要：「三百四十卷。先是，王日休新池州守上二十卷，詔寧國府給札寫之。六年七月進。八月八日詔遷秩。郡邑廢置，地理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該載詳備。郡縣隨以今名爲正，舊所名者，聲韻編次附之卷末。」按此可謂地志後附有古地名索引者。而王希先之皇朝方域志，則其著作時期及作者籍貫，蓋與輿地紀勝略同。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皇朝方域志二百卷。東陽布衣王希先撰。凡前代謂之譜，十六譜爲八十卷；本朝謂之志，爲一百二十卷。譜敍當時事實，而注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於古之州國。古今參考，譜志互見，地理學之詳明者，無以過此矣。嘉禧二年上於朝，得永免文解。其父玲本建寧人，己未進士，試詞科不中，頗該洽。希先述其遺藁，以成此書。」

至於范子長之皇州郡縣志，李和之輿地要覽，以及余嘉之聖域記之類，則其時期及內容，尙有待於考訂也。

宋史藝文志：「范子長 皇州郡縣志一百卷。」又「李和 輿地要覽二十三卷。」（叢竹堂書目及季滄葦書目俱錄輿地要覽，不著撰人。）又「余嘉 聖域記二十五卷。」

第三節 宋代方志之發達

宋代地方志之發達，始於開寶間之修圖經。

玉海卷十四開寶修圖經：「四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扈蒙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迄

不克成。六年四月辛丑，多遜使江南，求江表諸州圖經，以備修書，於是十九州形勢盡得之。宋準傳，開寶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

及景德、祥符之際，乃大加修集。

玉海卷十五景德地里記：「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乙亥，命侍講學士邢昺、侍學士呂祐之，

龍圖待制杜鎬、成綸、陳彭年編集車駕所經地理古跡以聞。祥符元年八月乙巳，昺等纂成三十卷。

一本云六十卷。目曰景德朝陵地里記。詔褒之。」又祥符土訓錄：「三年十二月癸酉，御史知雜事趙湘言車

駕祀汾陰，請依周禮置土訓誦，錄所經州縣山川古跡風俗，繼日聞奏，以資展覽。從之。四年正月戊子，命直集賢院錢易、直史館陳越、祕閣集賢校理劉均、宋綬，修所過圖經。每頓進一卷，賜名土訓

纂錄。……晏殊亦預修土訓。……宋綬傳云：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奏。」

玉海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學士邢昺、呂祐之、杜鎬、成綸、陳彭年編

集車駕所經古跡。庚辰十三日一云十四日勅。真宗因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校勘，編

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闕略來上。及諸路以圖經獻，詔知制誥孫奭、待制成綸、直集

院王隨，評事宋綬，邵煥校定。僅等以其體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學李宗諤知制誥王曾領其事，又增張知白、晏殊，又擇選人李垂、韓羲等六人參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午，龍圖待制戚綸請令修圖經，官先修東封所過州縣圖經進內，仍賜中書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備檢閱。從之。三年十二月丁巳，書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宗諤等上之。詔嘉獎，賜器幣，命宗諤爲序。又詔重修定大小圖經，令職方牒諸州謹其藏，每閏依本錄進。景祐四年二月甲子，賜御史臺。中興書目，今存九十八卷，哀州至利州路，或附以近事云。序曰：……今閏年諸州土地圖，亦其比也。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別。景德丁未歲，展孝山園，循功鼎邑，覽山河之形勝，酌方志之前聞；勅土訓而夾車，校地官之著籍；亟詔方州，精加綜輯。曾半載，悉上送官。毛舉百代，派引九流；舉春秋筆削之規，遵史臣廣備之法；立言之本，勅戒爲宗，守令循良，罔不採尋；峻良攸產，往牒備傳。自餘經界之疆畔，道里之遐邇，版賦耗登，軌跡昭晦，土毛良苦，氣俗剛柔，具有差品，無相奪倫。……祥符四年八月十八日，中書門下牒別寫錄頒下諸道圖經，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祥符四年正月戊子，命錢易、陳越、劉子儀、宋綬修所過圖經。將祀汾陰。六年十月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錢易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十二月庚辰，命晏殊同修。時將朝謁太清宮。

此種纂集，彷彿隋代之編修區宇圖志與諸州圖經，及土俗物產記。惟歷來各地方所進圖經，雖已圖說並重，至此而參入地記土訓，文字之分量大增，而地圖自退爲附庸矣。且竊疑此時之圖經，其圖冠於各郡邑之首；合之雖似一圖一說之舊制，分之則與後世方志之以圖冠於卷首者相類也。

自是以後，各地方志之作，汗牛充棟。今但觀宋史藝文志所錄，已有百數十種。且其書大抵已具後世方志之規模，絕少唐以前雜地記之體制。至其名稱，則或圖經，或圖志，或僅稱志，而卷首則未必一律有圖；但其稱圖經與圖志者，大抵均有附圖耳。吳其昌先生曾據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及郡齋讀書志所錄宋代地志（方志與總志），略加統計，得有以下之結論：（見清華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一期，吳其昌宋代地理學史。）

（一）「此目中北宋人著者，約占二百分之十五，南宋人著者，約占二百分之一百八十五。此可下假定之斷語云：『郡志之學，至南宋而特盛。』」

（二）「此目中中州郡之分配，長江以北約占二百分之十，長江以南約占二百分之一百九十，而高郵、襄陽、鄖城，無爲，雖在長江以北，然皆貼近江漢。如此可下近似之斷語云：『宋代郡志，限於

長江以南。」

(三)「北宋輿圖，多至二千卷以上，而南宋輿圖（圖經不在此列）窮搜苦索，當在五十卷以下，略爲一與三十之比。」

此三種數量狀態，實爲一事上三方面之表示。蓋圖經之作，雖始盛於北宋，惟其時輿圖尙不甚偏廢。且吳先生所謂北宋輿圖，有二千卷以上者，疑將祥符州縣圖經千餘卷，亦均計入，尙有十八路圖之圖副二十卷等，實皆爲地志而非地圖，故以此等卷數除去，則北宋輿圖，亦不多也。降及南宋，方志日盛，圖經之圖既退爲附庸，卽總志亦鮮附圖，則其時輿圖之益形衰落可知。至於地志數量之所以南宋多於北宋，南方多於北方者，則皆爲地圖衰而方志衆多，以及南宋偏安之表現，其原因仍相同也。惟宋代方志雖多，而留存近世者甚少。近朱士嘉先生專研方志之學，先將現存之宋、元方志，詳爲考訂，業已發表一部分於北京地學雜誌（宋元方志考）與燕京學報（第二十期臨安三志考），將來更能將其已佚者均通盤輯考之，則亦吾國學術史上一大之貢獻也。

元、明以降，方志之作，浩如煙海，卽其留存今日者，已屬不可勝數。（參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

〔商務印書館出版。〕惟此不過計其數量而已，若論其體例門類，則幾乎千篇一律，頗少特殊之作，而其大綱節目，固多導源於宋代也。故茲述吾國地志之沿革，姑暫止於此。至其體裁之美惡，門類之分合增減，則當代不乏專研方志之學者，今亦未遑論列也。

（附記）明代因蒙古及倭寇關係，邊防圖籍甚夥。但多涉政治軍事，且內容多轉輾鈔襲；別詳拙著明代北方邊防國籍錄及明代海防圖籍錄，（俱見王庸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一九四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茲不贅。